

【编者的话】

再有一百多天，香港回归将满 15 个年头。然而，近来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族群冲突却提醒我们：在庆祝之前，更需对中港关系做一次彻底的反思。

一月中旬，港人在 D&G 商店被禁止拍照一事点燃了此次内地人与港人冲突的导火索。随后，本地孕妇上街游行抗议“双非”婴儿，内地儿童在港铁内进食被香港乘客怒斥，北大教授孔庆东就“地铁进食”事件辱骂香港人，接着是一些网友集资在苹果日报上刊登广告反对“双非”，继广告后，几位中学生又在街头围唱歧视大陆人的歌曲《蝗虫天下》……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能感受到不少港人对内地人的负面态度和复杂心理。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看，港人的心理中混杂了对中央干预、香港自由丧失以及身份地位变化的恐惧，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才是此次族群纷争的根源。本期周刊就将透过表面的族群冲突，关注中港关系。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回顾引发此次族群纷争的几则重要事件。针对港人在 D&G 拍照被阻等争端，林行止认为，如果港人理性地处理，推己及人，问题或许不难化解；而孔庆东辱骂香港人的言论“不能解决问题，且蔑视法治，丑化香港（甚至内地）同胞”。同时，他也梳理了中联办官员炮轰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的来龙去脉。对于民间的“蝗虫论”，作者红眼由蝗虫的天性说起，关注身份危机——他认为，仇视是一种身份的排斥，仇视大陆人，是因为港人更加认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大陆人对香港人的指点谩骂，也不乏对港人作为中国人身份的不尊重。

新移民申请“综援”、陆生求学香港占据舍位、大陆孕妇赴港产子争夺床位……这些令香港民怨沸腾的事件，莫不围绕“资源”这个核心话题。在 Co-China 论坛讲稿《出·走（三）》中，本土香港人与在港内地人一起，探讨资源争夺问题，分析中港之间关系。在安裕的文章中，他用港人、日本人出国旅游和美国治理赴美生子等例子，为遭受港人歧视的大陆人说几句公道话。去年有三万多个双非婴儿在港出生，约占全港出生数的三分之一，问题看似严重，殊不知这三万多个婴儿中的 96%是有政府认可的预约。《完全错置的双非争议》一文将通过缜密的数据和理论分析，讨论双非问题的性质和起因，指出是医管局估算错误的商业政策带来了如今的双非问题，而“贩卖居港权，才是要堵塞的漏洞”。

可见，港人以仇视大陆人来发泄怨气的做法不过是隔靴搔痒，要真正缓解民怨，政府担其责，各界人士司其职，才是治本之策。具体而言，林霭云认为，双非问题反映了香港医疗产业化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政府要“增加公立医疗的资源投入”，同时也要“限制私家医院唯利是图的行为，限制其不合理的扩张”。蔡建诚则发表名为“欢迎新旧移民、反对官商勾结、反对殖民压迫、建立自主香港”的意见稿，总结并评论了来自香港社会各个方向的声音。对于已遭数万名港人反对的中港“自驾游”计划，朱凯迪和陈剑青指出，港府应该认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张，而民众“更加要珍惜凝聚进步本土愿景的机会，将‘自驾游’这个新危机化为推动本土社会改革的动力”。

其实，此次危机也是契机，中港双方都不妨借此机会理清彼此的关系。香港人或许可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应该捍卫的香港价值？结合对强世功矛盾重重的“香江文章”的解构，陈冠中梳理了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被冲击然后回应”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应怎样理解香港人的主体性。孔诰烽则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今日港人复杂的中国观，并指出，香港在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新闻自由、法治、专业精神等生活方式，正是值得港人捍卫的香港价值。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观】

10-1 林行止：孔庆东 郝铁川 钟庭耀 赵心树

“香港对内地人确具吸引力，显示香港的一制有比内地一制优胜的地方，港人应引以为傲，倒屣欢迎内地人民，没想到却因此肇祸，引爆中港人民内心深处的矛盾。”



中港的深层矛盾，踏入二○一二年，开始酿成表面冲突，造成这种不和谐局面的导因，竟然是先富起来的内地人士过分热爱香港！一月中旬，上千港人包围广东道一名店，皆因该店不想令于店内抢购的内地消费者身份暴露而禁止港人拍相，剥夺了港人的摄影自由，触动了港人的神经；紧接着是酝酿已久的本地孕妇上街抗议内地双非(双亲非港人)孕妇来港产婴分薄港人权益的示威游行；而在这些事件没完没了之际，又发生内地孩童在地车进食被本地乘客怒斥的风波……。这三宗意外，均因内地人喜欢来港购物、相信香港公私医院提供较佳服务及视香港为适合全家旅游的热门地点而起。换句话说，香港既是购物天堂、旅游胜地，还有种种内地所无的福利和自由，使内地人千辛万苦亦要令其后代成为香港人！香港对内地人确具吸引力，显示香港的一制有比内地一制优胜的地方，港人应引以为傲，倒屣欢迎内地人民，没想到却因此肇祸，引爆中港人民内心深处的矛盾。

上述种种，若大家平心静气理性地处理，并把不守秩序不讲法治的内地来客视为可增香港繁荣的必要之恶，许多问题都不难化解甚至一笑置之。试想，如果从尊重消费者私隐、同情双非不惜一切争取后代入籍香港的角度看，大家也许便会变得比较宽容；而那位盛怒大声喝斥地车吃面女童的港人，若考虑乘搭长程火车的人惯于车厢进食及外地来客不知道香港在约四十年前已立法不准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食(当年因霍乱肆虐而立法)，推己及人，提出温馨提示(或警告)，一场小风波肯定不会演变为大风暴。不过，回心一想，港人的火爆情有可原，因为政经现实令香港社会弥漫着上卑下亢的不平气氛。行政长官以次的一众决策性官员，见北大人

那副逢迎阿谀的奴才相，丢尽港人面子，令港人自尊跌至谷底；加上社会不公不义以至贫富两极化愈来愈甚，一般百姓心底有火，路见横逆便恶形恶相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自然不难理解！

促使矛盾尖锐化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获颁教学一等奖及被校长赞为才华横溢……真诚且率直)孔庆东就地车进食事件辱骂香港人，这位自称孔和尚的名学者为此指斥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又说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是王八蛋。又狗又王八蛋，真亏这位北大教授说得出口。非常明显，前句直指香港人，后句连与孔教授有隙曾被他指为汉奸媒体的《南方都市报》亦骂上了。孔教授态度嚣张，口没遮拦(似与真诚与直率有天壤之别)，以低俗偏激的言词挑拨中港人民的感情，徒显他即使学识丰富，品格和格调亦不配当上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地位崇高的北京大学教授。上面这两句谩骂也许是气话，但他还说用法治维持秩序的地方，就证明人没有素质。这即是说，在人人自爱自律的社会，根本无须法治(遑论政府的管治)。不知道这是孔教授的无知，还是借故讽刺一下他的内地同胞，因为中国政府近年正致力于推动法治，依孔教授的推论，那岂非在申斥内地人民不自律不自爱即素质有问题！

孔庆东这番高论，令人看到北大教授的素质参差不齐，如果北大不给他任何纪律处分，那便证明自古以来北京统治者视南方人不忠不爱国(因此不断向南方迁徙)的封建思想未变；加上南方诸省的海外移民百数十年来是内地革命的人才库和财源，而现在香港更是有意向内地输出民主的地方……。北京对南方人成见甚深的态度，由孔庆东不经意地泄露(Freudian slip)出来。

好辩的人会说，孔庆东享有言论自由，他对港人的批评因此不应受批评。这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并没人设法去规限孔教授继续发言的自由。问题是这种不能解决问题且蔑视法治丑化香港(甚至内地)同胞的言论，等于散播敌意，只会带来负面打击而无正面意义，这样的言论又岂值鼓励？

二、

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近来火气甚盛，连续不点名炮轰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指其负责的机构十多年来为特定政团利益服务，换句话说，站在中联办立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向来政治不正确，但何以最近才重槌出击？答案很简单，导火线为该机构一月中旬公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港人只属极少数的民调，这已惹恼郝部长；而更令他不满的是，钟庭耀计划在选委会投票前进行一次谁人当行政长官的民调。如果坊间盛传而从人选来源上看大多数选委的确会按照北京明示暗示投票的选委会，选出一名与变相公投的民调选出不同的人当行政长官，便是京意与香港民意背驰进而令当选者的认受性受质疑；假使选委会的投票结果与民调选出的是同一人，则会予人以前者被后者牵着鼻子走的观感。对某些人来说，那等同京意俯从香港民意，是大失天朝官威的事。面对这种多难困局，郝部长不知如何做才恰可，再轰钟庭耀才显得有点气急败坏。

经验显示，京意向来不当香港民意是一回事(行政长官民望在民调屡创新低而京官照赞如仪便是显例)，因此，选委会选出民调的落选者，不足为奇；为弥补此缺陷，郝部长试图以言文攻势解此尴尬之局，一来显得他注重香港民意，二来可见他致力于拉近京港的差距，不再视南辕北辙是常态。这是郝部长思想比较进取和勇于任事的表现。至于京官(内地的和驻港的)含蓄地或明显地干预香港事务，以至他们对不同道的港人乱扣帽子，已是司空见惯，不必认真看待。事实上，作为外派官员，面对针对性的民情，郝部长又能怎样做？

外派官员，固然无法不照足京意办事，就算只有内地关系的学者，亦可能违背学术良心而作出令自由学者觉得智慧受侮辱的事，这是何以有美国经济学家温馨建议内地出身学者应于文章后注明是否有意回内地发展、家属是否在内地之类的免责声明以使读者知所辨认的原因(见一月十七日本栏)，因为终身教职只能保障学者在自由世界的学术及言论自由，若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内地关系，便得另眼相待。未知周一在他的专栏中略略提及此问题的雷教授以为然否？

循着上述的思路，笔者提议浸大为抢先公布未完成民调风波委出的五人小组，应把传理学院院长赵心树教授的内地关系列为调查项目之一，如此才较易查出真相、平息风波。

（林行止，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创办人，作家。本文转载于《信报财经新闻》，原文刊登于 2012 年 2 月 1 日。鸣谢信报财经新闻有限公司惠允转载。原文链接: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313&cat_id=6&title_id=488528）

【返回目录】



10-2 红眼：蝗虫很多，有一种叫蒙面超人

“北大教授骂港人是狗，我们何尝不是早了二十年将内地同胞从省港旗兵骂到眼下的蝗虫。欢迎光临，这里本来就是人口稠密无以维生，满布积怨和仇恨的蝗虫之城，纸醉金迷的霓虹遮天高挂，来一个，恨一个，吃一个，那是生物本能。”

香港作家陈冠中于回归年代写过一部作品叫《什么都没有发生》，霎眼十载有余，当年这句批命眼下渐已松弛，说它不准。是的，坦克没有辗过维多利亚公园，然而便利店已经有卖红双囍；行政长官依然是香港人，但我们对简体字已经不陌生；小时候班主任都吩咐我们订英文报纸学好外语，趁寒假装备自己，而寒假时节走到街上，如今向我们问路的多数都操流利北京腔。班主任是用心良苦的，陈冠中都没有骗人，绝不是有什么东西即将要发生，相反是有些本来的东西消失掉，清拆重建，甚至是变了质。不是被殖民者的心态被清拆重建那么冠冕，而是近年港产片夹个大陆女明星客串做性感花瓶是常识的这种变质，那么不觉不经，却如潮涌势不可挡。二十年前，我心目中只有一只蝗虫，那只蝗虫叫幪面超人；二十年后，我眼前是每天数以十万排山倒海的访港内地同胞，其中有些更是孕妇。穆桂英那些年都还没有试过这样闯关。

蝗灾为患地上有祸

大抵是从开放自由行的那一年开始，内地同胞多了个丑陋的外号：蝗虫（Locust）。其意象显浅不言而喻，但我们可能只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了解蝗虫的符指意涵，但不多考究过蝗虫本身到底何物。摘自《礼记．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指的就是蝗虫变天。古代人已经明白，蝗虫虽为植食性害虫却不成灾，因为蝗虫本身并不是群居性觅食的生物，而蝗灾的出现其实源于蝗虫变异，因繁衍过剩令种群密度过高，难以觅食温饱，便会选择性地自行改变体色、行为和及生活形态，成群结队不断迁移至新的地方寻找食物。蝗灾对经济民生自然大有影响，但更重要是暗示天时不正，乃至地上有祸。因此史书记载的大部分动荡乱世之始，皆有蝗灾为患。



近日中港的身分危机问题飙至沸点，超越了什么才是导火线的讨论，彷佛胜于年初二夜漫长的烟花汇演，连锁爆发。民间出现的反蝗声音正是一个时局不稳的警号，街上热闹一片，但肩摩踵接间的相互推撞，都用力地闪出火星，火药味刺鼻得凶险，冷瞰的眼线划着粗黑的饿意。假设我们彼此都将对方视为中国人，这种行为不止是内讧的表现，而且正正是蝗虫的天性。如果种群密度持续上升，面临粮食完全缺乏的情况，某些品种的蝗虫将变得非常凶残，身体渐呈黑褐色，翅膀变大，捕食习惯更进化为杂食性，甚至彻底舍弃其植食性的本质，跳跃能力超越其他同类种群，更具侵略性，不止吞食昆虫尸体，甚至连同类都一并互相吞吃。其实我们正是做着这种狗咬狗、人吃人的事情，香港人仇视大陆妇人为了香港户籍霸床产婴，但我们抚心自问有机会的话谁人不愿移民英美？有不少内地暴发户穿金靴挂皮草在香港大肆搜购名牌，同时又有大批港男周末北上东莞酒池肉林，土匪称王的心态不一样吗？北大教授骂港人是狗，我们何尝不是早了二十年将内地同胞从省港旗兵骂到眼下的蝗虫。欢迎光临，这里本来就是人口稠密无以维生，满布积怨和仇恨的蝗虫之城，纸醉金迷的霓虹遮天高挂，来一个，恨一个，吃一个，那是生物本能。

我怀念，怀念幪面超人当红的年代，蝗虫这生物从幪面超人到中国人的符指转移，隐喻香港人回归前后所面临的大逆转困境。八、九十后或不清楚，初代幪面超人本乡猛原是遭邪恶组织进行改造手术的蝗虫生化人，但手术途中趁机逃走，后来反以幪面超人的身分与邪恶组织死战。这悲剧英雄的结构活活借镜了蝗虫变异捕食同类的本性，宣斥着一份从被洗脑改造的殖民时代中获得解放的期盼。一只蝗虫，我们称之为正义的幪面超人，这大概是我们永恒的未来神话；而现实是另一个平行空间，这个世界的本乡猛并没有逃过改造手术，城市一夕间闻风卷来十万只蝗虫，我们压在喉咙底称之为丑陋的中国人。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指的就是解殖这件事。



我们仇视什么你们又统一什么

蝗虫南下，不是香港人骂大陆人专用的，数百年前清兵入关，汉人便就这么如出一辙形容满州人的。要不仇视是不可能的，否则红花会就不会出现，它只能安抚而永远难以镇压，愈是压迫愈是反抗得激烈。因为仇视本身就是一种身分认同，香港人从来都是冷漠自私的都市人，莫说邻居的姓甚名谁，连自己的家人都缺乏凝聚力，但眼下我们最团结齐心的事情，就是讨厌大陆人。皆因被人骂到上门，踩到入地盘。仇富，就是认同自己穷；仇视大陆人，是我们选择了更认同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仇视更是一种身分的排斥，对香港人的那些星云密布的指点谩骂，资本主义什么，被殖民者的什么，以至直斥香港人什么，试问有否将我们尊重为中国人的其中一员？当我们要抢答身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的这些问题，代表对方根本未有将我们视为中国人，把我们当是外人来驯化，岂非与殖民行为同质？统一的是中国但不是中国人，回归的是香港但不是香港人，国族认同不等于思想与身分的同化，如果不计算龙的传人以及炎黄子孙这类源自神话的想象共同体之虚幻建构，中国人根本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意识形态。我们香港人用的是港澳特别通行证，而内地同胞身分证上满汉蒙回藏仍旧标签，更关键是这种清拆先于重建的统一有必要吗？相互的仇视正源自对方高姿态的强求以及我们负嵎的拒绝。清朝尚且以满汉一家亲的方案治国，眼下凭什么要我们弃用广东话改写简体字？保守估计，蝗虫本身都有一万种以上，何况是中国人。

只恨这个年代还没有铁臂铜拳风雷电的出现，蝗虫很多，有一种叫幪面超人。

（红眼，《明报》专栏作家。本文摘自《明报·星期日生活》。）

【返回目录】



【析】

10-3 我的中港观——Co-China 论坛“出·走（三）”讲稿

“公共医疗系统的服务质素下降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私人医院向公共医疗系统仅存的医生挖角？为什么私人医院不管香港的人口政策，而是要不停赚内地人的钱？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些。......很多内地人愿意来这里，是因为觉得香港有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法制，我们的社会保障，我们的新闻自由，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愿意来了，这才是真正悲惨的。”

按：此文根据「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①出•走系列第三场对话编辑整理。

讨论嘉宾：

陈景辉：香港本土行动成员，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戴竞：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生，2006 年从内地来港读书。

何秀兰：香港立法会议员。

耿春亚：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

邹君逸：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学生，香港出生。

主持：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采访总监，九十年代中从内地来港工作。

邹君逸：我在中文大学主修政治，除了学生会里少数同学，更多的香港同学只是关注香港本土的事，内地生也只是内地生的圈子。像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还有派钱的事，这些在大学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讨论。不过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香港，对大学同学来说也有更实际的问题。比如我们书院近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宿位的问题。内地生算国际学生，他们是一定会有宿位的。



大学宿舍的宿位就那么多，内地生占用得多，本地生自然就少了，这就引起了很多本地同学的不满。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我认识的一些同学住屯门，回中大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也没有宿舍住。再比如我认识不少朋友是读商科的，他们说四大或其他一些大公司越来越倾向请一些在香港或在国外读书的内地生，因为他们有语言的优势，在香港和国外读书的内地生英文往往没有问题，普通话又是他们的母语，这对于那些今天要经常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公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造成一种不安的情绪。

闾丘露薇：你刚才说到宿位的问题，其实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这和内地孕妇来港生产很相似，你们有没有同校方沟通？

邹君逸：我们也尝试和学校谈这个问题，但是很难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例如我们书院有一千个宿位，其中三四百个是留给内地生的，因为大学当初在内地招生的时候就承诺了一定会给他们宿舍住，那我们能争的只是剩下的六百个，是给一年级学生住还是给三年级学生住，讨论只可以在这里。当然也会有本地生质疑中大为什么要收越来越多的内地生，是不是因为内地生要付更高的学费，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学会不会越来越商业化。

闾丘露薇：戴竞，你是从内地来的，一定听到很多本地生的回馈，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讨论？

戴竞：讲到内地和香港本土的人才竞争问题，这点我也挺有感受的。我有两个中学同学，本科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念的，念完之后他们都来香港找工作，一个去了巴黎银行的投资银行部，一个去了花旗银行，收入都非常好。香港同学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不难想象他们心里的感受，这些工作在香港的同学看来是最顶尖的，现在都被内地学生抢了，所以他们有一种恐慌、一种无奈。我之前的舍友是香港人，他觉得香港学生在内地学生面前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以前觉得自己英语好一点，后来发现内地来的学生，特别是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他们的英文也很好。这就让香港同学觉得恐慌。

闾丘露薇：我们刚才讲到内地人才给香港带来的冲击，那内地学生来到香港之后，有没有发现香港的优势？还有，你们自己怎么定位自己在香港的角色？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要为香港做点事情？还是说我只是一个过客，我只是来这里赚钱，这个地方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戴竞：至少我自己就非常愿意为香港社会作一些贡献。我是学经济学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作业，香港每培养一个本科生，每年的成本是 20 万港币，但我们的学费是 8 万港币，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补贴了 12 万。而我当初是拿奖学金过来的，也就是 8 万也免了。所以我是一分钱不花就来香港接受最好的教育，享受最好的服务，住最好的宿舍，听最好的老师上课，用最大的图书馆。我在香港这几年学到了非常多，无论是知识，还是阅历----包括我去台湾、去美国的一些交流项目----这些机会都是香港社会和中文大学以及出资赞助我的人给我的。如果我一毕业就跑了，别人也许不会怪我；但是我觉得做人要厚道，能够报答别人就报答别人一点。以我自己经济学的背景和我在银行实习的经验，想进香港的商业机构，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不是很难。但是我毕业后想做记者，一方面可以见识到非常多的事情，另一方面记者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行业，它促进信息的流通，让大众更了解社会，我愿意通过从事记者这个职业来报答香港社会。

闾丘露薇：你的这些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是在香港学到的还是说你以前就有？

戴竞：是我爸教我的，我爸是那种时刻关注社会兴衰、苍生冷暖的人。但我想我在内地生中应该是一个特例，大部分的内地学生更关注自身的发展。

闾丘露薇：你觉得香港社会有没有更多地教会你们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比如你说的那些只关注自己发展的同学，他们在香港几年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戴竞：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刚来中文大学的时候，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的学生会居然动不动就把校长的头像贴得满校园都是，又是整蛊又是丑化，这在内地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相信对内地的同学，无论他是不是关心公共议题，这种自由的氛围多少都会有冲击。每逢到敏感日子的时候大学就有很多讨论，我们的学生会又很喜欢发各种各样的邮件，表明我们要抗议什么，争取什么，我觉得这些对内地生都会有影响。还有，香港的学校很强调社会服务，一些交换的项目都希望申请者有社会服务的经验，这对于同学也是很好的公民教育的机会。

闾丘露薇：邹君逸，刚才听了戴竞讲的，你觉得越来越多的内地生来港，是不是真的造成了本地生的恐慌？

邹君逸：与其说恐慌，不如说我们大多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香港同学知道我们的优势没有了。在中大有一个交流计划，每年有几百个同学可以回内地实习，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为

什么？因为现在很多雇主都希望你有在内地工作或者实习的经验，那就有很多香港本地的同学愿意参加这样的计划。现在普通话的课程也越来越热门，我们都在尝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挑战和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很接受这一点。

闾丘露薇：刚才戴竞说香港其实也给他们很多影响，你觉得香港同学是不是可以带动内地同学参与一些公民行动，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邹君逸：我修过一门中国外交与政治的课，有一次我们做 presentation，正好有一个从内地一所名校来交换的女生，她和另一个台湾来的同学明显有观点上的冲突。那位内地来的女孩子问，你们觉得民主究竟有什么好？你们台湾民主了这么多年经济还不是越来越差吗？这个问题让台湾的同学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虽然其他的同学也都加入讨论，但最后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尤其当我们讨论民主、自由的时候，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同内地生的观点完全不同。比如他们会觉得我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他们说中国一民主就会乱，但我们觉得这种推论是完全没有理据的。讲来讲去，最后发现双方根本不可能沟通。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实在没必要再争论这些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不觉得香港同学可以带动内地的同学参与一些社会运动或公共事件。

闾丘露薇：戴竞，在这方面你的感受如何呢？

戴竞：我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同学，他在一堂课上和香港同学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敏感的历史事件，这个内地同学就说我认为当时政府那么做也有合理的地方，他还没有说下去合理的地方在哪儿，这个香港的同学就说，你被共产党洗脑了。后来，这个内地同学跟我说，他觉得非常委屈，他说他只是想理性地讨论，可是他还没有讲理由，就被贴了标签，那这样的话大家如何对话？在讨论到自由、民主这些话题的时候，很多香港同学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答案，如果你和这些既定答案不同，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被洗脑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前任港大学生会的会长，因为他在这个敏感事件上发表了不那么符合香港主流观点的看法，结果就被港大同学罢免了。很多内地来的同学觉得这就体现了民主的暴力，为什么他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就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双方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前提，没有讨论的价值基础，所以在涉及到和政治有关的问题的时候根本就无法沟通。



闾丘露薇：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发生在校园里的问题，其实在校园之外不同背景的族群也会有这样的冲突，互相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陈景辉，你觉得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陈景辉：刚才那位从内地来的同学提到六四，我想解释下为什么他的香港同学在这个问题上会认为根本不需要辩论。六四的问题对香港人来说，至少对依然对这件事有记忆的香港人来说，这不是理据的问题、论点的问题，而是一个亲身经历切肤之痛的问题。基本上香港人在八九之后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虽然很快又打回了原形。

说回到新移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和旧问题的混合。香港人为什么歧视新移民？其实十多年前的居港权事件就已经有很明显的体现。按照基本法，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也可以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1998 年香港终审法院依此判决一个无证儿童实时拥有居港权。此例一开，很多人都向入境处申请居港权。当时的入境处处长叶刘淑仪估计十年内会有 167 万内地人来到香港，而香港只有 600 万人，突然间多了三分之一的人，这让香港人很恐慌。后来香港政府请求人大释法，释法后只有香港人在内地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从那时候开始香港就有一种歧视新移民的风气。

那今天又出现了本土力量。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判断，但我觉得他们依然指出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切实感受到的。譬如你去到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讲普通话。我们以前去西洋菜街，基本上就是开讨论会，或者发传单、征集签名这些，但现在你会发现那里几乎全部都是内地游客。还有内地孕妇来港生产的事，现在的情况很夸张，每年香港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是内地孕妇生产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在香港的知识界，对本土力量有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班本土力量的朋友是一些排外的人，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而忘记了香港其实也是一个移民社会。他们甚至认为在派钱这样的事上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我们几年前做本土行动的时候，其实香港知识界就有一种声音，他们说什么本土本土，香港本来就是移民社会，更何况将来我们要和内地融合，为什么还要这么强调本土。

刚才讲的这些是现象，现在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第一，我不支持本土力量说新移民是蝗虫的说法。但我不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认为分配社会资源不应该强调香港人身份，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本土这个疆界不重要。我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新移民是即将会成为香港人的公民，新移民是一些潜在的、未完成的公民。他们其实就像未满 18 岁的孩子----只是没有在香港居住足够的年限，因此不能享有所有香港公民具有的权利，譬如投票。所以问题不是说香港的财政资源应不应该分配给一些不是公民的人，而是说香港这个社会怎样可以更好地对待公民社群的成员，包括那些即将成为香港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本土力量。

第二，我想说我们也要同情地去看本土力量的观点。他们的种种反应，无论是对香港的公共医疗系统，还是香港的财政资源的分配，都是因为作为香港公民，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决策。于是当他不能参与城市进程的时候，那种不由自主的失落，就会促使他们去找替罪羔羊。但本土力量似乎忘记了最根本的因素。公共医疗系统的服务质素下降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私人医院向公共医疗系统仅存的医生挖角？为什么私人医院不管香港的人口政策，而是要不停赚内地人的钱？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些。

这种自主的失落不应该找替罪羔羊，而是应该找我们和内地共同的地方。其实当我们说身份认同，当我们说是否爱国，当我们说国家重不重要，这些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祖国。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家，我们是没有祖国这个概念的，我们的祖国是被偷走了，香港人的香港政府也被偷走了。但窃取者不是新移民，而是那些搞专制的人，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在这点上内地和香港很相似。这不是是否民主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那些重要的属于我们公民的东西被一班人控制了。内地每年要用 6000 多亿去维稳，这些钱让国保去找人喝茶，让一些人失踪，让内地同胞在内地看不到自由的新闻。香港也在变化，香港人以前去中联办、新华社这些地方示威，警察是不会乱来的，但现在只要问题涉及内地政府，香港警察就会变成国保。

再具体谈谈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事。有一些内地朋友会认为我给这么高的医疗费让香港的医院去赚，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呢？这无非是一个愿买愿卖的过程。但我觉得问题在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究竟是不是可以买卖的。内地孕妇当然可以来港生产，但初生儿是不是一定就要是香港人？作为一个香港人确实很难想象，每年有一半的新增人口是内地人在香港生育的，而且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另外，我很反感那些让内地孕妇来港生产的中介公司的宣传理

由。他们鼓励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理由多是香港有十二年的免费教育，有公屋住，有综援拿，我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说香港有投票权，有言论自由，香港没国保？我不满的是这些中介公司只是兜售香港的福利。

最后一点，我觉得对本土的价值追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只有强调本土，才会让我们维持一个好的香港，也才能让内地变得更好。

闾丘露薇：我补充一个背景。我们在讲香港新移民的时候，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香港或国外大学读书之后在港工作的人，7 年之后可以申请香港特区护照，选择成为香港公民；第二部分，也是媒体上讲的更多的新移民其实是用单程证来港的内地人，每天有 150 个名额。这些人离开内地的时候户口会被注销，他们来到香港之后拿一种叫 DI 的东西。我当年就是拿 DI 过来的，在成为永久居民之前拿 DI 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很难去旅行，因为没有多少国家认识这本东西。另一方面，他们也回不去了，如果回去内地任何的福利都没有，因为他们是境外人士。这次港府派钱一事引发了香港人和新移民的冲突，我想问下何秀兰议员，香港政府在考虑这些福利政策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短视？

何秀兰：有一个前中央政策组的、香港人很尊敬很信任的研究员，从日本回到香港，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以他认识曾荫权和曾俊华那么吝啬的性格，是不可能发六千块的，他们肯定是被阿爷要求的，所以就发得这么不情愿，也不去想后面的细节究竟应该怎样。在国外，大家游行通常是因为政府穷；而我们游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有钱乱发，我想这可能是全世界首例因为政府太有钱而引发的冲突。这样派钱，除了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最大的后遗症是引发了新一轮的歧视和分化。

刚才陈景辉提到香港人的身份问题。其实谁才是香港人？有一类人叫原居民，他们大多是新界农民，这些人一出生就享有丁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修建不超过 3 层的每层不超过 700 呎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为什么要给他们丁权？殖民地时期政府要收地去开发，修路、建楼宇，因为要收他们的农地、鱼塘，为了安置他们，就给了他们丁权。这些享有丁权的人一出生就至少有 200 万在身。如果以法律和历史来看，他们才是香港人。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是原居民。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以前的香港人对从内地偷渡来的人很友善，因为他们自己大多也是逃难过来的。所以以前殖民地政府不会让香港警察去边界巡防，那些香港警察会放偷渡者过来。偷渡者过了边界，去到锦田一些地方就会碰到香港居民，这些居民会让他们在家中暂住，借电话给他们打回给内地亲友，给他们钱让他们坐车到市区。那个时候是不存在对新移民的歧视的，因为大家的身份和背景都很相似。

80 年代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歧视。80 年代初，香港每年新增 10 万人口，除了香港本地出生的人，更多的是申请或者偷渡来的。当时香港有很多建筑工地，有不少工作机会可以容纳这些新移民。那 10 年中有很多单身男人从内地过来，在香港做苦力。他们一直过着卑微的生活，不能够成家立室，于是很多人又回内地娶老婆生孩子。

香港其实是有能力容纳新移民的，所以现在每年 5 万的单程证来港并不是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个人和个人之间可以共处，但当政府插手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们香港政府经常是点金成石，他们一插手事情就糟糕了。九十年代末的居港权之争，当时不单是叶刘淑仪，政府出动了全部高官去强化 167 万人的恶梦：他们说这些新移民会来抢你们的工作；他们到了火车站站台就已经开始问怎样领取综援；他们一定是二奶，或者是二奶生的孩子。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萧炯柱，他是一个我很尊重的官员，他那时候都讲如果有 167 万人过来，香港的排污系统是受不了的，每个人冲一次厕所，我们的排污系统就会垮掉。那时的政府发动传媒种下的祸根到今天都还有影响，本土力量将内地人比作蝗虫其实就是那时延续下来的恐惧。

到了今天，对新移民的歧视主要集中在香港社会的底层。为什么？因为新移民不会影响到有钱人和城市中产，他们巴不得多一些内地人过来，买多几个 LV、Prada。但是对底层的民众来说这种影响是很实际的。比如他排了很多年等公屋，就快轮到他的时候，突然说，有一个新移民是单亲妈妈，她的情况很凄惨，因此她要插队，这种时候他会怎样想？所以说新移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资源分配的问题，只是他们用新移民来做替罪羔羊。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很多恐惧，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最容易被政府哄到，当政府告诉他们新移民过来就是占用你们现在的资源，他们的抗拒当然会很强烈。



我自己希望香港在面对新移民问题的时候，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说我们是大都会，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一个熔炉。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根基有信心，我们在保持自我的基础上也有能力吸收外来的文化，让这个地方因为有不同的元素而越变越好。很多内地人愿意来这里，是因为觉得香港有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法制，我们的社会保障，我们的新闻自由，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愿意来了，这才是真正悲惨的。

闾丘露薇：耿春亚，你作为一个从内地来香港很多年的新移民，你怎么看待香港人的身份问题？

耿春亚：我来香港已经 8 年多了，但还没有申请永久居民，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要申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领综援，也不可能去申请公屋，所以我不觉得香港身份对我来说是一件必要的事，相反我倒是担心如果申请了香港永久居民，那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公民的身份，这是我不愿意的。

刚才谈了半天都在谈香港，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不要只是谈那些犄角旮旯的事儿。其实哪儿没有歧视呢？上海没有吗？北京没有吗？城市的人会不会歧视农村的人？歧视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的感觉。我想在座的内地人应该没有哪个香港人对你说过我歧视你这样的话吧，所以我不觉得香港社会歧视新移民是个问题。在华人世界，我觉得香港已经是最好的了。刚才大家谈到人才竞争的问题，坦率地说，竞争不仅仅是在内地同学和香港同学之间，而是和你美国的同学、英国的同学、北京的同学之间都会有竞争。我反而觉得香港同学和内地同学应该团结一心，想想怎么把学习搞好，怎么找一份好工作。

我们再来看派钱的事。我到香港 8 年了，但我不会领这 6000 块，说实话，我觉得受之有愧，这 6000 块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新移民该不该有这 6000 块呢？在座的从内地来的各位，你们来到香港对香港社会的价值就已经很大了。你们头 20 年的培养成本是你爸妈承担的，香港政府没有负担过，你们现在来了就是资本，就是价值。包括那些拿单程证的人，就算他们没有工作，要领综援，但他们的消费对香港社会产生的推动都远远不止这 6000 块。如果我是香港政府，我就大量引进移民，我一年就给你 6000 块。

接着说生孩子的问题。这也没什么可争的，这个事情很简单，政府多投资办些医院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引进内地的资金和人才，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还有教育的问题也是一样，政



府增大投入就可以了。内地人来得越多越好，对香港社会而言，这不会造成什么负担。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他们能给香港创造价值。

何议员提到底层人士感受到新移民带来的压力，当然政府在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政府不好怎么办？那就换嘛。但政府是人不是神。说到底政府的问题就是一个领导力的问题。我自己创业我很清楚，当领导是很难的事。我创业的时候，头几年一路走过来都是被人骂，但做得不好、不成熟是我的错吗？不成熟是必然的，政府也一样。香港过去没有自己的政府，从 1997 年到现在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他还处在创业期，所以大家要给他机会。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这个领导是很难当的，不信你来试试，你试试看你能做到什么水平。

社会发展，人人有责。大家应该要先做好自己的领导，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只有你领导好自己，以后你才可以领导更多的人。领导更多的人不是为了独裁，不是为了专制，是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工业家蒋震先生，他是当年从山东逃难来香港的，他的蒋震基金会做了很多慈善项目。他就讲他今天的成就是香港给他的，所以他要回报香港。今天从内地来这里读书和工作的人，香港这个城市也给了你们很多机会，所以不要总想着受歧视，应该要想该怎么回报社会。

另外一点，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这些在香港读书之后留在这里工作的人和那些用单程证来港的人区分开。现在有一个词叫港漂，这个词就很好。我们是港漂，新移民指那些用单程证来港的人，两者需要帮助、需要培养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今天在座的内地人，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没有那 6000 块不高兴，那 6000 块对你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新移民可能就很重要。作为港漂，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自己，面对社会，面对香港，面对内地。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但最基本的是——做好自己的领导。不管是思想还是行为，先做好自己的领导，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做好自己，领导好自己，然后大家在一起就能更好地生活。

闾丘露薇：针对耿春亚讲的，我想提两点。第一，每个内地来的新移民，当你在香港住满 7 年考虑是不是要拿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不该被忽视的，就是你可以有选票，你有了选举权，这对于在内地成长的人来说是他们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经验。另外，这 6000 块钱的重点不是说你个人需不需要的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一项公共政策，既然是公共政策我们就要去讨论它背后的理念和思路。



李怡前阵子在《苹果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内地恶质社会影响香港的又一个例子。所谓的恶质社会，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贪污、行贿、不排队、不守秩序等等，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之后，会把这些也都带来香港。其实我想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担忧。我自己来香港十几年了，坦白讲我是觉得香港现在的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确没有过去好。我自己也见到过一些事，比如有的从内地来的同学会给老师送礼希望能给他一个好成绩，这样的事情可能对香港本地的同学来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但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的融合是无法避免的。人总是要来，这些不好的习惯也一定会被带来香港，所以我想问一下何秀兰，你觉得香港政府在面对这些必然要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何秀兰：文化的融合，其实由政府去做是不够的，也不会做得很有效，最大的能量是在传媒。无论是推动融合还是撕裂社群，传媒的力量都是最大的。这就需要社会上一批有影响力的，拿着笔或者拿着麦克风的人，大家一起打开自己的视野，平等地看待不同地方的中国人，甚至不只是中国人。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像刚才耿先生讲的，可以增加宿位，令大家对资源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但除了资源调配，在文化方面政府能做的很有限。这点可能和内地不同。在香港，政府的管制方式是通过法律，而法律只是管普通人不要谋财害命，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做坏事，但是法律是不会要求大家做好事的，不会说你今天没有日行一善就要罚款。这可能是香港和内地的一个差异。我以前回内地听大家讲五讲四美，要这个美那个美，到处都在宣传，政府机关也挂这些口号出来。要是香港政府说这些，大家一定会笑。

其实香港和内地最大的边界不是深圳河，是两地不同的法制。香港要再进一步发展，应付越来越多人口的时候，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和深圳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如果没有法制作基础，没有社会秩序作基础，我相信绝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愿意。香港人的恐惧，不是恐惧内地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商业交往也没有问题，香港人恐惧的是中央政府那一套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另外，刚才耿先生讲的有一点我必须要澄清。香港政府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我也想换政府，但是要 50 万人走出来，要中央点头才可以换----其实不是 50 万香港人换，是中央政府换，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压力大到让他们换而已。人人有责我非常同意，但是也要人人有权才

行。如果不是人人有权的话，对不起，责任就不在普通人那里，而在政府那里。当我有责任纳税的时候，我是对你有要求的，我不管你成熟不成熟，不成熟就不要做，不够经验就不要做。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机制，而我们迟迟没有这个机制是因为中央政府的问题，这也解释了香港人为什么对内地的管治有担忧，有恐惧。因为这种管治是会拿走香港现在的自由和权利。

现场观众：刚才何议员提到香港将来或会和深圳融合，我想这个说出来大家心里是很抗拒的。我想问陈景辉，香港人应该怎样去考虑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之间的所有交往我们都要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两个专制政府之间的交往？还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是赞同或者鼓励双方的融合？

陈景辉：当然不是所有的融合都要反对。我就很希望香港的艺术界能和艾未未融合。如果香港艺术界有艾未未七成的能量，那我想一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香港人都会加入关心公共事务的行列。我另外一个身份是八十后社运青年，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想把社会运动变得有趣，通过艺术的、视觉的手段，让民众更容易接受，而艾未未做的就正是这样的事情。他在汶川地震后做了公民调查，用表格平实记录下地震中遇难的学生的数据，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他读几年级，就是这样的简单的表就已经很震撼。还有刚才戴竞提到六四的例子。我觉得香港的同学不妨接接招，听听内地同学到底可以怎样理性地为专制政府辩护。香港人会认为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政府不可以将武器对准自己的人民，尤其当他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的时候，但不妨听听内地同学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检视我们自己对六四的认知。

这样的融合和交流是很好的，但有一些东西确实不抗拒不行。譬如我们最近说要和珠三角融合，但是福岛核事故之后我就很害怕，因为广东将会成为核电大省。其实 1987 年我们就有 100 多万人签名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兴建，当然那个反对没有用，它还是建了，但我觉得香港应该要去监察这些核电厂。日本的核电技术非常发达，他们的管理能力也很强，但都造成这么大的危险。而中国内地的管理能力大家都清楚，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另外，针对耿先生刚才的发言，我想谈谈我的观点。我听下来的感觉是原来什么都不是问题，只要你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国家的事情你不要碰。而这正是我们极力反对的。今天的香

港和内地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公众都很少参与公共生活。在内地，大家参与公共事件是需要付出代价，可能会被抓走，可能你的家人朋友会收到连累。在香港，经常参与社会运动的永远就是那些人，大部分人都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这种公共生活感的薄弱是香港和内地共同面对的问题。

耿春亚：很多时候我们把国家机器想象得太厉害了，实际上它也是由人构成的，我们反对它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它不够了解。你现在反对核电站好象特别伟大，因为这容易引来传媒，会有特别的效果，但是远远不如你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讲请你今晚回家之后少开一盏灯，洗澡的时候少用一点水，这些东西反而力量更大。我们解决问题要有一些本质的思考，如果电的需求减少了那为什么还会建核电站？政府又不是疯子。实际上大亚湾核电站对香港不是最大的威胁，利比亚的核电站才是。法国政府和利比亚签合同在利比亚建核电站，所以是不是我们都上街去呼吁法国政府停止在利比亚建核电站？这样的呼吁你认为会有用吗？所以一个人当他是什么角色的时候就应该去做什么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莫以善小而不为。我很喜欢香港人的一点是香港人的务实，比如我们平时在街头、在银行经常能看到那些普通人在捐款，可能是因为四川地震，可能是因为东南亚海啸，这样的事情在内地是需要被号召被呼吁的。我最终选择留在香港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香港人从小事做起的这种务实精神。

现场观众：我们过去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今天的中国是达则独善其身，中国的精英都在往外跑。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有 180 万人出国留学，只有不到 40 万回国。有 150 万人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来香港。中国的精英都跑了，中国怎么办？

耿春亚：其实现在有很多特别优秀的海归回去中国做高级官员，我接触过的一些真的是非常优秀，他作为一个副部长可以在香港跟我吃麦当劳，说我们来做一个慈善项目，中国不缺这些优秀的人才。文化大革命让很多人没机会接受教育，我们不该责怪由那一代人组成的政府，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学。但是现在这一批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验，我相信我们的官员会越来越好。

何秀兰：离开不重要，香港也有很多人离开。之前中文大学生物系整理过一份从 60 年到现在的毕业生名单，有二分之一的人现在都不在香港。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只要他的选择不伤害别人，只要他带走的钱不是贪污得来的，这就没有问题。



现场观众：反对总是很简单，但反对之后呢？比如刚才说的核电站，我也不赞成用核电。但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关了大亚湾，香港会怎样？我想有一半的地方都会处在黑暗中吧。关于大陆孕妇来港产子的事，我现在就怀着孩子，马上就要生了，但我不再是大陆孕妇，我几个月前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其实人口政策这件事，不但是公民身份的问题，也是人口结构的规划问题。一个城市能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不断有新生儿出生，那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去乡下，比如从香港回到广东？让那些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的人进来，那些需要养老、需要接受社会福利的人出去，这个社会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源调配，才是一个平衡和健康的社会。我很欣赏香港讲自由，也很欣赏刚才何议员没有强调民主，而是一直在强调自由。其实自由和民主不完全一样，比如新加坡，我们觉得它很自由，但是它是不是很民主呢？它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集权国家。但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得好？香港总说要学习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由的同时又用一些集体的政策令香港发展得更快？

何秀兰：如果政府反对大亚湾项目，那大亚湾核电站是不是一定要马上关？马上关了人们是不是就没有电用？您刚才举的例子只有在大跃进时代才会发生，香港是不会这样管理的。香港会经过很长时间的咨询，然后会很细致地去思一些行政措施。所以即使我们决定了政策的方向，也不会明天马上就做。一个成熟的、有管理质素的政府是不会这样的，如果它要这样做的时候，换了它吧，当然前提是我们有能力的话。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在现代政治里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作为一个准妈妈，你一定很希望这个社会是适合你的孩子将来生活，是一个你认为的理想社会。但有些事实我们要搞清楚。首先，新加坡是没有自由的，最简单的在新加坡不可以吃口香糖，新加坡的电梯里有闭路电视，因为政府害怕有人在电梯里随地小便。新加坡禁止很多东西。其次，新加坡是不是成功呢？每个地方都说自己是最好的。但他们也有很多精英出走，破产自杀的人也不少，新加坡也有它的问题。

关于人口的流动，我不希望老人家因为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要被转移去广东，很多在香港住了七八十年的老人家，你要他从湾仔搬到天水围，他都可能会抑郁大半年。如果要他们移居，这是很不人道的。如果要立法，那这件事就值得有 200 万人走出来去冲击政府。香港是个尊重大家有自由选择的地方。既然大家可以在这里享受到自由和权利，也应当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陈景辉：自由和民主有时候的确可以分开。自由是不受侵犯的权利。我喜欢这个时间生活在这里，那个时间生活在那里；我喜欢只是关心我的生意，不关心投票；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没有干扰别人，政府就不应该管我，这是自由的问题。香港是有这样的自由的，但它缺乏的是和民主直接相关的自由，那些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的理由，我们参与国家、社群的公共生活的自由。这种积极的自由是无法和民主分开的，在这个层面上香港和内地是一样的，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

耿春亚：我特别不认可一句话：香港没自由。如果香港都不算自由，我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儿有自由了。坦率地说，香港政府的确是做得不好，但是我更知道有一些人是绝对不能来领导香港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寻找，我也希望选出有领导力的香港特首和香港政府，我们有自己的准则和标准。现在普选已经在时间表上，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大的机率看到这一天。大家没有必要再拿普选来借题发挥，这件事政府也想做。坦率地说，曾荫权也是打一份工，他何必为难香港百姓呢？能够争取的他一定会争取。没有人想把香港搞糟，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中国政府比我们还不希望香港变差，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网络提问：是不是所有去到政治空间更自由、更民主的地方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政治素质和觉悟？

何秀兰：答案当然是不会。有很多人因为自己享有了权利，就忘记了未能享有权利的人。可能他自己以前受过压迫，但他凭个人努力成功了，他就会很容易地说我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不可以？肯定是因为你懒惰，因为你能力差，我们的特首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很努力，只是因为一些限制或者欠缺一些运气，他们没能成功，但我们不仅不该歧视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还要更多地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我们并不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改变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这个社会会很疲累。作为市民，你遵守法律，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正常纳税就已经是好市民了。但是好市民和公民是有分别的，公民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还会关心他者，关心其他受苦的人，遭遇不公的人。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公民，但坦白讲如果能有 5%的人是公民这个社会就已经非常好了，不幸的是香港大概只有 0.005%。

社会的变革有很多因素，但人民的力量一定是最不可缺少的。香港现在的法制、社会秩序是好的，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在制度上去改变内地，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在文化上去交流、去互动。要换一个政权，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要换一部宪法，可能要三个月，但要让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上可能需要二十年、三十年。我很同意耿先生的话，除了制度建设以外，我们个人也要身体力行。这一点点的改变，积聚到某个程度就会开花结果，我们不能够心急，也不能放弃。

文稿编辑：杜婷

文稿整理：浪子、黄海、黄庭坚、Stephen、田悠、冯自强、黄隽咏、笑奇

延伸阅读:

出•走（一）
https://cochina.org/2012/02/%E5%87%BA%E2%80%A2%E8%B5%B0%EF%BC%88%E4%B8%80%EF%BC%89/

出•走（二）
https://cochina.org/2012/02/%E5%87%BA%E2%80%A2%E8%B5%B0%EF%BC%88%E4%BA%8C%EF%BC%89/

【返回目录】



10-4 安裕：说几句公道话

"这些讨论日益远扬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沦，以至让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陆人欺侮。公道一点说，香港今天是沉沦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归时沉沦。我所说的沉沦，是这个城市已不是一个人人敢于说真话的城市，是这个城市再也不是一个人人勇于承担的城市。"

初到贵境总是撞板多过食饭。纽约可说是我第二故乡，前后住了七年，到今天我还能背诵上西城一二三这三线地铁的每个站名，西六十六街林肯中心、七十二街、七十九街、八十六街，然后是我住的九十六街，之后是分道两线直上一一六街哥大正门。纵然变了半个纽约人，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找我帮忙接待内地和香港的纽约访问团，却是要走的那天还是乡巴佬。

说乡巴佬，是因为纽约有着一些历史悠久的法例，今天说起来都会让人莞尔。其中一条是不许在街上喝酒，哪管是几乎没有酒精的 Miller Lite。喝过这种啤酒的都知道这酒骗人，百分之四的酒精，还不是等于水？夏天纽约极为干热，华氏一百度以上天天都是，下城区回家钻出地铁，有时去小店买一罐喝。每次小店老板都给我用一个小小褐色纸袋包着啤酒罐，我每次一出门就扔掉纸袋。直至一天，有个军装警员走过来，竖起食指摇了又摇。我瞪着眼睛不明所以，他走过来说：这是犯法。

纽约有些笨法例一直执行到今天。以不能当街喝酒为例，这不像禁止抽烟那样是因着健康原因，而是这条法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禁酒令年代立下的。这是当年芝加哥黑帮头子卡邦（Al Capone）发大财的来源，一九八七年荷李活有一部大卖电影《The Untouchables》由奇云高士拿和辛康纳利主演，罗拔迪尼路饰卡邦，说的就是财政部特工奇云高士拿和老差骨辛康纳利对付卡邦的真人真事。今天美国再没有像当年雷厉风行的禁酒令，但不许人们当街喝酒一直流传到今天。那次，警察先生说，再喝就要开罚单，原来除了违例泊车，连街上喝酒也有定额罚款。



笨法定了也得执行

法例虽然笨，可是既然定了就得执行，本人阮囊羞涩，没有可能为了喝酒权利打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请九个大法官解释这条禁酒令如何与世相违，只能当笑话笑了笑，反正在家一样可以喝，差那几步不至热昏街头了吧。类似的事不仅美国有，另一文明大国日本也有，朋友八十年代在东京上学，人住上野，遇上交通休整周，他却实践港人分秒必争精神，眼看车道来回五十米汽车全无，在行人过路灯仍闪着红色时大步跨出去。对面一个维持交通安全的义工婆婆一手把他截着，下场是罚他来回过三十遍马路。为什么不争辩？外国人哪知这交通条例，况且婆婆的北陆口音也听不懂。

事隔多年，当我读到一个中国大陆妇女在香港地铁车厢和小孩吃东西的新闻，就不由自主追看下去。当然，想不到的是，这场小小的地铁车厢争执，被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纲上线变成了香港人不说普通话、香港人欠揍、香港人是狗这些话来。我甚至有几天疑心大发，觉得中联办郝铁川部长和孔庆东教授是一鼻子出气唱双簧——孔先生说香港人不讲普通话，言下之意是讨厌香港人自外于中华民族；郝先生谈到中国人和香港人在民意调查里的意义。时间上一先一后，却让我这好事之徒老是觉得事有蹊跷。这是后话，容后再说。

从 D&G 到双非孕妇来港抢闸生孩子，乃至地铁车厢吃东西事件，三样事掀起了小至中港文化不同，大至香港必须独立脱离中共魔掌，中间还掺杂要坚决阻止蝗虫来港生事的年轻人。这是深圳河两边的事，有一种传统看法是，除了新界原住民，我们上一代都是新移民，在四十年代末中共快要席卷全国之际，拖男带女把家当都带来这南方海岛落地生根，浸浸然有着我也是原住民的睥睨天下心态。另一种论说则是大陆人来香港抢了我们的繁荣抢了我们的工作抢了我们的法治，还把我们的干净整洁明快都抢去，例子是当街大小二便以及在广东道呼卢喝矢。一派则以香港是我家为大纛，大陆人入侵，乱我香港。

今天还在说原住民与过客，这种调调无疑脱离了现实。今天的香港，只要有身分证便可以按照法例留在这里，现代社会市民的身分（identity）已不是纯粹血缘已能解说。以台湾为例，理论上台湾至少有几百万人是一九四九年随着蒋介石渡海而来的外省籍，可是今天这些人都是

台湾人而不是大陆人。中共就是如何希望统一台湾，都没有胆量在省籍上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分开对待，台湾人民这四字说明一切，是政治名词而非地理名词。

同样地，如果香港今天事事都把原住民找出来做挡箭牌或者作为面对新世代的遁词，在历史因缘而言完全说得通，但客观上这些现代社会的原住民严格而言也不一定全是货真价实的原住民——明朝南来的原住民到今天都六百多年，这六个世纪间，建设香港的不止是当年南来的那一群了吧，清朝康熙及嘉庆年间先后有两个版本的《新安县志》，这是香港的最早地方志，首都博物馆有一套，中山大学的一套则由叶灵凤先生捐出来的。有兴趣不妨一读，当知原住民的来龙去脉，对今天各种相关说法自会搞清楚弄明白。

身分非血缘能解说

香港是移民城市，和纽约洛杉矶悉尼温哥华都一样；没有人可以从方物志的精确考究而言是真正香港人，就等于纽约人是纽约客（New Yorker），高克毅先生把这个英文字词翻译得出神入化，纽约一千万人，意裔爱尔兰裔西班牙语裔华裔都有，各善其身，各行其事，各不打扰，是为大都会。香港有北至黑龙江南及海南的各省移民，尽管五六十年代所谓捞松之说，那只是粤籍对外省来客的统一称谓，实是半咸淡国语的老兄之谓也；表面上是一句嘲笑，其实是自认细佬的谦卑语。既然没有真正土生土长的港人，这种以先到先得来决定话语权的做法没有根据，也就无法站在道德高地，以我比你先来而对人与事振振有辞了，倒过来是人人平等，新来者不必对固有者低眉失额，但先到者也不必对后进颐指气使。

D&G 挑机是另一回事。我翻看不少人报道，那个星期天聚集在广东道 D&G 的年轻人，从不满店方不许港拍照到反对地产霸权都有。我一直感到香港年轻一代比我们那一代更有希望，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有着更多的独立思考，有着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上星期我说过，广东道早在七十年代已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海运大厦代表的是鬼佬窦，不信，回去问问你家父母兄长，中环虽然洋化，但那是所谓买办华人的地头，和广东道一带的全洋化是两码事。必须指出，那是崇洋的年代，是一句话中英夹杂大盛的日子，是鬼佬一出谁与争锋的华人低人半截的买办当旺年代。今天，鬼佬又点，就是要你道歉。但我们从 D&G 事件看到的是不亢不卑，没

有人叫打倒鬼佬（邱诚武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与中大同学写的中环骚动报道文学，那次是有人喊出这句话，也有人对经过身边的豪华跑车发嘘声甚或起飞脚），D&G 聚集事件是文明之极的一次表达意见活动。

若是要把 D&G 扯上对中共治下的大款来港侵占本港经济，平心而论是拉牛上树，八十年代海港城已经失守美日欧游客，今天大陆客充斥广东道，除了拖着那个行李箱碍着行人，钱多而气粗，我们实在没辙。八十年代香港外游大热，曼谷街头马尼拉旺市不也是广东话盛行，那嗓门比今天的大陆佬大陆婆不遑多让。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曾经见识这些漪欤盛哉场面，哗哗哗之声与古埃及法老王木乃伊同在，喂，快啲帮我影张相与唐三彩共处。相对于那些年，今天香港人成熟文明得多了，然而我在伦敦的日子，从未在《泰晤士报》和《卫报》读过有读者投书不满游客喧哗；是的，英国佬是阴湿的，他们不投诉你，但却掩着脸窃窃私笑。

文明教育需要时日

这是需要时日的。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日人出国成风，人们今天看到的领队擎着一支小旗、后面跟着成串团友，起源便是日本团。不要以为日本人天生是如今罗浮宫看到那样温良恭俭，那时一样是大乡出城。香港老资格的旅行社老板都知道，日本人当年出国，出入国境部门会在发出护照时夹着宣传纸品给国人，教导出去之后要注意的各种生活起居，其中一项是女性要化妆。这种形而下的教育历时四十年，始有今天日本团游客猫着身在故宫博物院在大都会博物馆抄写展品图解的新时代。

至于双非婴儿，我更不知如何与大陆人蚕食香港扯上关系。毋庸讳言，大陆一些人来港产子，是为了香港较优良的医护系统，也为了那三吋见方的身分证；弄得香港的医院一团糟，健康院满是人潮，无疑也是这批双非婴。可是事情简单不过，把条例一改便马上煞住。美国也是抵垒政策之地，你只要在美国生下孩子，哪管你是非法移民，可孩子这辈子永远是美国人，邓小平儿子邓质方之子便是美国人，上学课本校车牛奶都免费，理论上更可以参选美国总统。但美国的把关是严格的，拿着签证入境，海关大爷大婶只要稍不满意即原机遣返。香港不必修改基本法也不必人大解释，明天便可堵住。有人大哭大骂，香港是法治城市，会怕刁民？



这些讨论日益远扬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沦，以至让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陆人欺侮。公道一点说，香港今天是沉沦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归时沉沦。我所说的沉沦，是这个城市已不是一个人人敢于说真话的城市，是这个城市再也不是一个人人勇于承担的城市。这两点，这些年来讲得嘴臭笔也写秃，香港沉沦的不是经济，是这两股底气。经济不景可以屈服港人？笑话！第一次石油危机，弥敦道上的光管招牌十时后全部关上，夜马取消，香港变成黑暗都市，但社会没有泄气。今天我们变了什么？新闻自由一下子跌了二十位，地产霸权没有谁敢于公开批判，北京讲一句话香港双手一搓说喳。日本经济不复当年勇是事实，美国放缓早就不是新闻，英国连欧洲二流也挨不上，但人家底气十足，今天不行，希望在明天。赵丹说过，人，总是要一口气的。

（安裕，香港作家。 文章摘自《明报·星期日生活》。原文链接: http://premium.mingpao.com/cfm/mem_Login1.cfm?SuccessUrl=%2Fcfm%2FContent_News%2Ecfm%3FChannel%3Dja%26Path%3D33600615431%2Fvze1%2Ecfm）

【返回目录】



10-5 Edwin Chau:完全错置的双非争议

“到最后，单非/香港市民没有床位。问题在哪？必然是医管局估算错误。不难想象策划下的那些压力测试，把可能性较低的因素都计漏了，并把整个系统的负荷量用到尽。或者，政府会估错数，已经是常识吧？”

完全错置的双非争议

——是谁在贩卖居港权？

在高呼"双非问题严重"、在从整体数据得出"港府无力抵抗孕妇涌港"的结论、在把非问题提升到公民权等讨论之前，我希望搞清楚双非问题的性质、缘由。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在"每年三万多双非婴儿在港出生"的宏观数据之下，我们都看不到问题的真相，看不到一个精心规划但是最后严重估算错误的商业政策。

双非问题的核心，我看来是：

居港权正透过有受规划的内地孕妇来港分娩服务，被当作商品出售，而其外部成本则完全被忽略了，更不用说这种"公民权商品化"行为，完全不被香港人认同。

是谁在不理会外部成本对社会整体的冲击，从贩卖居港权得益？我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Disclaimer:

1. 本人数学修为极低，数据上亦有不少是临时数字，未必 100%准确。

2. 离港数月，谈不上紧贴香港新闻，对媒体报导无完全的把握。

即是如此，在双非这一争议上，简单的 Fact Finding，我想还是有点价值的。至少可以搞清楚，其实在这一刻，争拗点在哪。(至少我不太搞得清楚)



在传媒的 "双非孕妇攻陷本港医疗系统"之类的标题下，据我有限的认知，引起民愤的现况大概是：

因为：香港政府欠缺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标/执行能力/高度自治性，无法抵挡大量双非来港，过往几年双非孕妇来港分娩的数目急升，整体数据反映，双非婴儿占每年总出生比例持续高企，大约四成，导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整体床位都供应紧张，不合理地分薄香港医疗资源，其中，双非有不预约、冲闸(急症室)冲关(入境)问题，难以堵截。

结果：出现"单非"或港人无法预留床位，前线医疗分娩服务质素下降，长远来说，双非婴儿在自动获得居港权后，会对香港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公共资源、福利之类。

诉求：只有修法/释法才能一次过解决那每年 3 万多个双双问题

如果你不反对以上的陈述，我邀请你继续看下去。如果你不认同，我想以下的分析也应该不影响到你。

我认为双非争议是完全错置的原因

整体数据充满误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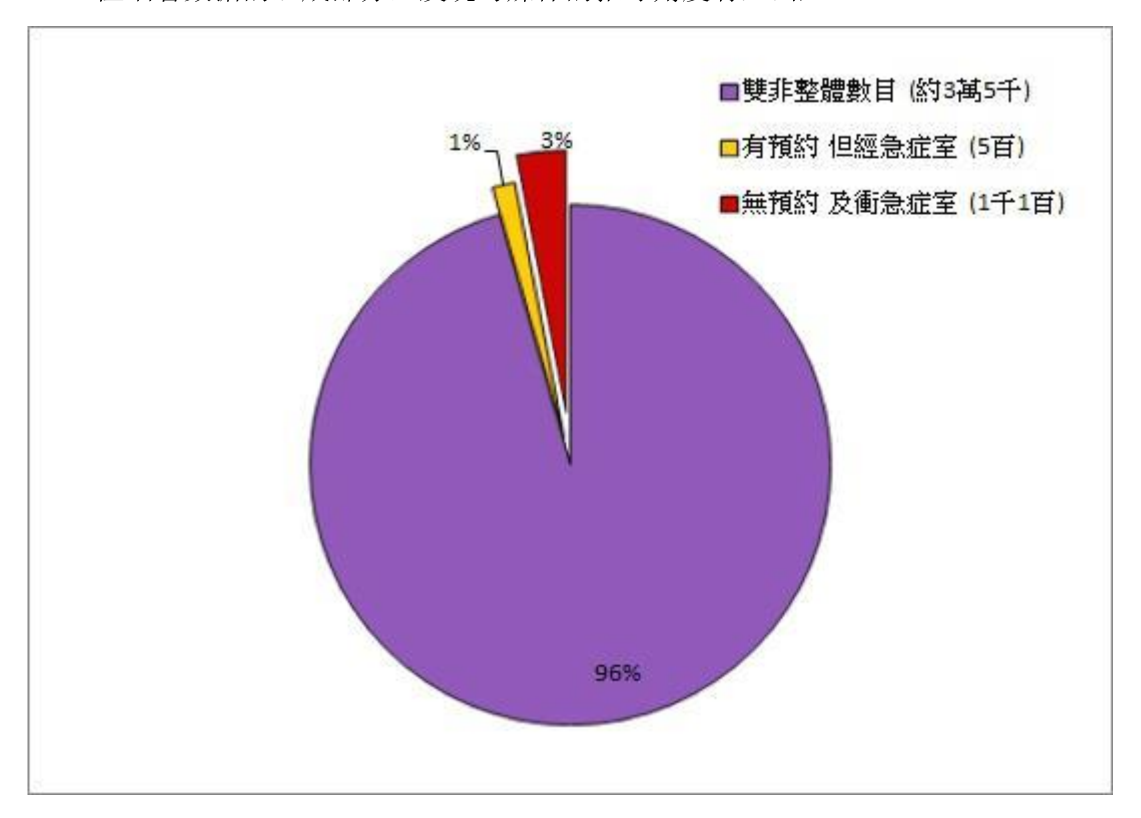
近年香港出生嬰兒數量

年份	整體活產嬰兒(名)	內地孕婦在港產嬰數量(名)		
		其配偶為香港永久居民(比例)	其配偶為非香港永久居民(比例)	其他(比例)
2001	48,219	7,190(92%)	620(8%)	—
2002	48,209	7,256(85.3%)	1,250(14.7%)	—
2003	46,965	7,962(78.6%)	2,070(20.4%)	96(1%)
2004	49,796	8,896(67.3%)	4,102(31%)	211(1.7%)
2005	57,098	9,879(50.6%)	9,273(48%)	386(1.4%)
2006	65,626	9,438(36.1%)	16,044(61.4%)	650(2.5%)
2007	70,875	7,989(29%)	18,816(68.2%)	769(2.8%)
2008	78,822	7,228(21.5%)	25,269(75.3%)	1,068(3.2%)
2009	82,095	6,213(16.7%)	29,766(80%)	1,274(3.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媒体经常指，2011 年双非婴儿有 3 万多个，而全港整体出生数字才差不多 9 万，那是近占 40%，上本地孕妇亲身经历，面对如此庞大数字，双非问题看似严重。

但细看数据的组成部分，发现与媒体的报导角度有些出入：



在那 3 万 5 千多个双非婴儿中，真正需要堵截的，只有其中的少部分，约 3%。

据报导 2011 年有 1656 个双非冲闸(急症室)个案。但其实，据政府报告*指出，其中更有约 3 成并非无预约的双非孕妇，而是”已预约在公立医院分娩的个案，但未能及前往已预约的医院分娩。” (另，报告有点语意不明地说 25%是单非个案，但不清楚是否在那 3 成之中，因单/双非暂时一同处理)

那么余下，真正的问题，是那全年约 1100 个冲闸的双非个案。在我看来，分娩资源冲突，基本上是:这不有预算之内的 1100 人，即 2011 年总出生婴儿数目的约 0.01%，为甚么瘫痪了本地医院分娩服务的故事。

你当然会问：不，一直以来的问题不是那 3 万多个双非婴儿吗？

图中的约 96%大多数才有可能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吧？

释法/修法不就是冲着他们而来吗？



但要搞清楚，他们从来不是堵截的对象。

因为实情是，那 3 万多个，占 96%的双非个案，全部都是有政府认可的预约。

即是，他们都是经政府人口/商业政策许可之下入境的，In the name of "发展医疗产业"。

自庄丰源案，大陆孕妇涌入，任由市场淘金自理，但 2007 年起，他们都是透过申请非本地孕妇分娩配额合法入境。经公立医院的，更必须先缴付预约费用($39000)才获发预约确认书，不可退款。私立收费当然是商业机密。

2011 总共 3 万多个配额，谁决定的?当然是医管局与私立医院(即是市场)。两者在发展医疗产业、开拓内地市场的利益，应该够明显了吧？

冲突的焦点及起因，应该是这里：医管局估算及决定了香港医疗系统在容纳内地孕妇分娩服务上的整体负荷量。(当然是错误地，或至少完全不考虑外部成本，本地出生率也是)

香港的分娩服务，医管局明白是有利可图。政策决定公立医院虽以服务港人为主，但 2007 年都有近一万个双非预约，到 2011 年情况有变，才收减至 3400 个 (是 Trial and Error 吗?)。

私立医院则在商言商，2012 年还有近 3 万个配额，有说是近 7 成整体数量。先不说价格，只知还未完全满足内地无限的需求。

至于香港人优先？市场的逻辑，只要你有钱，First Come First Serve，绝不歧视。

到最后，单非/香港市民没有床位，问题在哪？必然是医管局估算错误。不难想象策划下的那些压力测试，把可能性较低的因素都计漏了，并把整个系统的负荷量用到尽。

或者，政府会估错数，已经是常识吧？

在这个有系统的规划之下，在应该不影响本地人的情况下，最大化来港分娩这门服务商品的利润。应该可行。计到尽一尽。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and of course IT DID!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然后，本地生育率的波幅、那约一千个的冲闸的个案，加起来竟然超越了系统的负荷量。无床位、人手不足，有亲身经历的妈妈们最清楚不过。如果一开始，条数无计到尽，保留一些从管理角度上 inefficient 的 buffer 空间/床位，结果会否不一样？

配额的重要性，可见于近期政策改动：龙年效应，本地生育率预期上升，近日局长宣布减少配额，包括私立医院，但公立医院预约已告饱和。

减少私立的配额，会否构成，在香港人最"自豪"的自由不干预传统之下的罪行——干预市场，又或应否由市场自行调节(加价，认钱不认来源)，这些问题，我留给读者自行判断了。至少某意义上，把居港权当作商品贩卖是符合香港的商业逻辑的。

减少配额可以直接大幅度减少双非数量，这一点是明显的，政府亦急忙作出改动中。当然，还有完全停止接收的选择 (由公立医院开始，或是包括私立医院)，不是没有人提及但私立医院会否放弃此一大财源，是个大问题。

简单来说，贩卖居港权，才是要堵塞的漏洞。谁是(香港方面的)卖家，我想应该很明显了。但必须指出，释法/修法会同时完结这门生意，双非如不获居港权，这方面的 collateral damage，好像被忽视了，更不用说对之前政府的人口政策的打击。

返回冲闸问题：2011 年的确有上述约 1100 宗这样的个案，但边境阻拦的功效是否被忽略了？根据入境处去年的数字，前线人员成功阻拦了 1930 名无预约登记的非本地孕妇入境。成功率超过 60%，相当不错。还有，要记住，这是近日曾四招之前，现在他们开始提高注视度及人手了。

据报导，近几天民政署亦出手了：”民政署巡查东区、油尖旺区、深水埗区及荃湾区共 43 个处所，扫荡专门接待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月子公寓，打击无牌经营旅馆活动”。成效如何不能太早下定论(加上会有滞后)，但要解决问题，不乏政策选择，纯粹是政府的判断问题。

至于"缺乏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标/执行能力/高度自治性的问题"：只需翻看一下中央政策组的文件，应该可以略知一二。我的睇法是：政府是有清晰的人口政策，只是后果完全不是港人所希望的境况。



政府亦早已预期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应该说，那是计划的一部份(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吸纳内地有经济能力的优秀人才来港，配额只是实际操作。

例如，中策组 06 年十二月召开"策略发展委员会行政委员会议"，特首、刘兆佳、立法会议员等都在。对人口发展问题，早有人提出内地孕妇问题，但着眼点却是收费问题。还有，记录指"但有部份委员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近来的趋势，可能有助解决香港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问题。待这些儿童适龄入学，可考虑让他们来港，因为香港必须有稳定的人才供应，才能作持久的发展"。

这只是确认更早之前的人口政策方向: 本港生育率、吸引内地专才、人口质素等，与中港各自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有关，不在此深究了。

总之，认清问题吧，就只有一句。

可参考以下政府文件/新闻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1213cb2-550-1-c.pdf

http://www.cpu.gov.hk/tc/documents/csd/csd_ec_summary_7c.pdf

http://caringhk.org/?p=534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2/01/21/GW-1444447.htm

（Edwin Chau：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 2011 年毕业生，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硕士生。原文链接：http://www.facebook.com/notes/edwin-chau/%E5%AE%8C%E5%85%A8%E9%8C%AF%E7%BD%AE%E7%9A%84%E9%9B%99%E9%9D%9E%E7%88%AD%E8%AD%B0/10150572627026897)

【返回目录】

【策】

10-6 林霭云：双非问题：直视香港的医疗产业化的危机



“面对这爆煲的情况，香港政府束手无策，一方面无法要求私院以 0.8 比例自设深切治疗部，亦没有就私立医院不负责任的转介收费，就连立法会议员提出是否要规定来港产子的孕妇要接受多次产前检查，以减低初生婴儿健康出现问题的机会时，署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梁卓伟却回避私家医院部份，只说医管局辖下有要求非本地孕妇有最少一次产前检测，产前检查应由医生专业决定芸芸。”



就双非问题的讨论，因与蝗虫论这歧视性的语言纠缠下，越走越远。本来是一个孕妇床位不足、本地医疗服务难以承受的问题，却被引导为一个谁在街上撒尿，谁在报纸登侮辱性广告

的道德骂战。在纷闹之中，大家的基本共识是香港的医疗系统，已经因为双非来港产子问题而频临爆煲。然而，是什么造成这场危机呢？双非婴儿的户籍问题当然是一个诱因，但主观愿望与能够进入香港是两会事，是什么机制帮助这些双非孕妇来港？在这个乱局里，谁是最大的得益者？以下的调查分析发现，走向产业化的私家医院是一大祸根！

自由行毁《基本法》的原意

面书上资深记者 Minna Ho 指出，当年《基本法》廿四条第三项的原意是希望鼓励已移民的香港人回流，而当时中央曾承诺控制内地人来港，避免逼爆香港的情况。

事实上，根据统计处的出世率数据，即使在 2001 年庄丰源案后，来港生孩子的双非，一年才 620 宗，但自由行政策自 2003 年推出后，却在短短几年间，升至 2010 年的 32,653 宗。很明显，中央在制定中港经贸合作协议 (CEPA) 中的自由行政策时，完全违反了九七前作出的承诺，又或《基本法》原意。

出入境的关卡不受控，但本来为本地居民服务的疗医体制，又是如何被攻陷呢？先说公立医院，2011 年，全港公立医院一共有 41,794 宗分娩数目，当中有 10,125 为非本地孕妇（包含父亲为港人的中港家庭（单非）），以每年有 6 千单非分娩数目（2010 年的单非数字为 6169）计算，2011 年公立医院所接的双非分娩，为数约 4 至 6 千个，占 2011 年 3

香港出生率比例

年份	總數	父母皆為香港居民	父為港居民母非港居民	父母皆非港居民(佔總數)
2001	48,400	40,590	7,190	620 (1.3%)
2002	48,500	39,994	7,256	1,250 (2.6%)
2003	46,200	36,168	7,962	2,070 (4.5%)
2004	47,900	34,902	8,896	4,102 (8.6%)
2005	57,300	38,148	9,879	9,273 (16.2%)
2006	65,800	40,318	9,438	16,044 (24.4%)
2007	69,600	42,795	7,989	18,816 (27%)
2008	78,700	46,203	7,228	25,269 (32.1%)
2009	82,100	46,211	6,213	29,766 (36.3%)
2010	88,500	49,678	6,169	32,653 (36.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万 5 千多名双非分娩 14-15%。亦即是说，80%以上的双非分娩，是正式经本地私家医院预约来港产子。以 2011 年香港出生人口 95,337 来计算，减去公立医院出生的总数，在私院出生的为 53,453，双非孕妇于占私家医院分娩的比例约 35%，而这个比例将因公立医院停收国内孕妇预约而急增。

公立醫院出生分娩數目

年份	本地孕婦	非本地孕婦 (已預約)	非本地孕婦 (由急症室入院)	非本地孕婦總數
2008	30,586	9,436	1,009	10,445
2009	30,525	9,337	713	10,050
2010	31,911	9,899	796	10,695
2011	31,669	8,672	1,453	10,125

註：今年數字截至11月底。資料來源：醫管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敏慧、陳寶瑤

on.cc 東方互動

私家醫院分娩套餐收費勁加

醫院	套餐加幅（內地孕婦）
寶血醫院	自然分娩：43%-48.9%；預約剖腹分娩：34.7%-45.4%
浸會醫院	自然分娩：27%-31.1%；預約剖腹分娩：26.8%-31.1%
嘉諾撒醫院	自然分娩：20%-20.2%；預約平日剖腹分娩：20%-20.2%
香港港安醫院	自然分娩：15.1%-24.7%；預約剖腹分娩：15.4%-23.2%
明德國際醫院	自然分娩：20%-24%；選擇性（預定）剖腹分娩18%-22.2%
荃灣港安醫院	自然分娩：19.5%-21.3% 剖腹分娩：套餐由5日4夜改為4日3夜，收費增加18%-19.6%
聖保祿醫院	自然分娩：6.5%-12.7%（4.5%-6.3%） 預約剖腹分娩：2.8%-5.3%（2%-2.7%）
聖德肋撒醫院	自然分娩：15.2%-29.4%（17.5%-25.8%） 預約剖腹分娩：16.3%-26.1%（18.9%-27.6%）
仁安醫院	自然分娩：13.5%-13.7%（26.1%-37.5%） 預約剖腹分娩：18.5%-19.6%（25%-30%）

資料來源：消委會

論壇



医管局估计，会有 31,000 非本地孕妇于 2012 年在私家医院分娩，亦即是说接近 57%的私家医院产科床位，会用于服务非本地孕妇，难怪私家医于 2012 年分娩套餐的平均加幅超过 20%，最高的宝血医院加幅近五成！

对于内地孕妇来说，当国内城市户籍作价廿万时，十几万的香港私家医院费，换取分娩服务与孩子的特区护照，当然实惠，但却推高了本地孕妇（尤其需要剖腹产子服务的）在私家医院分娩的服务费用。当私家医院产科有利可图，公立医院有经验的产科流失到私院，令到公立医院的人手短缺，医疗质素下降。由 2007/08 年起，公立医院流向私家医院的产科医生和护士，每年平均有 5%。与此同时，因为目前私家医院透过中介公司滥收双非孕妇，出现大小事故时，往往要公立医疗系统去埋单，变相由公营医疗津贴私家医院。

医疗产业化下的中介服务

过去几天，我一直在查看国内来港产子的中介服务，其实大部份中介公司，都是由港人所开。譬如说，香港安宝医疗集团(http://www.hkbbservice.com/) 就是由香港 6 位妇科医生组成，协助内地孕妇预约到仁安、养和、浸会、法国、圣保禄、港安、宝血等医院分娩。正常说，根据香港的医务条例，医生是不能卖广告接生意的，但在区域性医疗服务产业化的政策下，这些跨境宣传、接生意变得可能。而香港政府，只能消极地向私家医院派防贪指引。（谢谢网友 Howard Tsang 提供数据）。

另一个例子是美孕母婴服务（http://www.hkbbgood.com），这是一家由香港人全资创办的中介公司，有实时网上与客户服务对答服务，声称可以帮国内孕妇预约公立及十二家私家医院临盆服务。中介的价钱低至 RMB2500，亦有高达 RMB148,000 的豪华套餐。先不论这些中介公司是否抢去本地孕妇的床位，一般来说，孕妇由怀孕到分娩，最少要做三至四次产前检查，确保胎儿有正常的发展，孕妇的身体状况良好。但是，这些公司竟然为一些临盆一刻才到香港产子的国内孕妇排期，而大部份经济实惠的套产服务也只提供一次香港妇产检查，这无疑增加了前线医护人员在接生时要面对的医疗事故风险。而躲在办公室的私院高层，则乐见院医



集中接收这临门一脚的高增值服务，假若生出来的孩子有问题，需要深切治疗，他们就把婴儿送到公立医院执手尾。

公立医院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爆煲

2011 年初，八间公立医院合共提供一百张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NICU）病床早已饱和，高峰期达 140%，超负荷工作量下，八间 NICU 合共欠 50 名护士！

其实，大约每 100 个初生婴儿有 0.8 名需要转到 NICU，按此比例，公立医院系统要治疗需要 NICU 的婴儿，即三百多个（四万多的 0.8%），可谓卓卓有余。而本地居民及中港家庭加起来，2010 年需要 NICU 服务的婴儿大约是四百五十个左右（即 5 万 5 的 0.8%），也游刃有余。引致爆煲的原因是私家医院在没有投资在 NICU 的设备下，不断增加产科服务，滥收一些没有作产前检查的国内孕妇，却把需要深切治疗服务的婴儿扔到公立医院。根据立法局 2011 年 5 月的数字，由私家医院转到公立医院 NICU 的数字年年上升，2010 年达 354 个，按 2010 年于私家医院分娩 4 万 6 的数目计，大概要有 368 个婴儿要深切治疗，亦即是说私家医院把 95%要执手尾的婴儿，送到公立医院！

面对这爆煲的情况，香港政府束手无策，一方面无法要求私院以 0.8 比例自设深切治疗部，亦没有就私立医院不负责任的转介收费，就连立法会议员提出是否要规定来港产子的孕妇要接受多次产前检查，以减低初生婴儿健康出现问题的机会时，署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梁卓伟却回避私家医院部份，只说医管局辖下有要求非本地孕妇有最少一次产前检测，产前检查应由医生专业决定芸芸。

即使目前有建议说要更改入境条例，令双非在港所生子女不能自动享有居港权，但是，当医疗进一步产业化，而国内市场又有无比的潜力（譬如说，有人愿意花三十八万坐月子），香港私家医院的客源仍会源源不绝，服务费用仍会不断上升，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做好准备，防止公营医疗服务因补贴私家医院的生意而爆煲，一方面要增加公立医疗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要限制私家医院唯利是图的行为，限制其不合理的扩张，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林靄云，香港独立媒体 InMedia 成员，独立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inmediahk.net/%E9%9B%99%E9%9D%9E%E5%95%8F%E9%A1%8C%EF%BC%9A%E7%9B%B4%E8%A6%96%E9%A6%99%E6%B8%AF%E7%9A%84%E9%86%AB%E7%99%82%E7%94%A2%E6%A5%AD%E5%8C%96%E7%9A%84%E5%8D%B1%E6%A9%9F）

【返回目录】

10-7 蔡建诚：欢迎新旧移民、反对官商勾结、反对殖民压迫、建立自主香港

“若以不劳而获和吞食集体劳动成果的人去界定蝗虫，本地那班吸尽基层的血汗钱、吞噬社会财富的地产商，和透过官商勾结刮取民脂民膏、吃得肚满肠肥的大财团 (及依附这些权贵阶级的专业人士)，才是蝗虫之王。”

1. 香港基层 (八十岁后、家庭主妇、扎铁工人、家务助理、中港家庭、长住外佣和其他广大劳工阶层) 都是在高度富裕繁荣的城市背后，为香港这个「神话」，付出血汗辛劳、青春健康、甚至宝贵生命的无名英雄，多年来对香港本土，累计不能币值化的贡献，

他们能理直气壮地使用香港资源，不是因为他们幸运，而是因为长年辛勤付出，这是个高贵可敬的理由。

基层市民胼手胝足, 渐渐养成「节约自然和社会资源」、鄙视「不劳而获和吞食集体劳动成果的人」的心态。

对外来的蝗虫来说, 蝗虫行为是生物求生和繁殖本能所必须，没有道德上的对错； 但对本地农民来说，蝗虫侵蚀庄稼，是个巨大的灾难。

那些「不劳而获和吞食集体劳动成果的人」，被比喻为「蝗虫」(或老鼠、寄生虫)，鄙视「蝗虫」成为基层的行为及评价基础，即基层生存心态的一部份。

2. 香港是移民社会，香港人口包括本港出生、中国内地移入、不同国籍和不同族裔等人。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意识自七十年代开始冒起，「香港人」的身份开始确立，大众传媒和植根于本土的社运开始出现。

2003 年七月一日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湾仔利东街 (囍帖街)的重建、天星钟楼和皇后码头的迁拆、高铁工程/菜园村清拆等事件的争论及所激起的保育运动，反映本港新生代力量的冒起及具自我批判的新本土意识 的出现，他们很多人厌恶港式大都会的恹闷发展逻辑，抗议行政主导管治为小圈子经济利益服务，反对发展主义淹没小区历史、破坏社会资本和摧毁平民家园，



关注 香港这个高度资本主义、但每天蚕食独特本土文化和共同回忆的城市，能否享有永续的未来。

3. 近年透过「自由行」、投资移民、专才计划和双非生子(即父母双方均为大陆人)等方式，大陆人和其后代近乎不受限制地不断涌入香港。他们部份人的行为、习惯 和态度，滋扰本地风俗民生，成为本地人的话柄。与较早年开始进入香港底层的大量新移民妇女 (其配偶多是本地男性劳动阶层)和儿童 不同，这些大陆人主要是国内的城市中产和从贪污腐败的党国资本主义大富起来的权贵阶级, 可能包括小部份低收入人士。

本地 的大财团和寡头垄断地产商透过官商勾结影响香港政府的政策，强化「自由行」，方便资本累积，捞尽好处；「自由行」加剧租金上涨，逼走小商户和老铺，连锁集 团商店进占，令经济社会生活空间变得更为恹闷和缺乏个性。旅游业一支独秀，支配本港零售销售业。加上大陆防洪排洪的政策, 引致大量热钱黑钱北来, 再加上西来热钱， 进一步扯高楼价和租金。

中低阶层的本地劳工若非受雇于需求旺盛的经济部分，最低工资和人工上升抵不住日常生活的消费通胀和租楼置业。

4. 在这些大陆人口当中，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但可炒卖香港楼宇; 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可投票种票。 两者都可灭绝本土; 因为他们不用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若说什么「蝗虫」行为，这些小数害群之马才配称「蝗虫」。

当然，若以「不劳而获和吞食集体劳动成果的人」去界定「蝗虫」，本地那班吸尽基层的血汗钱、吞噬社会财富的地产商，和透过官商勾结刮取民脂民膏、吃得肚满肠肥的大财团 (及依附这些权贵阶级的专业人士)，才是蝗虫之王。

5. 可是，民粹势力在社会经济危机时往往引导本土意识走向族群歧视的方向，早年的例子，包括所谓「综援养懒人」的道德恐慌，以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成为代罪羔 羊； 近年则是

关于外佣居留权的争论，移住佣工被视为纯粹生产机器，在在投射出狭隘的本位主义和种族/阶级歧视；这些民粹势力的例子，包括「爱护香港力量」和以 叶刘淑仪为首的「新民党」。

6. 有些人担心，「蝗虫」这个情绪字词或有关的想象，会造成对所有大陆人的仇恨，引导本土意识走向族群歧视的方向，甚至牵连单非家庭 (即父母其中一方为香港人，另一方为大陆人) 和新移民。

7. 另一方面，在西藏和新强, 整个汉族的涌入和集体行为已大幅度地把当地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文物连根拔起；这是每日对当地本土和人民进行着的殖民主义。

有些人 (例如专栏作家陈云) 开始担心这些不受限制不断涌入香港的大陆热钱和大陆人，加上本港的语文教育、国民教育、高铁工程、旅游业、珠江口宜居湾区规划等政策，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经精心策划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压迫。

8. 香港的部份激进左翼人士，把批判的焦点放在近年在网上或报章传媒流行的蝗虫论，却忽略本地基层的生存心态 ── 把他们的不公平的感觉，看作是对政经现象本质或自我的错误理解的假意识 ，也忽略本土可能面对的殖民压迫 (不自觉的大汉沙文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他们不愿去触碰「公民权」的核心课题: 一个本港各阶层各党派均正热烈讨论和积极介入的话题。

9. 不过也有小部份人士，认同双非子女有潜质成为香港未来的生力军, 支持双非子女和其主要照顾者有条件地在本港逗留，条件是居港七年、接受本地教育 (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和有正当学业/工作，之后才可申请居港权，但本港公民或其家庭成员有权优先享用公共服务 (紧急个案、有庞大界外效益或基于恩恤原则等情况下例外)。这是从「居港年期」和「家庭团聚权」定义本港公民权和居港权的尝试，同时适用于是回流港人、 「双非」子女、新来港人士、移住佣工、「八十后」和八十岁后。



故此，「单非」是港人家庭，享有公民权；移住佣工若住满七年以香港为家，也享应有公民权；但不通常居港者就丧失居留权或投票权。

他们也要求限制游资进出、限制投机炒卖、限制投资移民、反对中央集权、反对财团垄断、以民生优先发展社会服务，和复兴小区经济等主张。

更有人建议取缔充满歧视和遭受严重滥用的丁屋政策, 或索性开放丁屋自住权给全港男女成年人，迫政府立即大量兴建公屋。

10. 部份人士批判中港两地权力集团勾结的同时, 也开始反思疏离本地基层常理世界的左翼论调，到底是拱手把意识形态战场相让，让保守本土势力夺取本地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并助长中共的殖民压迫；还是有助面 对新本土意识出现的事实, 有助建构进步、民主、自主、保育、有生态和人文承担的本土论述。

11. 资本流动高度蚕食本土文化，「自由行」又促进资本累积，可见资本可能是「自由行」的最大得益者。但殖民化同时可透过不受控制的外来人口涌入 (例如自由行和人口政策)、有系统的种票 (特别是发动有居留/投票权但非常住当地的人口)、国民教育、语文教育、高铁、宜居湾等国家权力的行驶进行，这也是今天部份论者恐慌香港本土凋零的主要原 因。我们必须面对「市民 — 抵抗 — 国家霸权日益矮化/磨灭本土独特文化/价值/身份」这个事实。

12. 因此，进步左翼人士和本土力量的共同针对目标，应该同时包括资本和国家霸权。

（蔡建诚，香港自由政策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franklenchoi.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23.html）

【返回目录】

10-8 朱凯迪、陈剑青：来吧，不要什么都应承 ——反对跨境自驾游运动刍议




“在自驾游政策里，充满我爸是李刚的富二代有强权无公理派、左右之矛盾、街道从此再不安全的怀疑与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惧一些可能出现的危险外，不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项政策违背了我们对美好城市的愿景方向吗？若只将焦点放在他人身上，只会令我们愈来愈搞不清自己是谁，搞不清我们这个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们有什么共同的未来。”

刻下的香港，令人联想起台风季节时的华南天气图——一个台风正在头上猛吹，老远又见另一个低气压在南海形成并逐渐增强。

在双非火爆争议未息，香港人被范徐丽泰及胡汉清的其实已经释法论搞得糊里胡涂，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骚天天新款广泛流传之际，facebook 这个新世纪舆论工厂又在酝酿新一波本土风暴。

打开自驾游的潘多拉盒子

新一波暗涌由反对香港『被规划』行动组发起的多过十万港人强烈反对自驾游下月摧毁香港页面，已累积了接近三万五千个用户支持。自驾游计划所引伸的空气污染、道路安全、法规配套，在特区政府咨询次数等于零的黑箱作业下，就算是过十万人的群组亦难以承载这些市民的真实反抗情绪。除了一种针对个人最终极有可能引向如西藏或新疆等族群撕裂及镇压收场的



运动进路，在风起云涌的二○一二年，所有关心本土问题的朋友，都埋首想象着一种进步本土反抗运动的可能样式。

由于黑箱的融合政策安排，市民竟然至今仍未具体了解下月就会推出的自驾游计划。所谓自驾游计划，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车以外，增加中港两地汽车互通的数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第五章第二条提出研究逐步扩大过境汽车指标，并以深圳湾口岸为试点，在充分论证基础上，探索一次性临时过境私家车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港粤两政府确定于二○一二年三月推出第一阶段的计划，让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车车主可以申请一次性特别配额从香港驾驶私家车进入广东省。据媒体报道，第二阶段计划暂将放行内地私家车进港，初期上限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于七日，即每日最多有三千五百架内地车在港自由驾。而一些推动粤港一体化的中港旅游公司，亦报道第二阶段广东省私家车南下赴港自驾游亦将实施，料引发内地居民赴港自驾游购物消费热潮，带旺本港零售业，内地方面似乎亦已经蓄势待发。

本地传媒中，只有亲中报章对自驾游计划有较详细的报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汇报》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页面报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费玩乐日渐普遍，二○一○年 4,880 万人次到内地旅游，其中广东省就已高占 93.5%；另一方面，内地人南下，从观光旅游到购物血拼，也趋向恒常，自驾游计划将进一步推动自由行，届时，内地每日有 500 辆车赴港消费，首先会给化妆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业带来充足的购买力。随着内地汽车的普及，自驾游更是成为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诱因，极大推动了两地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业内人士建议，倘若试行效果顺畅，当可考虑将配额数量扩大，并把自驾游范围扩阔。就像个人游自由行的范围不断扩大，自驾游计划如果不受到质疑，实行区域势必不断扩大，数量愈来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团体和社会运动鞭长莫及的潘多拉盒子，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实是两地人民）的参与，甚至是立法会的介入。由议题设定、研究、制订政策，市民全不知情，无从过问，每次都是见到曾荫权或唐英年或林瑞麟与国内官员排排企签约，市民才透过愈来愈麻木的主流记者得悉，阿爷又畀着数啦 / 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中，港深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前海港深现代服务业合作的意向书（意向书），事后时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林瑞麟竟然拒绝公开意向书全文（还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协议），更向立法会议员表示，由于和

深圳政府签约不牵涉立法会额外拨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须向立法会提案，令市民无足够信息监察高官有否出卖港人。

有掉头的路吗？

而自驾游只是数十项具体措施中其中一项。林瑞麟说：香港与内地各区域的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建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政府在推动各个合作项目时，均是以香港的利益为依归。我们先不追问特区政府当时凭什么标准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问题是，如今市民对自由行措施已累积了接近爆煲的负面情绪，再来一个汽车自由行，香港社会承受得了吗？我们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吗？

有报道引述不明的消息来源指，现时自驾游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让港人自驾北上，尝点甜头，然后再逐步放内地车南下，每次都在玩红萝卜利诱政治。当港人北上了，我们还有掉头的路吗？

可以退出吗？可以不这样玩吗？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问题。由中英谈判到签署联合声明、基本法草拟及颁布、临时立法会成立、废除两个市政局、人大多次释法、内地入境人口／单程证审批权、CEPA、各种各样大型基建、到扩大自驾游，游戏规则从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们说了算。我们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签我们的条约，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属于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签约仪式。香港这个不断被签约的命运共同体要自主，第一步是要离开、违背、拒绝、撕毁捆绑，自定义我们的条约、协议和游戏规则，反高铁和五区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标的尝试。然而这些运动都未竟全功，本土运动陷入了迷惑与失语。

原来不是大白象

两年前的反高铁运动虽未能成功阻止兴建，却让市民首次觉醒到虚耗公帑的大型基建规划是可以亦应该受质疑的。当时，我们发现大部分大型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数远低于预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桥等等，当时全城都琅琅上口，称之为大白象。



但是反观当局的交通规划，才真正发现无所谓大白象一语。政府希望更多架次在我城流动，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发展和更多车辆，去年曾俊华加汽车税顿成虚招。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驾游车辆，香港的私家车增长已经远高于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长，私家车数目由一九九八年31.8 万辆增至二○一一年 43.3 万辆，增幅超过 36%。

因此，港珠澳大桥与深圳湾等千亿口岸都不是大白象，按现时香港或中港交通规划的进路，需求是可制造出来的，只是过程中不会向市民透过任何催谷车流的计划。加进自驾游，就算多建十条港珠澳大桥也永远不能满足，尽管港珠澳大桥与深圳湾口岸已预留近十万架次的跨境车辆容量，等待这个永不满足的珠三角一小时交通圈来突破车流大关。基建（其实是豪建）不是大白象，我们却更应反对这种破坏城市生活的霸道交通规划。我们已经被迫失去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用来兴建中环湾仔绕道及另一条连接路。再想想红隧，香港人已经受够了塞车之苦。

认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张

在自驾游政策里，充满我爸是李刚的富二代有强权无公理派、左右軚之矛盾、街道从此再不安全的怀疑与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惧一些可能出现的危险外，不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项政策违背了我们对美好城市的愿景方向吗？如果有这回事，我们就要追问，那个我们觉得的好是什么？我们的城市已经达到了这个愿景吗？还是不单止未达到，并且与这个眼前的恐惧一脉相承？若只将焦点放在他人身上，只会令我们愈来愈搞不清自己是谁，搞不清我们这个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们有什么共同的未来。这恰恰是我们依然欠奉的本土政治主张。

先撇除国内和香港的道路系统不协调的问题，自驾游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车辆。我们觉得这不好，是因为这本身就违反了我们的进步城市愿景——减少消费、低碳环保、清新空气、不盲目追求基建发展、以集体运输或单车取代私家车、控制汽车数目及用量、减少塞车。愈来愈多香港人认为，这种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费、崇尚开私家车的想法已不合时宜，香港不应该这样下去，深圳、广州、珠三角都不应这样下去，但粤港



政府仍然视之为进步发展观，大力推行最不合乎环保的跨境交通基建，填海、破坏农地，豪宅化无日无之。

有本土环保团体多年来提倡落实以生活质素为本的规划，取代现时以交通主导的模式，支持电子道路收费，建设及绿化行人道路系统；有本土地区团体反对在中上环旧城区兴建有大量车位的超高豪宅，为狭窄的街道引来更多汽车，导致旧城区的环境不断恶化；有本土单车团体近年多次举行大规模单车游行，要求当局以实际政策鼓励以单车代步，要求与汽车得到平等待遇。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进步实践的团体，同样是货真价实的本土派，是进步本土运动的动力。如何令他们愿意出来，在进步本土运动中担当更积极的角色，参与这场从未有香港人成功过的改变跨境政策‧重夺主导权抗争，是当前要务。在全城恐慌之际，所有珍惜本土各个领域的民间团体及朋友也应站出来，提出香港应该要成为什么，我们的政策要或不要有什么。

期待有内涵与持续的本土运动

那么进步本土就有多一条线——自驾游要反对，但反对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惧，而是这个政策违反了市民对香港的进步本土愿景。我们可以争论何谓进步，但不可以没有。香港充满着由殖民地而来、由北京政府承继并发扬光大的政制结构，无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有时候多得根本无法想象可以怎样前行。因此，我们更加要珍惜凝聚进步本土愿景的机会，将自驾游这个新危机化为推动本土社会改革的动力。以这样的姿态挑战经济殖民、由上而下的强权规划与港官签订条款出卖港人等问题，才会令有本土运动有内涵、具体、持续与实在。

请加入我们，共同期望进步本土的抗争实践能够再次出现，将风暴变成一场又一场有累积的社会运动。

（朱凯迪，土地正义联盟成员，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陈剑青，反自驾游发起人之一。原文链接：
http://news.mingpao.com/20120205/uzb1.htmhttp://news.mingpao.com/20120205/uzb1.htm）

【返回目录】



【根】

10-9 陈冠中：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

（附：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书写——香港的例子〔节选〕 ）



"强世功的香江文章，让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天朝主义的部份面貌。我将不厌其烦的引用强世功的原文，因为对强世功来说天朝主义与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在理念上的关系是直接的。这关系到香港的命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 2003 年至 2007 年被借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做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的智囊。2007 年至 2008 年强世功在北京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十三篇名为《香江边上的思考》的文章，后略经纠错整理补写成为《中国香港》一书，分别在香港和北京出版（以下统称上述文本为"香江文章"）。

"香江文章"引用不少历史实证与文献材料，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建构了看似详尽、严谨、圆融的宏大叙事，也借用了抒情修辞来释放真诚感与善意感。我认为这批香江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除了对中国官方的香港论述提供理论的根据和批注，有成为中共治港班子的参考读本的可能外，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香港书写者商榷的问题意识。

有趣的是香江文章文本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提供了对它批评的资源。我认为香江文章的内部矛盾源自它试图包涵多套难以调和的思路：一、解说中国官方的香港政策（这或许是强世功写这系列文章的官方任务）；二、强世功个人对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的相对肯定及对改革开放年代的批评；三、强调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而邓小平也同样伟大光荣正确；四、展现当前中国党政体制的正当性与优越性；五、说明中共政权是继承中国传统，而中国传统就是王朝帝国和



儒家，而儒家是指“捍卫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现出来的政治实体的正当性”的政治儒家（不是指港台新儒家那种儒家）；六、借特区的存在开拓一套有异于中国官方主权论述的中国天朝主义论述。

中国天朝主义（简称天朝主义或国朝主义）是我提出的一个标签，是对现下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概称。现在很有一些以华文写作的学者认为：一、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帝国；二、当代中国党国体制是强世功下文说的“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三、大清帝国是传统中国天朝式政治视野的极致表现，也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模版。我将这样一套话语称为中国天朝主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用语里，“帝国”与民族国家是相关概念，而西方政治概念正是中国天朝主义者明言要去排拒的，所以这里姑且不用帝国一说，改用非西方观念的天朝一词，不说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改称中国天朝主义。

若与“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的提法相比较的话，以对中国现状特别是经济制度方面的描述能力而言，天朝主义逊于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但在政治上作为规范性、建构性的引导意识形态则似不比后两者弱，而且有着比后两者更强的传统文化内涵，地缘政治冲击，及“大历史”或“长历史”意义的企图心。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都有助维护当前既有的政经体制，天朝主义也有这样的功效，但因为后者对既有体制多了历史主义的解读及国体演变的诉求，增添了中国往后政经体制变形的不可测性。

强世功的香江文章，让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天朝主义的部份面貌。我将不厌其烦的引用强世功的原文，因为对强世功来说天朝主义与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在理念上的关系是直接的。这关系到香港的命运。

本文的有关讨论带有雷蒙·阿隆式及以赛亚·柏林式从对手理论中学习的意味。

（一）

在此先要清理香江文章的几个较小的问题。

一、强世功似乎并不熟悉 49 年后香港的社会历史与民间心理，所以有些论说似是而非。例如他说：

“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 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行动”。

这段写得太“捣浆糊”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肯定的是很多港人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逃来香港的，不可能都是新中国和香港左派的支持者。（旁证之一：到 80 年代香港的大多数主流日报还都使用中华民国年号）。

类似捣浆糊论说，再举两例：

强世功说：“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 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度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

内地大跃进三年人为灾害后，大陆难民逃离共产中国，香港连一般老百姓都会去边界接济这些“难胞”，反左情绪高扬。但同时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已到小康，怎么都不能说是“沦为难民社会”？而且左派什么时候成为过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

强世功又认为：“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如何看到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觉，就变成撕裂香港人内心世界的痛苦伤疤”。

香港人内心何来痛苦伤疤？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在给北京叫停后，大概只对本地左派的追随者造成内心伤疤，因为给北京牺牲了。对当时绝大部份港人的内心来说，那只是一场响应大陆文革和模仿红卫兵式的暴动，并没有撕裂香港人内心。

二、香江文章对一些特定话语的引用缺乏节制。例如在一篇谈到香港大学的文章里，

多次说港大培养“小英国人”，如“正是通过香港大学的培养与教育，使得香港本地华人能够接受英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成为地地道道的‘小英国人’” 。“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



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也就是买办阶层”。“……间接统治，其要旨就是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

港大的毛派学生在七十年代初是也曾很意气风发的骂过港大培养‘小英国人’，但学者的严肃文章似不宜将某一特定族群漫骂式的话语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实去套用。

另外，在“去殖民”这个学理问题上，强世功的理解很直接，去殖民就是改宗认同中国：“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国家建构的难题中”。这样的以去殖民等同“再国族化”的思路，与香港主要的后殖民论述(如罗永生反对从殖民时期对回归后政经精英的共谋结构及周蕾强调香港主体)的去殖民理解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抵触的。

强世功说：“不少香港精英内心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在这里强世功对香港精英心理的描述是想当然的。如果说大部份香港精英有什么内心认同的话，那是认同香港这个地方，真没几个（不能说没有）认同英“国”，而认同中国的精英也肯定多于认同美“国”（除非是居港美国人）。注意，这里强世功是特意强调对“国” 的认同，不是泛论文化偏好。

香江文章中有些句子的用词，如“这是中华民族的主人心态与殖民地下的奴隶心态的针锋相对”、“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初期不惜采取绥靖政策”，都不必要地带着俯视的态度。

三、香江文章的一些推论，也似过于跳跃、过于想当然、牵强、武断或过度解读：

“香港教育的本质是要彻底消除中文”。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

“不愿意认同普通话及由此形成的汉语学界，而甘愿在英语学界处于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终会在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根源”。



“香港精英阶层……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对大陆与海岛的思考固然有现代地域政治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延续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关于“不变”与“权变”、“仁” 与“智” 的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思考首先关注的是“不变” 的要素，这就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根本关怀，其核心思想依然是“仁” ，是共产主义下人人自由平等的至善之境”。

关于最后一点（强世功将毛泽东看成儒家“仁”的继承者），下文再谈。

（二）

现在我将详细罗列一下香江文章如何试图包涵多套难以调和的思路以拼贴成一套内部充满矛盾的论述。

首先我要说，香江文章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将一些官方政策及官方逻辑白纸黑字的写了出来，让我确定的看到中共治港班子如何理解特区一国两制。

例如这段说明中央为什么要支持香港资本家，就值得引用得长一点：

“在中央的决策思维中，所谓‘繁荣‘就是要确保‘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资本家的利益；‘稳定’就是理顺香港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保证。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责任中，香港工商界无论在繁荣问题还是在稳定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强世功是站在认同中央支持资本家的立场。

强世功又指出：“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中央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而且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 手中”。

然而，强世功却透露回归后中央对港人的爱国定义的改变：“在‘爱国’问题上，他们（香港精英）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爱国曾经是我们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爱国标准，而不能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爱国标准，否则，香港人与海外华人的爱国有什么分别呢？”

从以上几段引句不难看出，强世功要强调的是：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而且与回归前不一样，爱国现在的定义是爱政治实体。

但是这跟邓小平公开说的爱国定义不无出入。邓小平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香江文章也印证了中共香港政策 --“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份利用”-- 的现实主义性质及统一战线论述难免的遮蔽性。

强世功说：“在香港政策上，毛泽东是政策制定者，周恩来则是执行者，而廖承志作为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负责香港”。“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中，是为了在政治上分化英美势力……”。「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侨务工作……”。“最后，就是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发展的价值”。

通常一般论者也认为中共的香港一国两制安排，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政策。在这样的现实的考虑下，主权、民族或阶级的原则都暂且放下。

强世功承认说：“中国共产党要求支持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看来似乎显得离经叛道”。

他接着强调说："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共产党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

强世功直接承认中共的核心要素不是阶级与民族，照这个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也不是

反资反殖反帝（不知道老共产党人看到有什么感想），而是国家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左翼政党。

强世功更强调说一国两制的设计"并非基于对现实的权宜考虑"、"是中央的长期国策"，并说："'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传统之上的政治思考"。

这几句话怎么解释？强世功到底想要建构怎样的大论述呢？

（三）

曾任全国政协的香港评论家刘乃强说："一个真正的左派激进者，会批评中国和共产党 …… 强世功兄是我的朋友，他很多观点我都同意。但是强世功是真左派，左派的分析架构，不论'旧左'或'新左'，都从马克斯开始……"。从香江文章来看，一方面强世功肯定一国两制对香港资本家利益的保证 ，这位刘乃强眼中的"真左派"，其实不见得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另一方面是从中国政治语境来看他确是甚左，批评改革开放，相对肯定文革、反对告别革命。

看这一大段："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秽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问题，窒息了中国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实用主义中丧失了生命力……" 。

还有："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既没有探求背后的'儒教伦理'，没有探究背后的民生观念，也没有以政治意志将经济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创造，反而在非政治化的社会科学轨道上将改革导向了最低俗的对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实力的炫耀，从而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

这都是对改革开放的清晰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否定。在内地，肯定文革、批评改革开放等于暗含了对邓小平的指责。

强世功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左派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新左派"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想先指出的是，从香江文章可以看出，强世功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强世功对毛的崇拜可从他在香江文章里多次禁不住用"伟人"、"伟大"、"智慧"、"深刻"、"天才"来形容毛泽东及毛的意识，溢美之辞俯拾皆是，如：

"当毛泽东晚年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时，他的意识早已超越了万里长城，触及了'共产主义'这个天下大同的境地"。

"毛泽东这一代人所诉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赖钢铁般的政治意志与天才的政治智慧"。

什么是毛的核心意识？强世功说："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有领导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命冲动，他坚决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而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并独立承担起领导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使命，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强世功认为毛的终生意识是共产主义革命，反对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综观香江文章，说强世功是个毛主义者，认同毛的意识，应无异议。

跟今天中国内地许多毛派一样，强世功相对肯定文革，连带也必然相对肯定 67 年香港的"反英抗暴"："'六七抗议运动'的悲剧无疑是'文革'悲剧的一部份。而这场悲剧理应放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来理解，放在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试验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与第三世界革命'为穷人讨公道'的道德基础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伦理追求中去理解"。

在香江文章《无言的幽怨》一章中，他认为自己在替香港左派表达一种怨："香港左派一直拥有最为高尚的道德质量，他们曾以毛主席的教导为道德训诫，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正是这种道德质量的支持，当国家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左派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私利，参与反英抗议运动，毫不顾忌个人和家庭损失"。

"但在'着眼于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义'、'爱国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国家利益、民族统一大业这些传统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战胜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历史恩怨，使他们与工商界在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中携手合作"。

"香港左派几十年来在香港背负'暴动'包袱，在内地又背负'文革'包袱，可究竟谁来为这无怨无悔的爱国代价买单？"

强世功的毛派立场，使他能感受到香港左派与中国毛派的幽怨 -- 怨中央香港政策、怨中央对文革的态度、怨改革开放、怨一国两制。

但是，作为中联办官方智囊，作为平步青云的北大法学院副院长，强世功又不能过度偏离或逆反官方论述。正如许多天朝主义式的所谓"新左派"的内地学院既得利益者的策略一样，强世功也很周全的两边讲话，在香江文章另一些章节里力捧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样，毛、邓在分开的语境，都显得伟大。

在《政治的智慧与意志》一章，强世功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

同一文章说："首先是主权，其次是治权，最后是过渡。这是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完整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展示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展现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

在另一文章里，强世功还说："如果我们以这种真正的大历史眼光来看待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那么其精神实质不仅恢复了中国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则，而且重新启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在香港问题外，强世功这位毛的崇拜者，也可以同时用正面的语气来顺着说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句话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辞。肺腑之言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纠缠'姓资'、'姓社'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外交修辞是因为邓小平将中国的外文政策从外张转向内敛"。

强世功更不忘恭维近期的领导人："邓小平在总结中苏论战时之所以认为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就是因为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不一定非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不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最好辩护。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发展到今天的'三个代表'理论与'和谐社会'理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悄悄取代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

强世功这位"毛左派"又如民族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一般肯定现有党国体制、欢呼今天中国的成就："彷佛是历史命运的安排，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和四川大地震激发出中华民族空前的文化向心力、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影响力，向全世界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展现出现代中国政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从上文我尝试指出，强世功想在香江文章一套文本兼顾六种难以调和的论说而出现前后矛盾。到这里我主要罗列了四种：一、解说中国官方现实主义的香港政策；二、强世功个人对建政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相对肯定及对改革开放年代的批评；三、强调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但邓小平也同样伟大光荣正确；四、展现当前中国政制的正当性与优越性。

但香江文章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正如一些"右翼毛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悄悄取代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强世功也要用修辞、拼贴与雄辩来强行连结中华帝国王朝、政治儒家，毛泽东、邓小平与现有党国体制，强调传统王朝与现有政体的连续性，以强化现有党国体制的正当性，遮蔽其中的矛盾，选择性的挪用历史，从而建构超越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新天朝 -- "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主张自己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份，又是中华帝国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



强世功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思考首先关注的是'不变'的要素，这就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根本关怀，其核心思想依然是'仁'，是共产主义下人人自由平等的至善之境"。

强世功说："处理香港问题并不是处理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而是处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强世功香江文章的企图心是要以天朝主义来包裹香港问题，也正是因为强世功有这样的企图心，才让我们可以反向阅读，解构这种天朝主义。本文将指出这样的天朝主义模糊化了现代主权观念，增加了周边地区对中国理解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强世功个人思想的一种施米特主义决断论倾向，使他的主权观念变得主观化。

（四）

为什么在强世功眼中，一个特区 -- 一个例外之区 -- 成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强世功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其精神实质不仅恢复了中国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则，而且重新启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强世功想通过论说香港来证明什么？

他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还是民族国家理论)，可这种超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然而，正是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难以解释的关键点上，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思考实际上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念。这种'天下'观念超越了阶级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而把政治秩序的差序格局与围绕地缘展开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只有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与传统儒家理论在最深层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例外，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例外"。



放在香江文章内部脉络来解读，强世功以这段话来包含他认为互相关连的几点：一、一国两制的安排超越现代即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国家主权观念；二、一国两制这样的安排延续了中国古典政治传统，即超越了主权民族国家概念的儒家的天下观念；三、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有一致性；四、中国是现代国家的一个例外。

所以强世功说："一国两制之'国'在制度建构上是反现代国家的，其政治哲学也是反现代国家理论的，而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建构和政治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

现代国家是什么？强世功毫不含糊的说："…主权概念的兴起才导致现代国家形态的产生"，"在国家理论中'帝国'往往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尤其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主权国家模式取代了帝国模式，成为现代国家的常态"。

现代国家常态是指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是不可分的、互相构成对方的。这是国际上一般人现在理解的国。强世功此时是以国际一般理解来定义现代国家。

但同时强世功在香江文章中要说明中国是现代国家的例外，所以他在文中提到国家、国的时候都加了括号，而他用来建构中国非"国" 的例证，就是香港特区。

强世功说："……'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古典中国' 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

他解释说："基本法的制定过程无疑是第二次建国过程，这个国家不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包括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混合型国家。正是由于基本法的存在，使得宪法建构起来的'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不再是传统的单一制国家，而变成'多元一体' 的国家。因此，今日'中国'的面貌不再是一九八二年宪法所反映的面貌，而是它和基本法结合在一起所反映出的面貌。如果考虑到澳门基本法，再考虑到将来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法律建构，那么'中国'的面貌已超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恢复到了古典的'多元一体' 的文明中国的风貌"。

所以，"'一国两制'为中华文明在主权国家时代的复兴提供了有益的刺激和动力"。

所以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想象力及其恢复中华文明秩序的崇高境界"。



“恢复中华文明秩序的崇高境界”中的中华秩序是指什么？

强世功与天朝主义论者借用了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说法，即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故也一直强调中国是“历史上形成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一国’之‘国’被翻译成 country 而不是 state？……它是在文化历史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国家…”。

强世功说“按照传统的政治理念，国家不是一个法律建构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实体。…文明国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宪法国家或法治国”。

天朝主义者要“超越”西方宪政与法治国家话语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传统的政治理念或古典的政治传统是什么？上文引过强世功说“‘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传统之上的政治思考”。传统政治思考就是指“中国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则”、“儒家的政治理想”。

至于儒家是指政治的儒家，其根本在于捍卫政治实体：“儒家的政治性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问题意识展现出来，其根本在于捍卫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现出来的政治实体的正当性”。

强世功补充说：“儒学离开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最终只能走向没落、消亡的道路”。

他批评香港新儒家：“正因为忽略了儒学的政治性，新儒学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地教育面前失去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文化力量的工具”。

强世功认为政治儒家不能与政治实体分开（根本上要捍卫政治实体），而它的政治理想是封建。他说：“‘封建’的政治思路源于夏商周，尤其以儒家所推崇的周公礼制为典型，强调周天子之下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各地由地方的宗族贵族实行自治。…如果说郡县思路强调‘一国一制’下的统一性和均质性，那么封建思路则强调‘一国多制’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体现在国家政制结构上，基本上形成对中心内陆实现郡县制的直接控制，对四海边疆采取封建制的间接控制的思路。正是这两种治理思路的有效组合，随着中心的文化和力量的不断强盛，就会形成对边疆地区缓慢的中心化或郡县化过程，中国的治理版图也随之不断扩大。…这称治理模式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致”。

这段话要注意几点：一、封建的间接控制缓慢但单向的转为群县的直接控制；二、中国版图随之而扩大；三、这一模式以清代为极致。

强世功说："中国封建结构中的差异性并非基于种族身份，而是基于礼仪教化之类的文明化程度，因此这种差异性不具有不可变更的断裂性和对立性，从而保持了'差距格局'的连续性，内与外、私与公、敌与我都是相对的、临时性的和可改变的。'蛮夷之地'通过教化完全可以变为'礼仪之邦'…"。

"儒家古典的政治哲学传统…不但维持了'中国'本身，而且使得'中国'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展，'天下'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蛮夷"们大概会比较担心这种"差距格局"是临时性和可变的，通过教化可以把他们纳入礼仪之邦，天下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许多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是上世纪下半叶才成为有清楚疆域的民族国家，即与中国有着同等性质的民族国家。但天朝主义的论述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由疆域清晰的民族国家转为一个疆域模糊（可大可小）的天朝。

强世功更说："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所复活的、关于'中国'的政治想象才刚刚开始，给了后代足够的发挥空间」。

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在强世功的论说里，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并不是处理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而是处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在强世功的话语脉络里，中华文明复兴的最核心是中国天朝的复活，也就是一个非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的崛起，封建的天下体系的再现。

强世功还说："不少国内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中国古典政制的这种独特性，汪晖为我们展现了中华'帝国'的丰富内涵，赵汀阳、吴增定则直接称之为'天下体系' …"。

不过，若果中国不是民族国家，难道强世功认为邓小平是想中国再成为帝国吗？

强世功说也不是："'中国'既不是罗马式帝国，也不是英国式帝国，它也不符合西方左派所描述的全球帝国结构的原理，它体现的恰恰是'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具有的含义，即一套处理中

心与边缘的主从格局中的伦理关系”。所谓中国居中心的主从格局，是指”边疆服从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承担起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道德责任”。

“天朝不仅意味着权力，更重要的是承担道德责任。这也是中国文明被称之为儒教文明，从而区别于西方所谓的基督教文明的根本所在”。（依强世功这个“根本”性说法，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岂不是很像？）

强世功不纬言以大清帝国为楷模，“从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朝贡制度，到对朝鲜和越南等的宗主国隶属关系，再到藏蒙回的边疆地区，最后才是内地的核心带，形成‘一国多制’下的政制差序格局…”。

“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弹性的政教制度来解决，将中华帝国治理边强政制发展到极致，有效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于在捍卫帝国主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个别统治的政策”。

例如说：“通过宗教来解决边疆领土，无疑是极富想象力的政治技艺”。“大清帝国初年通过佛教来延伸帝国领土的策略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因为无论对于南亚和东南亚，还是东北亚和蒙古，佛教的政治意义不亚于贸易的政治影响”。

强世功要复活的，大概是这种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因地制宜的统治术，想象着现代中国“超越单纯的郡县-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思路，而进入到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宪政构造的思考”，更已让想象力覆盖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与蒙古。

（五）

一个中央集权、以文明自居、自称继承帝国的传统政治理想、疆域可大可小的天朝，难免让邻近的尤其是历史不久的民族国家起疑。强世功等天朝主义论者为建构现代中国政治“大空间”的努力，是否真的符合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值得商榷的。

同样，天朝主义论者摆脱西方政治话语的尝试，也很有局限。



天朝主义论者普遍想改用中国传统资源来建立自己的政治观念及确立中国的例外性，依他们的说法：中国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大家不要用这些西学观念来套中国 -- 以本文的话语，强世功等一群学者试图重新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新的天朝。

但主权这个外来词怎么办？这是个来自西方的观念，而且与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分不开的(即强世功自己说的“…主权概念的兴起才导致现代国家形态的产生”)。中国政府不但向来采用这个词，而且可说是倾尽全力保卫这个词的，历年来为了主权这个概念做了大量宣传上、推广上、教育上、维护上的投资。

譬如说刘晓波不能去领诺奖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司法主权。

中国政府很清楚自己是现代国家，万国之一，拥有自己的主权，故也必须承认别国适用同等的国际准则，即皆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2010 年香港学者沈旭晖提出香港政制的“次主权”性，遭受亲北京评论家的围剿甚至人身攻击。据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张楠迪扬的看法，“主权的实体是国家”，“是国家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没有中间状态”，“次主权是伪概念”，“用‘次主权’标签这种用意十分危险。一旦此概念成为意识形态标签，恐怕会为未来国家主权完整性认同制造意想不到的麻烦”。

其实，在沈旭晖提出次主权之前，也有张炳良提出的“次国家”，及邓特抗与 Roda Mushkat 提出的“准国家”。连强世功在写香江文章时也认为：“陈弘毅教授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即香港是一个‘准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学者是在试图用国际（西方）政治概念描述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一国两制。但暂且不论这种用国际政治话语筑构香港政制论述的进路是否可取，就从亲北京评论家的强烈反应以至后来讨论被叫停，就可以颇明显的看到，中方是倾向对主权作出较刚硬的解释，不想有任何含糊。

中国政府至今捍卫主权一词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官方不断强调主权，对西方的主权观念的认同（如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已超过西方列强。



可是，强世功等天朝主义论者强调中国不是国际共识的民族国家，其实已经冲击了主权观念，也动摇了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际法及国际秩序，增加了邻近地区对中国国家观的理解的不确定性。

但强世功在否定中国是民族国家的同时，到底还是不敢挑战中国官方的核心立场。他宁愿自相矛盾，也不敢放掉主权这个西方观念（同时也抱着中国这个“国”符号）。

他在香江文章里很清楚的是用西方话语介定主权：“‘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

这里他承认西方主权观念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但香江文章的主旋律（“这种‘天下’观念超越了阶级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却是为了说明中国超越了现代国家，这是他在天朝主义建构上的一个自我矛盾。

他对一国两制意义的过度阐释，更使得主权观念无可避免的进一步模糊化和去地域化：“……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 与“主权行使” 两个概念”。

如果西方主权观是国际普遍标准，与之背离相当于另起炉灶。别国可能会想，你们中国在“现实的政治统治”及自己实际控制的土地上行使主权，大家没意见，难道现在你们还想在不能行使主权的地方伸张所谓主权权利？每个国家都伸张主权权利，以历史来说事，现有的国界都要乱套。

天朝主义论者的国家主权观念往往不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上文引过强世功说“按照传统的政治理念，国家不是一个法律建构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实体。…文明国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宪法国家或法治国”。

强世功在香江文章中还特别引用毛泽东的“无法”为例：“即使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 1954 年宪法，但他认为这部宪法是临时性的，被看作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新中国’的这种政治性本身决定了其‘反法权’性质，而这种政治性的真正载体就是‘党’，而非‘国家’……‘党’承担起了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使命，是政治的灵魂，而‘国家’不过是‘党’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器’，是‘党’在天下大同实现之前的临时性居所”。

在 2009 年一篇叫《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的文章中，强世功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的人民主权，党的意志就是不成文的宪法，有传统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成文的国家宪法之上的。

（六）

强世功对成文的宪法如此的贬抑，党大于国与宪法，确令人想起基本法是否牢靠、是否值得信赖。这里要同步解释为什么强世功对毛泽东、邓小平所做的事，哪怕互相矛盾，都可以被认为是伟光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党的领导吗？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决断者？这说到强世功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就是施米特的决断论，一种认为领袖就是主权者、主权者可以做任何决断的政治“神学”。

在强世功借调香港中联办的翌年，即 2004 年，他接受了内地报章访问，谈到当年乌克兰的民主选举，批评该国将选举是否有效交给高等法院来判断。强世功一再引用施米特的反自由主义宪政的思想，值得引述：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恰恰为不同政治势力的支配甚至分裂这个国家提供了合法管道。国际势力正是通过民主化国家中的不同政治派别，把自己的政治触角伸到这个国家内部。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施密特和凯尔森争论的焦点所在。在凯尔森看来，整个政治都纳入到宪法之下的法律规范的等级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必须服从宪法，一切违背宪法的政治行动都无效的。

但是，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危机时刻的政治决断只服从上帝的意志，而不是宪法。

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今天，乌克兰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整个宪政秩序在反对派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统治者缺乏决断的能力，总统和选举中获胜的总理完全丧失了政治决断能力，丧失了用暴力来捍卫宪政体制的能力，而陷入到民主协商的对话、谈判和诉讼中。而其结果，只能将政权拱手让给反对派，将主权交给反对派。其根本就在于在所说的民主、程序、法制的话语中，丧失了韦伯所说的"政治本能"，即捍卫权力的本能。正是在政权争夺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施密特对政治浪漫派无休止的 "永恒的对话"深恶痛绝"。

在同一篇文访问中，强世功还说："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追求权力的政治本能，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或者'江山'在谁的手中的问题"。"政治的本质说到底是强者对弱者的支配"。

可以看到，强世功这位法学家，推崇的是一种与自由主义法治与代议民主宪政对立的，但不能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 -- 一种施米特主义的法学。

我这里再补充解释一下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



对相信上帝或天主教皇的人来说，上帝或教皇永远是对的，是可以依赖的最终决断者。但正如卡尔·洛维特指出：当时身为纳粹德国桂冠法学家的施米特"既不信仰 16 世纪的神学，也不信仰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更不信仰 18 世纪的人本主义道德"，但他却坚信一种毫无道德和形而上预设的虚无主义的政治神学。

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开篇第一句说："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

"关键在于作出决断，而不是如何作出决断"；

"没有更高一级的法庭来评判这种决断"；

决断就是最高的法权。

"一切政治决断都不可避免地缺乏客观性"；

"权力，而不是真理制定法律"；

"权力为建立权利，不必是正确的"……

因此洛维特说："施米特那种俗世的决断论必然是随机之作"，只是认定"一切政治观念肯定都是斗争性的"。洛维特指出："施米特宣称，国家的本质使其必然倾向于作出绝对的决断，这种决断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也无须辩护……它仅仅是为了作出决断而决断"。

在引用麦斯特的一句话"任何政府一经建立便是好政府"的时候，施米特说："决断完全取决于现存政府的权力；决断本身就是有价值的……"(麦斯特就是柏林所说的法西斯思想的老祖宗)。

在另一处，施米特说：独裁者的决断，是跟浪漫主义的对话和议会讨论形成最强烈的对照。

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不需要客观性或受法律限制。主权是凌驾在宪政与法治之上。这里，主权由谁来承载？主权者是谁？谁做决断？只可能是自称代表主权的、在俗世替代上帝、

在后王朝时期替代皇帝的的国家领袖。施米特的决断论理念呼唤着一个洛维特所说"用主权作出决断的'领袖'及其人民的'紧跟'"的绝对独裁局面。

了解到强世功思想中的决断论成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香江文章里，毛永远伟大，邓也永远伟大，因为他们都是强世功眼中的主权决断者，主权者作出任何决断，哪怕是主观随机之作或自相矛盾，都是伟大的。

伟大也是施米特爱用的词，如"伟大的政治高度"。这句话施米特是指充满危机和风险的战争 --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战争最能突显非常状态，也最能突显主权和主权者伟大政治高度的决断。强世功在 2005 年《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文明持久战"下的台湾问题》一文写："一个大国的兴起往往要通过一两次标志性的战争胜利获得自我认同和世界承认……必须认真对待战争，必须紧紧地把握和驾驭战争，必须对战争有深思熟虑的考虑，既要避免因为战争而迈向崩溃，又要把握利用战争迅速崛起的时机，更要在有能力争取不战而胜，和平崛起……我们必须把战争作为实现台湾统一的必要组成部分来思考，把战争作为政治的必要手段和可能途径来思考。"

（七）

关于中国天朝主义，本文只想再补充几点。

历史由"传统"到"现代"，有断裂也有连续，以前的共产党人（包括左翼毛派）强调与过去的断裂，天朝主义者（包括右翼毛派）强调与传统帝国王朝的连续。在认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这点上，许多不同思想进路的中国学者也会持相近的看法，必须细分。

天朝主义者推介给中国现代政治想象的传统政治模版，一是周的封建，二是作为帝国的大清。

西周的封建早就跟中国历史断裂，只剩下后世的想象和重构。近年新的周研究者如李峰，从西周铭文得出实证的结论是西周封建是一个中央集权、以官僚控制地方、以军事手段不断扩

张疆域的「血亲武装定居点殖民」。之前一般中国读书人所知的西周政治面貌是后世一厢情愿托古的建构。

比较具体的模版是被强世功等认为发挥中国政治理想到极致的大清国，并以此筑构当前中国的天朝主义。

但是强世功的天朝主义，普遍犯有三种学理上的谬误：

一、化约主义的谬误 (当前中国=政治儒家+周封建+大清国+毛+邓)： 以简化、拼贴、修辞与雄辩营造反普世、反西方的中国天朝主义、中国例外主义，这对很多人有着致命的魅力，其实就是一种贩卖给党国和中文知识分子的精装国族民粹主义。

二、预设立场的谬误：从理论及意识形态的预设下倒着看历史，甚至从现代中国党国体制的政治合法性角度回看历史，以服务当前的党国天朝 --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帝国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

三、遮蔽与夸大历史材料的谬误：选择性的挪用历史，遮蔽不方便的真相，过度解释有利的实证和文献，以配合第一、第二点。

关于第三点，这里只需要指出，如果参照的模版不是周封建王朝或大清帝国，而是辽金宋共同组成的“中国”，我们不仅可以辩说辽国才是大唐的继承者，而且已经可以看到诸国的实质“民族国家”性质及与东亚多国交往的“国际”态势，而不是天朝形态的中国。

再说，以大清国作为当代中国的模版其实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因为用新的清史学研究的说法，历史上的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仅以中国天朝皇帝身份出现的。大清是一个超越中国的大帝国。

天朝主义论者也强调大清王朝是一个以多个相对自治的民族特区及对民族分等分类的差异政策组成的帝国，即香江文章所引用的：以八旗制度统治满州，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

如是说，满清凭侵略扩张得来的国土，没有不是特区，大清国是由因地制宜的民族特区组成的。

特区的存在有助于看出大清“国家”的后天建构性质。特区是大清国统治的技术，也是大清国之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构成特质。

依这个逻辑，汉地“中国”也只是一个民族“特区”，而在汉地对汉人的管治甚至所谓汉化，也只是满清对异族的一种统治术。

大清帝国的国土包括现在的中国但不仅是中国。现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国土大致继承大清的帝国疆域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继承。

清帝协议退位，多民族帝国的疆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由反帝国主义的两个共和国接收吗？这之间的正当性恐怕不是自明的。

以满清为模版，反而会替“非中国化” 或“非汉族化”提供思想资源，更不用说让满清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儒家思想的极致发挥的一厢情愿说法难以成立。

天朝主义在取向上是维护“多元一体”的一国多制格局，并主张以香港为参考模版，作为中国以后治疆拓边和处置周边国家的统治实验田。天朝主义并不反对“特区”和民族地区暂时性的“自治”（在“改土归流”式被逼放弃自决变成中国行省之前）。但天朝主义同时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国家认同、党在法之上、中华文明教化，视特区的存在为中央审时夺势、因地制宜的统治术，而不是以法律协议（如基本法）或地方人民的自治权利来看待一国多制，特区自治的宪法地位受贬抑，一国与多制之间的猜疑也更难以消解。

香港特区基本法是带有自由主义法治及代议民主宪政性质的，是尊重个人权利的，而天朝主义恰恰与自由主义法治及代议民主宪政精神最为抵触，更在内涵里没有个人权利的考虑。

天朝主义的论述架构，还倾向将特区“去政治化”，视特区为实现中央统治术的被动对象，最好是一个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区，至少不要加大政治化，这与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区现实有着认知的落差，削弱了这个论述对香港现状的解释或开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误判。香港过去的六十多年，是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中，也即是个人权益、维权意

识、公民社会、公共参与、身份凝聚、港人主体性、社会自主性等"政治"特质逐渐突显的时代。天朝主义的思路比较不能处理特区早已成形的主体性，甚至对特区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抱着怀疑态度。

香江文章的作者强世功有中国官方身份，又是重点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发表的香港言论可能会被认为有权威性，所以本文才花大篇幅去整理、去理解这套矛盾重重但也发人深省的文本。

2011 年 1 月

（陈冠中，香港作家，现居于北京，七十年代创办《号外》，著有《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三部曲》等。本文摘录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书写-- 香港的例子》一文。原发表于《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 年 12 月 17 日，香港））

【返回目录】

附

陈冠中：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书写——香港的例子〔节选*〕

“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当然还有其它次要）是相对于大陆而建构出来的，背后的历史原因无关民族认同，而是对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和政绩的回应。中国每一个改变，也改变港人。坏的事情如 89 六四把港人推得更远，好的转变如改革开放经济成长把港人拉近。”

1 序言：歧义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多年，香港的其中一个最纠缠的论述命题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归结：“香港往何处去？”

为此，各种新旧论述试图解答、预告以至进一步诱发这个命题。本文则想说明，现存各种套路化的论述本身都很有局限，现实可以比论述更吊诡，各种概念性的隐喻和标签并不完全恰当，各论述背后的价值取向亦不同，它们之间将互相争持、相互渗透但始终难以调和。引申而言，香港的不确定性将继续下去，香港存在的自主空间有限（但是有可为），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两种制度并存，但是香港的自主性将越来越受制于中国，不过中国对香港 -- 相应着中国对国际社会、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 -- 的行为也是受制约的。

本文将谈到大家熟知的套路化论述包括发展主义、法治自由、现代化、阶级分析、管理主义、殖民地遗产、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以及较近期的特区例外论、中国天朝主义及各种本土的论述等。通过梳理这些不同进路的香港书写 -- 各种香港书写背后都有一套溢出香港范围和文本自身的通论性假设-- 本文将提出一些针对这些论述的想法。

殖民者的论述，从早期开始，帝国欲望、文明教化与法治的自由港皆被提出，渐渐固定在法治自由地区一说，虽然一百多年的现实并不完全对应，但也有一定基础。二战后国共两政权都因为实际考虑 -- 包括国内外政治和经济考虑 -- 没有尽力要求收回殖民地，尤其是中共，更提供了殖民地继续存在的自圆其说的说法和权宜政策。除了短暂的文革早期极左行为外，在香



港的亲北京左派依从中央统一战线政策来论述香港，争取居民归心新中国，在内地则强调香港作为对外桥头堡的功能。从 1949 年前后逃共南来者，香港是跳板、客居地、避风塘、福地甚至天堂。冷战期间，美英带动的论述让香港自我理解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但形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却屡受阻搁 -- 虽然香港知识分子的民主书写从没有间断(Pepper2008)。这个时期不少人已经把香港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框架来理解，作为转口港、制造轻工业品的工业化地区、血汗工场、现代化城市、购物天堂、中西交汇摩登都会、放任主义市场经济、起飞的发展主义奇葩、非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奇迹，四小龙之一。到 1980 年代，更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个新兴金融中心、全球城市、市场原教旨的模范生。大约同期，中国作为香港主权国的观念被殖民宗主国明文肯定，虽然中国对香港主权仍将大致属于“抽象的主权”(Shen2008)，而香港人的维持现状的意愿与身份意识也在强化，香港的特殊性为主权国认可，进入了基本法的视野，落实为一国两制。

这些 1997 之前的论述，至今很多还在不断的被重复生产，彼此之间本来已足以产生很大的张力与矛盾（见第二节）。不过，到上世纪 80 年代在主权国主导、很大一部份香港人认受之下，达成了新操作共识 -- 具体表现在基本法的“矛盾统一”书写。但是，因为近年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的危机，思想界话语的更替，香港人主体性的复杂化，以前的这些论述或开始被重新演绎、或受到挑战，产生了新的论述可能，也因此产生更大的张力。

本文试图指出，较完整的香港论述既离不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论述和主权国家论述，也缺不了本地人的本土论述。很明显，香港人的主体意识与对中国的认同意识在回归后都在加强（郑宏泰、黄绍伦 2008），但香港“本土”或“香港人”的主体性成份多元，本身是有歧义的，并不是自洽自明的。况且，香港本土论述其实不能只看本土，还得考虑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主权国的关联性。

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上如此，政治上如此。虽说高度自治，香港往何处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主的，而是深受着中国内地发展的影响，也要看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同时，中国在全球体系不同阶段的角色，也将影响中国对香港的政策。

但这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很多评论都在探讨这个空间，最常见的是从经济角度找出路。在对香港的看法上，现代化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最新强调香港必须加入中国十二



五规划的中国依赖论述都把香港问题放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范围来谈。这些同样是经济主义的进路，有三种不一样的侧重：一种认为必须让香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意义，让中国不能没有香港，以保香港的地位，避免被中国"撇账"(雷鼎铭 2010)；第二种主张香港应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链的重要位置，不能过度依赖中国，从而维持香港的经济活力（陈志武 2007)；第三种认为香港经济主要靠中国给政策，两地必须融合，更要嵌入中国的五年计划（刘兆佳 2010）。本文第三节将提出一些经济以外的思考角度，因为只以经济角度考虑中国与香港关系，低估了国家主权、维稳诉求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可以说，本文比一般带经济主义倾向的评论 -- 以及之前的现代化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论述 -- 更注重主权与主体这两个方面。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今日世界，有许多分别属于不同主权国的特区，香港只是其中或许较受注意的一个。每个特区与所属主权国的关系不尽相同，但特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主权、民族国家、族群、公民、人权、民主、宪政、法治、中央与地方这些好像自明的概念产生张力，而主权国也要对特区的存在作出解释、提出受认可的说法。

但是主权论述是比较不能处理特区的主体意识的。如果特区本身有了主体意识、身份认同，而这种意识、认同与主权国的主体意识、身份认同就算有重迭但却有差异的时候，主权国对待特区的治理策略也相应的需要调整。

至于源自傅柯的现代性管治技术批判，加上受施米特及他的左翼「辩证追随者」启发，旨在挑战西方自由主义宪政的新自由主义特区例外论(Ong2006 , Choi2007)，虽强调东亚国家对国内空间及居民作出差序安排的主权能力、管治技术和发展主义安排，却忽视例外地区的主体性。

人类学家翁爱华在讨论亚洲国家的特区即新自由主义的例外地区的时候，视特区为主权国 -- 本身往往原本不是新自由主义地区 -- 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式经济发展的权宜响应，忽略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对香港、澳门这样的特区的历史与政治考虑。

但是特区例外论述却提醒了我们一点：国家的主权论述，在面向特区的时候，不论对国内或对特区，事实上常常需要采用务实但妥协的说词，辅以宏大民族主义爱国修辞和选择性的历史挪用来遮蔽论述中自相矛盾的部份，从而合理化特区的存在（见第四节）。

在中国的民间，网上较激烈的言论似更不愿意容忍特区的特权。官方论述本来相对稳定清晰，但个别官方智库学者的论述，以强世功的「中国香港」一书为例，因为要肯定两代领导人的永远正确，遮蔽了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特别是头三十年部份不堪的历史，因此解释不了香港人对国族的复杂情绪。同时，强世功在官方论述之外，添加了一套新叙事，把香港放进一个重新演译的中国当代史里，以说明中共政权与大清帝国式的中国天朝传统有着连续性，含糊了大家对主权的共识，使得原来大家理解的官方论述多了一个不稳定的维度。

本文将以香港为例，顺带检讨中国部份国家主义者、右翼毛派、复古主义者及反西方现代的学者正在建构的中国天朝主义，指出天朝主义含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也即削弱了连带的主权观念。部份天朝主义者如强世功更带有决断论倾向，意味着一切宪政或政治契约安排可以凭掌主权者的主观定夺，因地制宜、审时夺势而随机改变。这些言论若扩大影响，将增加了香港特区前途及中国国家行为包括在国际上行为的不可测性（见第五节）。

除了民主论述与本土的文化主体论述外，其它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特区例外论、天朝主义，不仅是忽略或否定特区已成形的主体性，还将特区「去政治化」，视特区为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区，或希冀特区不要政治化，这与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区现实有着认知的落差，削弱了这些论述对香港现状的解释或开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误判。香港过去的六十多年，是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主体意识强化的漫长过程中。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影响香港人、香港身份认同、香港主体性成形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虽然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表现。1949 年后“香港问题”的最重要奠基时刻，就是共产党 1949 年在大陆执政这个事实。这是很多中国人在 49 年前后、60 年代初及文革后大规模移居香港的主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从中英联合声明到 97 回归前这段时间 --特别是 89 六四后 -- 几十万香港人移民外国的背景。这是为什么需要一国两制这样的安排。这是为什么至少一半以上的港人要求普选民主的动机(虽然不是唯一动机) 。这是香港特区之所以要成为特区、以及一国为什么要两制的所有解释中的最终解释。

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当然还有其它次要）是相对于大陆而建构出来的，背后的历史原因无关民族认同，而是对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和政绩的回应。这点不能回避，否则不可能理解香港问题 -- 中共的香港论述往往就是回避这点，所以说不清楚港人心态。



中国每一个改变，也改变港人。坏的事情如 89 六四把港人推得更远，好的转变如改革开放经济成长把港人拉近。香港人心回归，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是否能把内地的事情做好。如果中国政府不自我检讨而整天怪港人拒中，那是本未倒置。

同样，二战后殖民地时期至回归后香港本土民主进程的延搁与加速都是跟中国有关的。49 年后香港本土工人运动的不振或冒进，也与中国的香港政策有关（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立场往往并不是左翼的）。举这两例是想说明当代香港事情是深受中国左右，哪怕是因此没有发生的事情。所谓受中国左右，不一定是直接干预，而是指中国是香港政治想象的边界，香港变化与不变的金刚圈。49 年后中国对香港扮演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的角色，在殖民者、特区政府、香港人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中国永远是在"深层有意识"里面，中国不是香港的外在因素，而是构成香港性的内化元素，是香港一大部份重要问题的最重要终极符号。

或者说，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往往是一种被冲击然后回应的关系，中国冲击香港，香港回应中国。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改好，香港人对中国也会改好。

但是，在某些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论述，恰恰就在粉饰中国内地的管治缺失及掩饰当代中国历史真相，对过去六十多年中国内部的"暴行"略而不提，把这部份历史遮蔽，不承认过错甚至要把坏事说成好事，然后问为什么香港有人如此这般的不认同中国，这不是面对现实的态度。

中国官方对香港的论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今，有相当的连贯性，尝试顾及经济、主权、法理、历史、体制与特区居民的意识，希望随着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改革开放、爱国召唤，人心回归，消除国家与特区的矛盾。中国一国两制的香港政策，总的来说是达到原来的一些目的，包括平稳过渡、维持香港既有体制、襄助中国现代化。但由于内地政治欠清明，管治受港人诟病，改革不如部份港人期待，特区本土意识的提升，加上中共对 89 六四天安门等事件未能检讨，两地人民近距离接触引起无奈但不可避免的磨擦等等原因，中国官方的人心回归愿望至今得不到绝对的保障，而一部份特区居民的民主诉求亦因为在北京掌控时间表的情况下进度缓慢而出现不满情绪。换句话说，国家与特区还存在内在的矛盾。

至于香港的其它论述，不论是法治与形式民主的论述、核心价值论述、去殖民地论述、反资本主义论述、自决论述还是其它本土文化论述，往往在话语脉络里低估主权的刚性、国家认同的政治能量、北京对香港的制约力、香港对内地的依赖、市民核心价值的分化及部份港人真诚的中华情结，亦就是说较容易高估了特区政治自主的空间及香港在这个历史阶段选项的弹性（见第六节）。

其实作为主权国下的特区，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弹性但也有不易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有内置的法制与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要探讨这个政治自主空间，也等于要更深入理解主权国在看待这个非一般的特区时候，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或政策选项，而不是把主权国排挤在外。

中港都要利用「刚硬的框架内最大的弹性」(Tsang 2004) 。

本文也试图指出港人身份认同不容否定，但没有一家之言可以笼断多元的本土或代表香港人，事实上也没有甚么身份认同或本土主体内部不是矛盾重重的（罗永生、孔诰烽 1997）。本文同时亦向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极端左翼、轻视形式民主（代议制、普选）的直接参与式激进民主、拒中的自决观及排外的域群主义（地域族群主义）提出质疑。

本文理解主体呈现的一个证明是当地人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来描绘自己，不完全套用外在观念来定义自己，更避免把别人的舌头装在自己的喉咙里（至少意识到有这个问题）。本土其实已经是有颇多可援用的非二元对立性的思想资源及现成论述，例如反思性的殖民现代性(孔诰烽 2009)、城市抵抗与市民期待(夏铸九 2009)，从主位角度出发并拒绝大叙事的微书写微实践（Chiu 1990），以及香港作为方法、开放的杂种本土主义、多元主体性、后殖民的世界主义 (陈冠中 2006，2008) 等。不过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主体从来不是自洽自明、不假外求的，而另一方面，处于这个内地思想界在积极建构新宏大中国论述的时候，光靠主位出发的本土论述及微观书写不足以抗衡新论述霸权。本文主张以宏大辩论来消解宏大论述，从而摸索一种难以套路化的辩证话语。

本文题目用上了全球化、主权国家、特区和香港等词，试图说明丰满的香港论述是有必要考虑到全球化、主权国家、例外特区及香港主体四个论述维度：



全球化论述：包括以前各种现代化论述，不同阶段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洋教、启蒙、反启蒙、西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起飞论、趋同论、依赖论、阶级分析、民主、东亚模式、血汗工厂、世界城市、新自由主义等等；

主权国家论述：包括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自决、反帝反殖的论述，也包括英国殖民主义者、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东亚、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新的中国天朝主义等等的说词。

特区例外论述：英国殖民地、东方之珠、清帝国的割让地、民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遗留外国人占领区、一国两制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殖民现代性、全球化的例外特区等等。

香港主体或主位出发的本土论述：殖民心态、客居地、“被论述”、中国认同、香港认同、管理主义、城市主义、自治、城邦、主体性、微叙事、去殖民、主位叙事等等。

当然，四种论述维度往往是互相渗透的，但很少兼收并蓄，本文也只能做到让各论述「互揭其短」。本文试图说明，要理解香港往何处去，香港人不能只内窥自己远非自洽自明的歧义主体，必须知道全球化、主权国，及主权国内特区各维度的互动；但本文也想强调一点，香港今后的变化，香港人的主体性也必定扮演不会再缺席的角色。

2 吊诡的殖民现代性：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拯救香港论述

殖民者来到香港，主要是为了帝国的欲望和资本的私利，也带有“文明”教化的企图。这也是香港现代性的发轫。

十九世纪中后 -- 英国世纪 -- 的英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基督教、现代（西方）文明同船异梦的分阶段到了属于汉文化地区的香港 -- 当时的香港岛并不是“荒岛”，更不是汉文明的化外之区。（下略，本节内容见《九十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不确定的年代》两文，陈冠中 2008。）

鸦片战争带来了香港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里既有殖民主义甚至种族歧视，也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思想、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既有资本主义、买办阶层、贫富悬殊、劳资阶级斗争，也有平等思想、民主观念、中产阶级、工业化、城市化、本土意识、总体生活水平提升；既有现代西化和殖民地"奴化"教育，也有圣经、人道主义、法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废女婢买卖及各种启蒙思想，加快了中西文化交杂，并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国学基地。

甚至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也是香港多元一体的一部份。他们身在殖民地心在国家，内围外围有一套一套紧贴内地的话语与党国文化，如毛泽东思想、第三世界主义、亚非拉人民友好、样板戏、东欧苏联民歌、阿尔巴尼亚电影，正因为有异于香港主流，所以可以说增加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香港为各种中外古今思想争持与协作之地。香港的遗产不能等同为殖民地遗产。香港现代性也已溢出一般理解的殖民现代性。香港的成就故也不能简化说成殖民者的成就。

当我们把殖民地吊诡历史及各种被遮蔽的歧义书写都呈现出来，我们才会感到香港论述的丰满。当我们把晚清民初的启蒙思想，殖民地居民一百多年的宪政与民主书写，华人与劳动者自保行动，省港大罢工为代表的各种进步现代政治诉求，香港国学，亲北京阵营的党国文化，非北京控制的批判性左翼、费边社式改良主义，麦理浩时代的官僚善治与福利主义实践，都放回到它们的历史脉络与应有地位后，我们才可以知道香港论述的全光谱，包括但远超出一般套路式的泛泛论述如殖民者文明教化、反殖民民族主义、法治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东亚发展主义、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

这样我们才真的看到香港所承载的现代性的全貌，从而改变对香港的固定想象与论述。

（这还没说到在港少数民族文化、岭南小传统、国民党在香港、上海摩登在香港、台北非国民党的新文化一度对香港文化的引领、欧风美雨、和风韩流……）

本节的旨趣不在全面否定全部香港论述，而是尝试指出一些不足之处、某些被遮蔽的历史、文本以外的假设、论述之内与之间的矛盾……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拯救香港论述。



3 经济主义论述的非经济补足

虽然香港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在冷战时期同属于美国主导的阵营，享受到那一波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工业分工和进口美国的优惠政策，故都是冷战的经济受益者，但是，大部份关于东亚的发展主义通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

譬如说，部份东亚发展论述常说到的政府主导的工业政策及儒家文化，都只适用在日本和其它三小龙。香港政府虽然推行官僚福利主义治理如建公屋，政府并强力干预土地市场(限制供应，提高市场价格)，但却没有主导性的工业政策，不补贴出口，更自称在经济上奉行积极不干预。一般说到儒家资本主义，强调员工忠诚、终身雇用，威权服从，但香港文化特色是弹性创业、不断转型、跳糟转职，虽然重视家庭，却是很功利的讲究自家私利。香港是当时东亚模式通论的例外地区。

这大概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崇香港的原因，即政府不积极主导经济。但是实际上，倡议积极不干预的财政司夏鼎基，曾多次解释积极不干预的意思，与意识形态上仇视政府的弗里德曼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两回事（夏鼎基正是麦理浩的有为政府的财政司）。不过，通过在香港的弗里德曼份子充满使命感的努力，整代香港精英也乐呵呵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心理暗示，换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脑袋。

这也间接导至香港在中国改革改开放后，竟出现去工业化(九成以上工业搬去珠三角) 的现象，把自己得来不易的工业基础空洞化，而不是寻求更科技与资本密集、提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升级。后者是需要政府制定诱导扶助的长期工业政策，但是后麦理浩的殖民地政府没有这种长期打算，而当年的政经精英已中了新自由主义病毒，也没有这种愿景。制造业资本家把厂搬走用厂地去投入地产，一般有钱阶层追求金融地产投机。结果，香港再度成为中国的转口港、替中国融资及替生产者提供服务，错失了自身工业升级的良机(Choi 2004)。其实，就服务业转型而言，香港知识创新产业又何尝不是错失良机？如果在 80 年代去工业化的同时，在区域无对手的情况下，能够发展成为区域的高科技中心、医疗中心、教育中心，多些中等附加价值、中等就业量的智识行业，香港今天的经济体质将更多元健康、居民财富差距也不会拉得这么开(这些计划在回归后香港优势骤减后才纷纷被提出) 。

为此，曾澍基称中港经济是不对称的融合，过去十多年香港不是结构转化而是大多数行业失去聚集效应的结构溶解(Tsang 2007)。

弹丸之地的香港当然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经济往何处去的问题，但这不等于纯经济解释足以替香港找到出路，何况现在的困局部份可归咎于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对统治精英的误导。

回归后十多年，香港经济往何处去仍处于不确定的时期，但特区的政经精英的确终于像是要离海耶克、弗里德曼越来越远了。

回归早期，特区政府既追求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效率改革(如私有化)，又想引导经济(如匡助各种被认为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往往口头说得漂亮，实际上做或不做又是另一回事。但总的来说，这个缺乏认受、自主性受制约的特区政府也知道香港经济不能坐而待毙，而在举步为艰中，从不干预摆向了干预，正如特区行政会成员张炳良说香港要“跨过效率、市场化、管理主义的狭窄领域”，走向“主张干预的发展主义政权”，而“97 前所理解的小政府将不再能够持续”(Cheung 2010)。

问题是特区的深层矛盾，恰恰不光是香港经济继续享有中等单位数增长就可以解决 -- 当然经济不振则矛盾更尖锐。

譬如说，政府的认受性需要通过普选和形式民主来建立，那背后是一套与经济主义有磨合也有冲突的、不一样的理念与价值观。

逆转贫富差距靠什么手段？譬如大建公屋这种大手笔的转移支付，就会受超大地产财团甚至有恒产者的强势阻绕，要扭转局面、重新凝聚公共意志力，就要经历社会阶层的总体政治较量。

经济主义亦低估了香港的环保诉求（如空气污染）、环境局限（如缺乏垃圾堆填区）、本土意识（如保护老区）及香港这样的全球城市中价值产业空洞化必然带来的挑战、怨气与冲突。

区域的急剧融合(或叫集成)，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人人皆为赢家，总会有某些群体受损害，香港以往做法是让这些“下车”群体自生自灭，今后还能这样吗？

再说，内地贪腐之风不遏、弊案不断、人权不彰、言论入罪、社会公义缺位、公安及维稳安全部门滥权的情况不改，很大一部份港人仍不会放心拥抱中国政府。

这些都是在强调经济考虑至为重要的情况下，经济主义论述力有不逮或不想挑明的。单以经济角度考虑中国与香港关系，容易低估了国家主权、维稳诉求与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

4 特区书写难免的遮蔽性：回归前中共的现实主义香港论述

殖民地时期，中国的香港政策，主要是根据现实主义而调适的，短期的例外是 1952 年前后的个别反殖抗争与 1967 年的极左骚动。到殖民地后期，主权的理念才真正起作用，延伸到特区时期更不用说。当然，中共对殖民地及对特区的存在，从来都要找到一套对内对外交待得过去的说法，采用务实的说词，辅以爱国抒情修辞和选择性的历史挪用来遮蔽论述中自相矛盾的部份，从而提出合理化的解释：为什么要让殖民地及特区存在。(下略)

从 1925 年省港大罢工到 1937 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友善的，曾发生多次迫害或递解出境事件。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英人态度也有变。1938 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那刻，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包括港九大队应是日方之外在香港一带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过当时共产党尚未成为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夹在英军与国军之间，中共就算从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大概也还是要再交出去。

当时，中共选择了跟英方谈判，让英国人接收香港。（同期蒋介石在要求收回香港。）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广东区委，派谭天度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谈判，作了九点协议，包括英方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允许中共人员在港居住、往来、募捐、出版报刊、成立电台，条件是中共武装要撤出香港。

这等于说宁予友邦，接受英国占据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这个默契后，毛泽东 1946 年在延安对西方记者说中共现在不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1946 年的中共，不可能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取得江山，除了重申国土完整原则外，提出收回香港确没有实质意义，但毛连这个原则都不去重申。

到 1948 年中共在大陆已胜利在望的时候，香港新华社的乔冠华再次告诉殖民地政府，中共不会收回香港。

因此，中共决定不收回香港，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是因为韩战爆发、冷战升级才作出的决定。

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法国是第一个互换大使的）。

49 年建政前后，中共华南分局一度想当然的以反英斗争作为港澳工作的首位，但很快就纠正过来。

在 1949 年至 1951 年间，中共领导人还要多次向在港共党人员苦口婆心解释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并转达周恩来的想法，说中国必须分解英美，抓住英国人的一条辫子。香港就是这条辫子。

这完全是现实主义挂帅的，里面当然有经济考虑，也有政治考虑 -- 现实主义甚至可以是很具战略前瞻性的。但很明显，申张主权、实现国土完整在当时并不是行事原则。

长期替中共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说：

我曾回忆并思考一九四九年夏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为甚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决定不收回香港？可见用"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维护主权完整" 并非至高无上的唯一神圣教条。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的解放大军席卷江南大地，难道独不能拾回香港小岛吗？……收不收回香港不决定于"洗雪国耻" 和"维护主权"，而决定于是否有利于创建国家大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分化美英反华联盟、有利于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有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金尧如 2005）。

蒋介石曾一度真心想收回香港，但因为英国帝国主义二度占领，加上美国背信偏帮英国而终于未竟其功。

中国共产党在二战后则完全没有急着要消除殖民地。49 年建政时虽然说了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没有实质动作，一等三十多年（除了 67 年的其中几个月），到 80 年代英国人到北京讨说法的时候，才被迫说清楚香港地位，到九七回归，前后近五十年。

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现实主义。后来内地法学者分开抽象的主权权利与实质的主权行使，及“恢复行使主权”这个现已成套句的说法，只是一种事后的创意修辞。现实主义重视的是利益，国家的利益。

中共的现实主义的香港政策，成就了 49 年至 97 年的香港。

否则，根本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中共不在 49 年后任何一个较早时期提出收回香港。不仅止不收回，还要积极维护资本主义殖民地。

大家知道，49 年后中国没有抵制、制裁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香港，继续以粮食、副食品、成药、原料、淡水供应给殖民地同胞(其实也供应了给非同胞)。这一点，由 80 年代中英谈判至今，中方宣传机器是不断强调的，以说明祖国对香港繁荣安定的有形贡献。

新华社 1983 年在一篇强调祖国对香港的繁荣有贡献的报导还指出，内地的供应，价格稳定，甚至在内地粮食短缺或水灾困难时期也没有中断，不然，香港的通货膨胀会更厉害，而廉价劳动市场会失去物质支撑（Johnson 1984）。

但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在建政头三十多年要去帮资本主义殖民地压低通胀，维持剥削性的廉价劳动市场？是因为殖民地有同胞，而祖国基于民族情要照顾血浓于水的同胞，所以要扶持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吗？如果是的话，有必要在内地困难时期不先照顾国人需求，反而要去优惠自愿待在殖民地的同胞吗？

主权国关于特区存在的说法，有实用的目的，故亦都带有遮蔽性，必须靠诉诸情感化的修辞和选择性的历史挪用来盖过论述中的价值观或意识型态之间不易调和的矛盾。

这里并不是否定中国食品和淡水供应对香港的贡献，但还是应该梳理一下。香港是自由港，部份食品还可以从远方进口，但价格肯定会比较高：如果内地供应比外国进口贵，也会失去市场。淡水方面，香港本来是靠自身建造的多个大储水塘供水，也建过海水化淡厂，如果不是后来 61 年开始引进内地的淡水，是会比较头疼的，但不是不可解决，只是要用珍贵的土地

不断去增建昂贵的水塘与海水化淡厂，甚至可能会踫到土地开发的极限。北水南调是合理的安排，当然多年下来有了路径依赖后，就更没有替代的可能了。

但我们也不能单说这证明祖国对港人的关怀。这也是一个关乎买卖交易的行为，是对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外汇来源。

香港是消费中国产品的重要终站，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弥补了中国对其他地方的贸易差额。有学者指出，从 1950 年到 1980 年的 31 年，中国外贸出现赤字的只有 12 年，但若把对香港的出超差额拿掉，出现赤字的就有会 24 年(Jao 1983)。

中国的外汇，一度接近一半来自香港。晚至 1980 年，中国的香港贸易顺差达 44 亿美元，中资在港投资利润 8 亿多美元，港人在内地旅游 9 亿多美元、港人汇款 6 亿多美元，仍占中国总外汇收入 36.5%。

香港人也不要说这是对祖国的贡献。只应该说，内地供应食品与淡水给香港，是合情合理、互惠互利的双赢案例，而两边都不该把自己的行为说得太伟大，其实都是实际利益驱动的现实考虑。这才具体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只有二百万(50 年) 至五百万(80 年)人口的香港，会被认为是下金蛋的鸡。

但下金蛋的鸡还不能完全说明中国不收回殖民地香港的现实主义逻辑。现实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国家利益包括但也不是单指经济利益。

金尧如讲述 1951 年周恩来的指示：

□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份。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之前已决定不去解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

□ 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下略）」。

周恩来要利用香港做几件事。首先是为了突破美国的围堵，尽量分化对待英美。其次是以香港建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一是为反美，二是为了国内经济建设。为了这些‘对

我们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的'现实主义目的，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要维护资本主义殖民地的现状。

(抓英国人辫子的说法有点像美国套话说的：以狗尾巴来摇狗。当然，中国想用香港来摇松美英帝国主义同盟，美帝也想用香港来摇松中国。)

周恩来这番话不是人人都可以听的，是不公开的，更没有书面文件，而是在中央外事办香港工作会议上口头传达的，再直线下达香港工委即香港新华分社。金尧如说："当时廖承志规定，无论会上直接指示或会前会后的间接传达都不准作记录。但因我尚须在中共香港工委宣传委员会作报告，还要在新闻战线支部会上作传达。因此，经请示后，允许我用自己懂得的符号作下笔记，回香港作传达报告"。

为什么一个堂堂政府与执政党的会议，都不留文字记录。其中一个理由，大概是不想让真相为外人知道。因为，真正的政策，是不能完全对外说的，也与对外宣传所说的一套将是不一样的。

公开说的一套，可能是有所不说的，可能是避重就轻的，甚至可能是故意误导的。终极目的则从不明言。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特性。统一战线从定义上就是内外有别，内又分内围外围，越对外越有所隐瞞，以各种迂回策略，争取群众支持，以各种明暗手段，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Johnson 1984)。统一战线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集中表现。

本节想说明的是中共的香港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引申而言它对殖民地长期存在的解释必然是有所遮蔽甚至有所欺骗的，必然选用动听的修辞，必然是有内在矛盾的。

譬如说：对主权问题要略而不提，绝不能让人民知道"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

又不能告诉国人中国用香港这条狗尾去摇英国，制造英美矛盾。这种战术一向国人解释，全世界不也都知道了吗？起码做到别人只可以猜，不可以证实。

另外，维护英国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

中共头三十年在内地的宣传，描绘在资本主义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以反差内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虽然这类宣传主要是针对台湾人民的处境，但许多内地人免不了会连想到在香港(资本主义还加上英帝殖民地) 的同胞 -- 既然人民这么惨，为什么不去解放？台湾隔一个海峡，又有美军保护，尚且曾尝试攻打过去(虽然一时间是打不下的)，但为什么不先拿下香港？要转移各种质疑，该用什么避重就轻的说法？

上文引周恩来谈统一战线的两大目的，一是反美帝、二是帮助内地经济建设。

反美帝围堵在建政早期是重中之重大任务，到 70 年代初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才逐步逆转。但反美帝要靠香港，好像是言重了。况且，70 年代初中美关系好转，留着香港主要为了反美帝好像不太成立。

经济理由是很明显的，周恩来也公开说了要将香港成为有用的口岸，吸引外资，争取外汇。但光是说为了图经济利益、外汇也说不过去。没了香港这点外汇，中国会更困难一点，但不会撑不下去。中共在建政头四十多年，往往不以经济发展为硬道理，更有为了意识型态、权力斗争理由不惜牺牲经济。若说中国不收回殖民地是为了赚富有的殖民地的外汇，实在有点不堪。

统一战线的桥头堡论就是另一个这样的权宜的避重就轻说法，哪怕本来是重要但不是重中之重的理由。

香港被说成内地与海外华人联系、中国与国际联系的桥头堡，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瞭望台、气象台。香港桥头堡助内地走出去，也让世界通过这个窗口走进来。香港依然是个转口港。通过这个桥头堡，中国的统一战线可以开展。

这是留下资本主义殖民地的解释。这里，主权再次是隐而不提的。为了这么一个桥头堡，搁置了百年耻辱、殖民地伤痕、主权完整，这才叫现实主义。

中共在国际社会天天主张不可侵犯的主权，唯独在香港问题不强调主权。

建政头三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并不见得全是现实主义，但对香港的主导思想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



说中共的香港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有一个旁证：

中共有一段时期对全世界输出革命，支持亚非拉反资反殖，但就放在眼前的香港资本主义殖民地，为什么不先去反？中国对邻近地区更试过不惜直接武装介入，以策反当地政权，甚至到了 70、80 年代，中国的武装知青还在缅甸跟当地政府军作战。为什么不就近先在香港搞武装斗争？因为中共的香港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或反资反殖反帝。

这所以出现中苏交恶期间，苏联常常讥讽中国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合谋，剥削劳动人民，不去革自己大门口香港澳门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命 （Choi 2004）。

由此看来，中共的香港政策，与中共当时的对内对外宣称的意识形态不连贯，一定也在香港左派人士心中积累了不少问号，终于在 67 年香港左派趁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班子失势的时机，尝试做了一次言行一致的反资反殖起义。 (下略)

在笔者青少年的时期，也即从反右到文革，常看到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的文化前辈写文章说到爱国但不要爱党，或说真的爱国、爱中华文化，就不能爱这个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破坏中华文化。到今天，香港的爱国者很多是不爱共产党的，以至并不认同香港“左派”的。

那些明白统一战线政策的香港左派也没有要求港人爱国就要爱党，可能除了在两个“极左”高峰期：文革早期和 89 六四事件之后（六四后中共官方称香港为“反共基地”、“颠覆基地”。在当年国民党势力仍在、大多数港人反共、香港是美英同盟殖民地的年代，中共反而没有使用这些把香港笼统定性的对立性语言）。

除了文革高峰时期外，回归前香港左派的宣传口可说是忍辱负重。

负重是因为要维系大多数港人的工作很艰辛。本来部份港人已有恐共甚至反共之心，不过做统战者仍要努力争取大部份人，用的策略是爱国不用爱党，因为从大陆逃共出来的那一代南来港人，很多对香港也没有归属感，虽然对国共政权的认同有分歧，大多数仍是心系祖国的，至少是心系在大陆的家乡的。后来要去做本土成长的那几代人的工夫，就较艰巨了。

忍辱是因为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会被内地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抵消掉，导至很多香港人厌恶内地政权，连累及香港左派。大跃进期间，港人要寄糖、油这些基本粮食接济

内地亲友。文革期间，五花大绑的无头浮尸不断的顺珠江飘流到香港，你说香港人特别是那个时期成长的年轻一代看到后，对中国印象会好吗？加上 67 年的骚动，驱动了大部份求安定的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边并成为港人认同香港的历史转折点。好不容易文革过去，迎来改革开放，97 问题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渐靠近内地，又来一次六四惨案，硬生生把港人推开。可以说，从来不是港人没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而是港人对祖国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内地发生的负面事情所打击，认同感亦因而倒退。要人心回归，唯有寄望内地政府改善治理，今后不要再做损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下略）

但从中英谈判和平收回香港那时起，中国与英国高峰会谈时强调了主权和民族主义，宣传收回香港是"洗雪百年民族耻辱" 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可以说，这时候才正式高分贝用上主权主张和民族主义。

越是强调雪耻和主权，越让人好奇的想问：为什么之前 30 多年不说、不作为，突然到 80 年代义愤填膺起来。

正如上文所说，现实主义的中共香港政策成就了 49 年到 80 年代初的殖民地，正因为在周、陈、廖指挥下，对内地对香港都压下了针对香港的主权论述，宣扬同胞情感但不强调反殖的民族耻辱(除了 67 前后文革高峰期) 。

但中英谈判后，主权论述变得至关重要，而民族主义论述也试图加入影响决策，虽然后者的实际效应暂时还不算大。

当时中共的决策者强调主权必须坚持(邓小平说不能做李鸿章) ，但对抗性的民族主义除制造声浪外，实质上在回归决策中则被遏制。

金尧如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决策者不能跟着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走：

……所谓"洗雪英国殖民主义留在我国领土上的历史耻辱" ，更是缺乏历史辩证法的观点，也是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的自我嘲弄和否定，试问今天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止是英国殖民主义所建立，所遗留下来的吗？这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标志吗？为什么不洗雪这些百年民族耻辱的制度标志？却反而要保留它，继续实行，五十年不变呢？

本节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中共从 1930 年代以后，对香港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它对外的统一战线方针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取向。为了让殖民地与特区存在，中国公开的一套说法是难免有所遮蔽的、避重就轻的甚至欺骗的，并且要借助抒情修辞。

中英谈判开始让主权与民族主义上了桌，但在不逾越主权的框架下，现实主义仍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回归的安排与基本法就是主权主张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结合，赢取到各方的支持。民族主义也取得一些象征性胜利，但对回归后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影响不大。

但近年的情况或许会有变。中国崛起，对抗性的民族主义声浪一波大于一波，中国将怎样看待特区？中国思想界的话语趋势有变，新一轮的中国特区政策会不会继续偏离大家理解的一国两制？

5 天朝主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

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区，始于大清帝国的"中国"。在香港之前，澳门与有限度对外通商的广州才是清帝国的特区，后来更有五口通商、租界等等给强迫接受的特区。

不过，在响应欧洲人的全球化挑战而出现新的特区之前，清帝国已经到处都是特区，如藏区、蒙区。特区是大清国之为帝国的构成特质，也是统治的技术。根据一些中国学者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清帝国是由特区组成的，所谓以八旗制度统治满州，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

如是说，大清国凭侵略扩张得来的国土，没有不是特区的。

大清帝国的国土包括现在的中国但不仅是中国。现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国土大致继承大清的帝国疆域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继承。

清帝协议退位，帝国的疆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由反帝国主义的两个共和国接收吗？这之间的正当性恐怕不是自明的。

狗尾可以摇狗，例外反证常规，附件说明正文，特区的存在也是有助于看出“国家”的后天建构性质。

至少，从大清帝国来说，特区更像是解碼国体之匙。

现在部份中国学者在建构的中国天朝主义，根据的原型就是帝国形态的大清。(下略，本节全文见《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陈冠中 2011)

中国天朝主义（简称天朝主义或国朝主义）是我提出的一个标谶，是对现下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概称。现在很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帝国；二、当代中国党国体制是“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三、大清帝国是传统中国天朝式政治视野的极致表现，也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一个模版。我将这样一套话语称为中国天朝主义。

西方定义下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是并生概念，而西方政治概念正是中国天朝主义者明言要去排拒的，所以这里姑且不用帝国一说，改用非西方观念的天朝一词，不说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改称中国天朝主义。

天朝主义在取向上是维护“多元一体”的一国多制格局，并主张以香港为参考模版，作为中国以后治疆拓边和处置周边国家的统治实验田。天朝主义并不反对“特区”和区域族群暂时性的“自治”（在“改土归流”式被逼放弃自决变成中国行省之前）。但天朝主义同时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国家认同、党在法之上、中华文明教化，视特区的存在为中央审时夺势、因地制宜的统治术，而不是以法律协议（如基本法）或地方人民的自治权利来看待一国多制。特区自治的宪法地位受贬抑，一国与多制之间的猜疑也更难以消解。

香港特区基本法是带有自由主义法治及代议民主宪政性质的，是尊重个人权利的，而天朝主义恰恰与自由主义法治及代议民主宪政精神最为抵触，更在内涵里没有个人权利的考虑。

天朝主义的论述架构，还倾向将特区“去政治化”，视特区为实现中央统治术的被动对象，最好是一个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区，至少不要加大政治化，这与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区现实有着认知的落差，削弱了这个论述对香港现状的解释或开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误判。香港过去的六十多年，是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中，也即是个人权益、维权意识、公民社会、公共参与、身份凝聚、港人主体性、社会自主性等“政治”特质逐渐突显的时

代。天朝主义的思路比较不能处理特区早已成形的主体性，甚至对特区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抱着怀疑态度。

6 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与香港的主体书写

香港是在中国主权下、一国两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国家。在经济上，香港跟大陆分不开。两地社会、文化关系千丝万缕。港人绝大部份与大陆人同文同种，香港华人很大部份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能不亲中吗(陈冠中 2008)？

当然，这里说的是香港的政府不能不“亲中”，不管谁做特首都得“亲中”。至于民间组织与个别人士，香港是个言论、结社、信仰自由的法治地方，亲不亲中，没有强制性。

同样的，香港似不可能不嵌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内。至于是那一种性质的资本主义，或在中国崛起、港人权利与福利意识高涨、新自由主义威力稍减的今天，这一剂难免带有福利主义成份及香港特色的地产金融霸权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鸡尾酒应如何调制，是颇可以争议的。

又或者说基本法，现在香港各主流政治派别不管如何针锋相对，或中方如何释法，都没有超出基本法的范围，大家还是按基本法来争执、说事、做事。香港基本法是邓小平认同的自主“创造性杰作”。基本法是如何众悖并存，是如何矛盾统一，此处不再细论(陈冠中 2008)，只可以说是中港那个历史际遇期的特产，正如历史上其它著名的宪法或基本法，都充满历史烙印，换了个时期才去撰写内涵恐怕会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虽然说任何法都可以改，但是更改基本法的先例一开，将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果难料。

另外，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及渐进民主普选，虽有争议但暂时并没有脱轨。

这些都是香港重要的大框架，不易突破的底线，有效行为的限制者。

在这些大框架里，各方都可以找出弹性的行为空间，建构解释香港的论述。

(至于香港这边反资本主义的极端左翼、轻视形式民主的激进民主与拒中的自决主张，及内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反特区的网上言论，则往往鼓吹超越这些框架。)

同时，中国政府本身的行为也不是不受制约的，并不是事事可以任意而为的。经济增长的压力、维稳的诉求、公民的期望都在影响着中国政府的行为。全球经济交流、跨国协议、国际互动、外交规范，不管喜欢如否，都不但参与打造中国对外的行为，更已经让主权者在国内的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府仍是重要的权力中心但所有主权者都不可能完全在国土内不受某种程度的约束。

作为主权国下的特区，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不易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有内置的法制与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这也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而且必须珍惜这个空间，在刚硬的框架内寻求最大弹性，但是不能低估主权的刚性、国家的政治能量、市民核心价值的分化及部份港人真诚的中华情结。

要发挥这个政治自主空间，也等于要更深入理解主权国在看待这个非一般的特区时候，主权国本身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或政策选项，而不是把主权国排挤在外。

丰满的香港论述要兼顾全球化、主权国家、特区和本土四个维度，既离不开带主体性的本土论述，也缺不了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论述和主权国家论述。香港本土论述其实不能只看本土，还得考虑全球化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中国)和主权国内部特区的关联性。(下略)

香港是经常“被论述”的，香港人也往往借外来的论述来言说自己，将别人的舌头装在自己的喉咙里，而不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舌头（Chan 2007），这是做香港论述者必须有所警省的。不过，从事本土书写者也要有另一种自觉，即香港人的主体性并非自给自足的，香港本土成份多元，本身是有歧义的，背后的价值观是不容易调和的。引申而言，香港政治的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将会持续下去。

作为结语，本文作出关于香港论述的一个呼唤，一个迫切的反霸权呼唤。处于这个部份华文思想界在积极建构新宏大中国论述如天朝主义的时候，光靠主位出发的香港本土论述、去殖民论述及微观书写似不足以平衡新的中国论述霸权。虽然不少香港书写者对大叙事都有直觉与知识论上的怀疑，并且很多人都在试图寻觅一种难以套路化的辩证话语，即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增权本地人的、包容差异与他者的话语，但我们也知道一个地方在自己的宏大论述缺位的

情况下，它就会“被论述”、被别人的口水淹没了。然而我们也不愿意为了需要大叙事就随便拼凑一套大叙事。作为当前的书写策略，对治加诸香港的宏大论述，本文只尝试挑起对等的学理上的宏大辩论。

*全文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节选修订于 2012 年 2 月。

参考文献

郑宏泰、黄绍伦，身份认同：台、港、澳的比较，《当代中国研究》2008 第二期
雷鼎鸣,未来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信报》2010-8-2
陈志武，香港繁荣之路，《人民日报》2007-6-29
刘兆佳，“十二五”深化粤港澳合作 港应抓住机遇，《人民网》2010-11-2
强世功，中国香港 --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三联 2010
罗永生，导论，罗永生编，谁的城市？香港：牛津 1997
孔诰烽，从殖民史寻找未来 -- 香港社会进步与全球战略价值的殖民地根源，《本土论述》2009
夏铸九，都市抵抗、市民认同、以及城市的营造 -- 珠三角全球都会区域中香港的都市动员，《本土论述》2009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第二版 2006
陈冠中，下一个十年，香港：牛津 2008
陈冠中，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洪范网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pple\My Documents\writing\completed versions\2011 writing file\chinese dynastism and hk\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mht》， 2011
黎安国，对殖民时期社会福利思想建构的反思，文思慧、梁美仪编，思行交汇点：哲学在香港，香港：青文书屋 1997
金尧如，香江五十年忆往，香港：金尧如纪念基金 2005
林洁珍、廖柏伟，移民与香港经济, 香港：香港商务 1998
罗永生，导读：解殖与（后）殖民研究，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 2004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 1995
Chan, Koonchung, Hong Kong Vicera, Postcolonial Studies, Melbourne, Volume 10 Number 4 2007
Cheung, Anthony, Power of Idea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2010-11-16
Choi, Alex H.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s Industrial Upgrading: A Lost Opportunity, in Law Kam-yee and Lee Kim-ming（ed.）,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in Non-Economic Perspectiv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2004
Choi, Wai Kit, (Post)coloniality as a Chinese State of Excep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Melbourne, Volume 10 Number 4 2007
Fung, Chi-ming, Labour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2003



Jao, Y.C., Hong Kong's Role in Financ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A.J. Youngson (e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conomic Nexus, Hong Kong: Oxford 1983

Johnson. Chalmer, The Mousetrapping of Hong Kong, the Thirteen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1984

Lee, O.F.L.,Postscript: Hong Kong, a Reflective Review, Postcolonial Studies, Melbourne,, Volume 10 Number 42007

Ong, Aihwa,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06

Pepper, Suzanne,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Shen, Wenhua, Redefining the Chines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Wang Go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Sing 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Support, and the Endurance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970s-1980s), in Sing Ming (ed.),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sang, Shu-ki,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The China Review, Hong Kong: Fall 2007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2004

(本文为作者赐稿)

【返回目录】

10-10 孔诰烽：统一中的彷徨，走出殖民时代的香港中国观

“无论是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憧憬，还是不断与大陆的恶性比较，其实都源自由冷战遗留在我们心中的，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独立个体之心态。解除这一生硬的文化界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挥之不去的心魔。”

时移世易

80 年代回大陆旅行，常常可看到港客向当地旅馆或商店的服务员破口大骂，骂他们懒、骂他们没礼貌、骂他们甚么都不懂。被骂的通常无言以对。

在最近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中，记者随一名港客到深圳购物，将买卖过程录像下来。当中港客与售货员议价：阿妹，算便宜一点罢，我给的是港币！售货员的回应斩钉截铁：港币又怎么样，现在 100 元港币只兑 105、106 人民币，110 也不到！后来一位受访店员说：你们香港经济好像真的很差，港客现在买东西一定杀价。

小时侯回母亲的故乡广州过新年或放暑假，爱上了越秀山下的老平房与小巷子，也喜欢那边的朴素悠闲与邻里间的人情味。对于空气中或浓或淡的柴火气味，更一直是记忆犹新。这一切都与香港街道的混乱与无情很不一样。

到了今天，外公的旧房子已不复存在，广州的街头变得像香港一样混乱与无情。长大后读到一篇有关广东改革前后对比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一直向往的那个老广州，原来叫极左派经营下的一潭死水。

香港的新移民一直受到歧视。学校里语带乡音者更是常常成为被孤立或嘲笑的对象。影艺圈中有新移民背景者，都努力掩盖自己的大陆背景。

现在，跟讲国语的友人逛街，店员总会热心地讲国语，国语仿乎成了购买力的象征。也不知道从那时开始，有大陆背景的艺人开始不再掩藏自己的来历。黎明可以毫不尴尬地高唱 I

was born in Beijing，后来更在两套叫好叫座的电影中演新移民。被认为最能体现香港意识的王家卫，亦在花样年华中暗暗表达出自己对本地小上海的乡愁。

但一次居港权争论，却又证明了我们心底里原来仍是那么瞧不起大陆人。

香港人对大陆的理解与想象，一直都错综复杂，一直都爱恨交缠。回归之后，中国成了香港的老板，大陆的经济比香港更欣欣向荣。但港人的剩余自豪感和港人看不起大陆人的心态，却仍然强烈。

今天的港人忽然发现大陆发展的势头比香港好，天天担心被上海等大陆城市追上。政府高官与商界则天天盘算着把大陆的人流物流和资金吸引来港。当我们急着要挤上大陆的高速经济列车之时，我们又担心与大陆进一步整合会带来贪污、传染病和罪犯。今天香港人的大陆观，同时体现了自卑与傲慢、赞叹与鄙视。这一矛盾的意识，并非单是当下环境一时造成的结果，而更是香港漫长殖民历史的沉淀物。

要解开这个香港特有的后殖民情结，我们便先要回归历史。

二战前的香港与大陆：三城故事

由 19 世纪香港开埠到 1949 年之间，一个固定的香港人身份认同从未存在。无论从商业经营、革命运动、文化发展抑或人口流动的角度看，战前的香港、广州、上海与其他华人聚居的海外城市都是一个紧密网络的一部分。居于香港的华人，或会把自己看成是广府人、潮州人或客家人，但绝不会把自己视作有别于国内华人和海外华人的特有族群。

鸦片战争后，香港与上海的崛起令原来在清朝一口通商下一枝独秀的广州失色，香港与上海成了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但这一城市间的竞争，并没有带来今天那种广州人、香港人与上海人间互比长短的情况——当年在大上海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很多都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广东商人。

当时的文人与政治家（如王韬、康有为、孙中山及后来的左翼人士），也正是游走于这一跨都市空间中。无论他们在那一个城市活动，心里牵挂着的，都是中国的前途。



香港在文化上脱离中国大陆，并产生出一个有别于中国的本位主义身份认同，是 49 年后东西方冷战的结果。

冷战下的香港与大陆：恐惧与憧憬

二战后大量大陆难民来港定居，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视香港为家，催生香港意识的历程，恐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特别的是，从 1949 年到 1978 年，香港与大陆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学校教科书鲜会提及大陆的事情。土生土长新一代的香港人要理解大陆，便只有透过父母的口述历史（通常都夹杂对共产党的漫骂）和来自左面或右面不尽不实的报道。一个以香港为本位，有别于一般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是香港与大陆多年隔绝的结果。

大陆在地理上与血缘上离我们很近，但因冷战而做成的社会文化距离又如此巨大。大家都感觉到，大陆与香港是两个彻底不同的体系。当时的大陆对于香港人，就如登月计划前的月亮对于人类一样：每晚举头都轻易看到，却又遥不可及，因此成了无限恐惧与幻想的对象。

当时香港市民对共产中国的恐惧，不难理解。本地反共文人对中共的不停攻击、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消息、文革时从珠江口飘进香港水域的五花大绑尸体、67 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斗争后期的恐怖主义与动乱平息后港英政府与右派动员起的反共情绪，都令很多港人相信深圳河以北存在着一头时刻想把香港的繁荣生活吞噬的巨兽。

但若我们回顾 60、70 年代的年青人刊物，便不难发现，其实当时的年青人很多都对大陆充满憧憬。他们的憧憬，有些是基于朴素的乡土情怀，有些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制度的向往。若我们追塑一下今天香港 50 多岁中年精英（不只是在左派阵营，还包括政府高官、名嘴才子、文化人、著名学者和民主派人士）的过去，便会发现他们不少都在年青时或多或少经历过认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对于当时这些热血青年来说，腐化和暴力的殖民体制（当时公务员高高在上，中文受歧视，廉政公署还未上轨道，皇家警察与烂仔无异，消防员更是有水放水，无水散水）才是吃人

的恶魔。能驱走殖民地不公义的，正是深圳河以北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这些年青人眼中，67 年的反英抗暴，乃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举。

恐惧与憧憬，都是比较极端的情绪。这两种情绪的基础，正是当时中国与香港在社会体制与价值上的极端差异。

后冷战的香港与大陆：人比人比死人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开始缓和，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以迂回的方式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奉为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邓更表示要在大陆多建几个香港。

香港与大陆在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上的绝对差异减退，港人对大陆的极端恐惧与憧憬，也就失去了一个主要基础。大陆开始弃马列而拜金银，消融了不少市侩港人对中国的恐惧。虽然在 80 年代，不少港人仍担心大陆的市场化发展会有反复，中共会走回头路；但这些恐惧最后都随改革的深化而烟消云散。市场改革与大陆新领导层对四人帮时代各种谎言的揭露，则笃破了不少理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美梦。他们当中，虽有部分在 80、90 年代仍活跃于民主运动与各种社会运动当中（不论是本地的运动还是支缓国内的运动），或成为入世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大部分都在理想幻灭后，融进主流社会之中，成为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在各种公共议题中消失。

香港与大陆的绝对差异在减少，但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以香港为本位的身份认同却仍然坚固，港人仍倾向视大陆为异邦。但香港与大陆的我与他之间，再不存在绝对的差异。我与他，终于可被放在同一标尺上量度。而财富和繁荣，自然成了这一标尺。

80、90 年代，正是香港金融地产泡沫扩张的年代，习惯了炒股炒楼不劳而获、金铂捞饭和红酒混七喜的港人见到国内同胞急忙赚钱却不得其法的窝囊相，以及沙尘滚滚、污糟邋遢的大陆城市，当然嗤之以鼻。于是大陆被香港比了下去。于是港人可以在内地肆无忌讳地骂当地人，一些本地知识分子也可以自恋地宣示香港是中国现代性的前锋。

97 年，我们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时移势易、重心转移。我讲的不是 97 回归，而是 97 金融风暴后香港（及其他亚洲小龙）的陷落，与中国经济的奇峰突出。

回归以后，香港与大陆虽已同属一国，但大部分港人，仍摆脱不了视大陆为邻邦，并时刻与之相比较的习惯。

在金融风暴后，我们再将香港与大陆放在同一标尺上量度的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城市的生活水平还远不及香港，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大陆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香港像泄气气球般德颓势。再而是大陆的领导人越来越专业体面（从朱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香港在回归后的领导却越来越庸碌无能，令我们蒙羞。

更糟糕的是，很多原本令港人感到自豪的制度——如新闻自由、法治精神、与有效率的公务员系统——在回归后不断被一些不能与大陆一起与时俱进的本地爱国人士破坏。

这一矛盾的情况，令我们在拿自己跟大陆作比较时，产生既自大、又自卑，既看不起别人、又看不起自己的复杂心情。

挥之不去的后殖民情结？

无论是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憧憬，还是不断与大陆的恶性比较，其实都源自由冷战遗留在我们心中的，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独立个体之心态。解除这一生硬的文化界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挥之不去的心魔。

解构中港之间在身份认同上的界限，并不等于要解构一国中的两制。20 世纪初中港的模糊文化界线与鲜明制度界线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地，正是这一中港于统一（文化认同上）中见多元（政经制度上）的格局，为中国带来了推动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化发展、商业繁荣与政治转型之巨大能量。

我们在殖民时代辛苦建立的特有生活方式，如新闻自由、法治、专业精神等，不应只被看作香港在与其他中国城市竞争时的优势，亦应被视为香港能贡献于中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今天不少香港商人已像 100 多年前以香港为基地的广东商人一样，在上海与北京等地大展拳脚。大珠三角地区的整合，已成了香港未来发展的长远策略。自中国改革以来，香港再次成为大陆批判知识人吸收养分与新鲜空气的窗口；不少在香港有相近志向者，亦开始了在大陆开展舞台。

香港的后殖民情结，并非真的挥之不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走出狭隘的本位主义和对殖民统治的眷恋，积极响应新的时代。

（孔诰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原文载中文大学学生报（编）：《中大四十年》（香港：中大学生报，二○○四年）；另收录于孔诰烽《浮夸中华：大国雄起与香港主体的前世今生》（圆桌精英出版社， 2012 年））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励轩：台湾佛教团体缓和族群冲突？

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族群冲突激烈上演时，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台湾——可以发现一个与不少亚洲国家迥异的现象，虽然台湾当局曾经在岛内实施了不平等的政治政策，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本省人屈从于占人口少数的外省人，从而制造了一个族群鸿沟（ethnic cleavage）。但在民主转型中，先前受压制的群体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机会去报复后者，因此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严重的族群冲突。而在亚洲其它一些国家，诸如印度、巴基斯坦（东、西巴分裂前）、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由族群鸿沟引发的族群冲突却损害着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甚至导致部分国家分裂。为什么同样作为亚洲一员的台湾能够在转型中避免这一悲剧？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Andre Laliberte** 在《民主转型与文化多元性：台湾的佛教团体和认同构建》一文中，从台湾佛教团体在民主转型中对认同构建发挥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结合翻译与改写的手法，将 Laliberte 教授原文中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结论呈现给中国读者。

回顾台湾的族群认同变化及台当局的民族/族群认同构建政策

在台湾的族群认同声明（ethnic identity claim）会根据岛内的政治环境而发生变化，族群鸿沟并不总是和政治分界线(political division)重叠。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虽然岛上最明显的鸿沟是汉族和原住民的差别，但他们之间的族群鸿沟并不代表当今最政治性的分界线。2100 万人口中占 1.5%的原住民（1995 年数据）在民主化进程中是重要的因素，但对民主巩固的最大危险却来自主体族群——汉族内部的族群声明。

在 1945 年之前，汉人中的族群鸿沟主要被认为存在于福建人后裔与客家人之间。(Shepherd 1999:128-29)在此之后，这一族群划分被另一种形式所取代，即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移民与早已在台湾定居的汉人。1947 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本地人心中直接制造了这一新的族群分裂，并在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到强化。1949 年，随国民



党败退台湾而引发的移民潮，促使之前就生活在台湾的汉人把自己定义为“本省人”，同时把那些来自大陆的其他中国人称为“外省人”。后者往往反对“外省人”这一命名，而更喜欢称自己为“中国人”。而许多“本省人”则并不接受“中国人”这一命名，他们中的一些人称自己为“本地人”，用以强调他们并不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用以贬低其他族群鸿沟的存在（诸如原住民与具有中国祖先的台湾人之间的鸿沟，或者福建闽南人与客家人之间的鸿沟）。

1945 年到 1987 年戒严法废除期间的台湾当局并不鼓励这一认同变化。相反，当时的蒋介石与蒋经国当局采用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族群认同构建政策。当局努力通过使用国语作为教学语言来灌输中华民族认同。在高中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课中，强调有关中国大陆而非本岛的知识。甚至直到戒严法结束时，媒体也不能使用台语及客家话。对“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禁忌。发展到最后，占台湾人口不超过 15%的外省人控制了“立法院”超过一半的议席。他们也拥有一半以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政府”职位，并占到了“国军”将领中的 84%。（1987 年数据，Tien 1989:36-39）

然而，从 1970 年代开始，这种少数人统治的模式遭遇到了挑战：党外人士反对国民党。蒋经国意识到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无法长久，开始采用一些措施来应对本省人的不满，这些措施包括吸纳大量的本省人进入国民党机构，并在 1986 年使提倡本省人利益的反对派——民进党合法化。(Tien 1989)台湾当局历经 40 年的把所有台湾人吸收进泛中华共同体（pan-Chinese community）的政策至此遭到了失败。

该政策到了李登辉时代遭遇了更大的削弱。国民党内的改良派试图使用二元战略即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和解的国内政策来扩大它的支持度并增强它的合法性。李登辉所采用的外交政策机融合了外省人的反共倾向与本省人的自决渴望。李登辉的和解政策——生动体现在他对“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赎罪——试图减轻台湾内部族群鸿沟的政治关联性。李登辉使用的话语中，在要提到“中国”的地方，也用“台湾”来代替。这一新战略意图通过定义台湾政治体制的实质而非族裔性来构建一个台湾人认同。(Wachman 1994)

当然，这一新战略并不意味着台湾政治家绝不使用族裔性作为选举筹码。事实上李登辉自己，自从下台后，一直鼓励一个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的形成，而该政党强调

本省人的利益。不过，诉诸族裔认同虽然可以吸引部分选民，但即使是在陈水扁治下的台湾，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sim）还是主流。

佛教团体与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也称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一概念认为民族是自认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集合体，他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且分享这些政治权利，他们也忠诚于相似的政治程序。 与此概念相对的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这一概念认为民族是根据族裔性来定义的，是一群拥有共同传承的人们，这些传承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及共同的族裔祖先。 从二者的定义来看，可以清楚的发现，公民民族主义更为包容，有利于一个和谐多族群社会的构建，而族裔民族主义则更为排他，容易导致族群边界的固化，成为引发更多族群冲突的一个因素。

源自国外的台湾宗教团体，比如基督教长老会、伊斯兰巴哈教派比较明显的支持公民民族主义，因为与族裔民族主义靠得太近，不管是偏向外省人还是本省人，都不利于他们的传教活动。（Rubinstein 1991; Stainton 1999）而一些源自大陆的教派，也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超越族裔壁垒。诸如一贯道，他们帮助支持国民党台湾化的政客去赢得地方选举。(Jordan and Overmyer 1986; Bosco 1994)

但是台湾的佛教团体，却并没有直接支持公民民族主义，甚至不愿参与政治。在戒严时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几个台湾佛教领袖杜绝他们的神职人员支持台湾自决的政党和社会活动，以致很多台湾人认为佛教是一个跟本地现实无关的宗教。（Jiang 1996:454）进一步的，作为台湾最大的宗教团体，拥有占台湾总人口 22.8%的信徒（ROC 1997：:466），佛教团体在台湾民主转型中完全有机会参与政治，但他们却极少干预政治。与长老会不同，佛教团体绝不参加公民组织，这些公民组织在戒严时期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尊重人权。即使有佛教界领袖罕有的参与某一政治活动，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其他领袖的支持，比如作为两大佛教团体之一的佛光山领袖星云大师曾公开支持一位具有佛教背景的政治人物陈履安参加 1996 年总统大选，但是另一大佛教团体慈济的领袖证严法师拒绝支持陈履安。不仅如此，当有政府背景的台湾佛教协会在 1996 年提出一个关于佛教的

法案时，也未获得绝大多数佛教团体的赞成。总而言之，台湾的佛教团体总体上不仅拒绝支持政治反对派，也避免给人留下支持政府的印象。

台湾的佛教领袖诸如星云大师传播佛法的目标并没有直接培育出公民民族主义，然而确实有助于形成跨越族裔性差别的认同和规范。直到 1980 年代，相比受族裔性考量限制的国民党，佛光山在台湾和海外可以触及到最庞大的潜在选民。星云意识到在外省人中可用人才的较为有限，为了保证他扩张佛光山的计划，他多年来采用各种有效措施招募、培训、晋升本省人弟子到管理层。以致最后，作为最高组织机构——佛光山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十三位常任委员，大多数都是台湾本省人。（Fu 1997）为了寻求世俗佛教徒的支持，星云在 1990 年所创立了国际佛光会，其最重要的分支中华总会，由一位具有台湾客家人背景的佛教徒、国民党高官吴伯雄担任主席。佛光山属寺的分布也体现了星云要与全台湾社会沟通的目标。佛光山另一位高僧慈惠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用闽南话——大多数台湾本省人的母语——去传法，甚至是在戒严法废除前，彼时政府一直在学校禁止用闽南话教学。（Fu 1997）虽然佛光山僧侣们的活动并没有通过直接的政治参与促进公民民族主义，但却有助于克服族群壁垒。

除了星云大师创立的佛光山，台湾另一个重要的佛教团体是慈济基金会，由女尼证严法师创立并领导。证严法师与星云大师一样，是太虚老和尚“人间佛教”的信奉者，但她是本省人，她也用闽南话发表演讲。这往往使人误以为她支持本省人族裔民族主义。再考虑到她在 1996 年总统选举时拒绝支持一位外省人佛教徒陈履安，从而加重了人们对她的怀疑。其实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佛光山的本省人成员也支持陈履安，而不少台湾的外省人佛教领袖则不支持他。证严法师的许多追随者已经代她表达了为什么不愿意支持陈履安：陈尽管具备佛学知识，但可能无助于“国家”。证严法师拒绝支持这位外省人佛教徒或者在其它选举场合中拒绝支持本省人，仅仅反映了她一贯采用的对政治冷漠的态度。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尽管并不直接促进族群包容的民主社会，却与维护世俗的族群宽容“国家”的原则相一致，这一原则在族群多元化社会里，是民主政体的基石。与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不同，证严法师甚至对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议题避而远之，她总是在回避台湾人自决论的话题，她也从不在基于公民或族裔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发表非此即彼的观点，她仅仅表示她主要关心“国家安全”。

然而，慈济基金会对政治的冷淡，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远离人间。证严法师虽然不参与政治，却与岛内多位政治人物保持良好关系，比如本省人吴伯雄、林洋港、李登辉、前民进党领导人许信良、陈水扁，以及从蒋经国到宋楚瑜的大量外省人国民党高官。慈济的高僧们与各党派、各族群政治家们多年的紧密接触中孕育出了族群包容的原则。这种包容及对争议的远离甚至扩展到了宗教事务领域，例如，在 1996 年，慈济也拒绝干预有关台湾佛教协会所提宗教议案的争论。因为不涉足争吵，慈济就不可能被怀疑是鼓励社区分裂。

总之，台湾的佛教团体以一种更不易显见的方式促进着公民民族主义。首先，佛教慈悲及无私的价值观迫使它们的追随者超越狭隘的家庭、宗族和族裔性的限制。其次，两大佛教团体的领导人采用非族源（ethnic origin）的标准招募、晋升它们的成员。进一步的，台湾重要的佛教团体具备“全国”视野：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活动局限到本岛的一个族群地区。最后，星云、证严及其他岛内高僧所信奉的“人间佛教”理念是一种普世的概念：它强调社会活动导向，并且鼓励佛教徒关爱他人，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僧团（Zhao 1998），也不管他们的族源或他们对台湾地位的立场。

全球化与台湾佛教团体

很多分析者把当代社会中宗教与地方族群认同的复兴看作是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中国家地位急剧下降的重要象征（Robertson 1991）。全球化的加速则被认为使民族构建的过程更为复杂。特别在那些公民民族认同没有被很好定义的社会中，全球化对公民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负面影响。然而，台湾的例子却表面，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宗教认同的复兴并不总是对公民民族主义认同构建起到负面作用。

1979 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台湾当局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民间组织及宗教团体的非正式外交，以获取国际承认与参与。而台湾融入全球经济等因素也影响了其宗教团体的发展（Weller 2000）。这种融合有助于台湾宗教团体的国际化并把国外团体吸引到了岛内。通过优于正式国际组织拥有的网络，各种团体促使台湾融入到国际社会。台湾经济的国际化也大大帮助了台湾人的团体，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扩张的机会。特别是许多台湾的宗教信仰通过海外中国人社区进行他们的活动，而这给“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跟全球经济政



治共同体接触的机会。这一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源自北美的基督教团体，一贯道也从亚洲扩散到了美洲、西欧、澳大利亚和南非。甚至更小的天师道也把分支开到了洛杉矶。

台湾宗教团体从国际化中获益，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已经影响他们塑造台湾民主化进程以及构建公民民族主义的能力。特别是，台湾的基督教，因其跨国的联系，相比于其它华人宗教有更大的优势。和没有重要跨国存在的宗教组织不同，台湾的基督教神父与牧师敢于更直率的批评"政府"。因为历届"中华民国"都严重依赖美国，压制基督教团体则容易导致台湾疏远美国公众，不利于获取国外的支持。

台湾的佛教团体诸如佛光山也从最近二十年台湾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仅仅在国际佛光会成立三年后，它的下属机构就暴增，追随者达到了 100 万，成为世界第四大非政府组织（Fu 1996:377/279）。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西来寺的国际佛光会现在在 30 个国家拥有 100 个分支，光在台湾就有 342 个次级分支（Guoji Foguanghui Zhonghua Zonghui 1995:45）。作为这一组织的首脑，星云大师卓有远见的投身于全球普世教会的布道。他鼓励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及藏传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他也积极从事与基督徒、穆斯林的跨宗教对话。星云在南韩、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与他们的会晤使台湾作为一个进步、宽容"国家"的形象凸显出来。因此，迫切想让海外对台湾产生同情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欢迎这些会晤。毫无疑问，星云的宗教活动符合"中华民国政府"的利益，因为它们为正处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合法性问题进行竞争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加分的机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佛光山为台湾社会的包容性向国际舞台做了一个诠释，这无疑有助于台湾本岛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构建。

虽然如此，慈济基金会的行为则表明一个宽容的态度并不足以产生公民民族主义。慈济，和佛光山一样，也利用 1990 年代政治民主化的气候以及台湾向世界经济的开放去"中华民国"外扩展它的慈善工作。按照这一路子，极大有助于提高"中华民国"的声誉。和星云一样，证严也忽略认同与社区的疆界。即使有时是为了回应"中华民国政府"的特殊要求，慈济经济会的慈善活动也会为人们伸出援手，而不考虑他们的背景。比如 1992 年，应"蒙藏委员会"请求，慈济派遣了一个调查团并为尼泊尔洪灾中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不过，由于担心他们的行动受到关注，慈济志愿者有时必须保持一种低调形象并避免介入公众生活。



特别是，为中国大陆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救济，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很多台湾人却不会这么看，后者正怨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施加的战争威胁。纵使慈济志愿者觉得他们超越族裔性与国籍壁垒的活动是对的，但有时他们的成功还要依赖宣传的缺失。而宣传，某种程度是发展公民民族主义必须的。

结论

当面对人类的苦难问题时，为台湾佛教团体工作的俗人志愿者采用坚定的行动主义对策。然而，除了少部分人外，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扩展为正式的政治参与（除了作为投票者）。这种实用主义避开了对当局的批评，也使民主化减速。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似乎以间接方式正面影响民主巩固。直到最近，由于它夺命的资本主义，台湾社会在海外还被指责为“贪婪之岛”，这阻碍了公民意识的发展，也使民主巩固变得更不确定。台湾佛教团体的行为则大大有助于克服这些缺点。其成员对广大社会真正无私的关心使得整个台湾出现了一个公民群体，他们的考虑超越了家庭、宗族、本土共同体和族裔性的疆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间接的促成了公民民族主义：目前，通过不考虑族裔认同而招募成员并对需要的人们伸手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流派，就起本身而论，有助于创建一个支持朝包容型民主社会相对平和过渡的社会氛围。台湾在全球经济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华民国”独特的战略和外交背景，通过提供这些团体以独一无二的扩张机会，从而影响了它们，而这些机会是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团体是不具备的。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http://cnpolitics.org/）

【返回目录】

【FMN 新闻专栏】

本周重庆新闻

2 月 2 日一则有关**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离职的消息迅速传播，不过随后官方发消息指王立军仍在任，但是分管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从主管公安、维稳等工作转变为了文教工作。同时重庆官方评价王立军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口碑好，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

新闻：http://cn.fmnnow.com/?p=1827

http://fmn.cc/wWdCmu

网络传言**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馆寻求避难，2 月 8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微博发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新闻：http://cn.fmnnow.com/?p=1933

李庄前助手 2 月 7 日起诉**重庆**警方涉嫌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强迫其出具不同意为李庄案出庭作证的证明。李庄案后续发展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xyOEYF

而在 2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证实王立军确实曾经要求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进行会面，他也确实到达领馆，但随后“他自愿离开了领事馆”。发言人不愿谈论和难民身份或者避难等问题，也表示美方后来和王立军没任何联系。



新闻：http://cn.fmnnow.com/?p=1953

本周西藏新闻

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 2 月 1 日对驻寺干部作出批示，要他们“加强寺庙管理、教育和服务，把寺庙管和谐、管稳定”，并着重强调了爱国僧尼要维护西藏稳定。

新闻：http://fmn.cc/zLYwvi

近日，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西藏自治区监察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严肃纪律，加强维稳工作监督检查。通知强调在维稳方面出现问题者，擅离职守、临阵退缩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再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

新闻：http://fmn.cc/wplbZq

西藏近日要求官员若在维稳工作上擅离职守将被就地免职，而在此前的 1 月份拉萨就有 1 名官员因维稳值班离开岗位被就地免职。西藏政府因此再次强调“维稳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维稳形势依然严峻”，要求各级部门不得松懈。

新闻：http://fmn.cc/wDIRiX

藏历新年即将来临，2 月 7 日**西藏**各部门召开会议，再次部署驻村、联防安保等维稳工作，

干部职工称要“保证大事中事小事都不出”。

新闻：http://fmn.cc/xFkN9g





中俄否决叙利亚决议草案

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当地时间 2 月 4 日投反对票否决了关于**叙利亚**决议草案，遭到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的谴责，而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国投反对票是对叙利亚人民负责，且“体现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

新闻：http://fmn.cc/zwpobl

http://fmn.cc/wfoS8d

2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主要回应了有关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草案的问题，自认立场公正，且不接受美国和欧盟的指责。称是因各方对决议草案分歧很大，为使叙利亚人民免遭暴力冲突和战火，而投下的反对票。

新闻：http://fmn.cc/wxu6XE

中国驻**利比亚**使馆 2 月 6 日遭到抗议者的攻击，玻璃被砸多处，人们抗议中国在联合国叙利亚决议草案的表决中投反对票。同时俄罗斯的使馆也遭到了抗议。

新闻：http://fmn.cc/yLFcuB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 2 月 8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再度回应有关叙利亚问题，称英方对中俄否决涉叙决议草案的指责是别有用心，还指“任何挑拨中阿关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新闻：http://fmn.cc/AcdmdW



中国灾情

目前中国多个沿海地区遭遇海冰的危害，**辽宁**气象部门 6 日发布称，辽东湾和黄海北部海冰已超过 1 万 8 千平方公里，较去年扩大三千多平方公里。而前几日，**山东烟台**一个 5 千亩的养殖区一夜间被冰封，大量鱼虾缺氧死亡。

新闻：http://fmn.cc/AmLbVK

http://fmn.cc/zdCdvG

云南昆明旱情严峻已致近 48 万人饮水困难，89 座水库干涸，城乡供水和农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而北方的**黑龙江**自去年入秋以来降水就减少，目前旱田受旱面积达 6064 万亩。

新闻：http://fmn.cc/A7eqVO

http://fmn.cc/w9vWrZ

2 月 3 日**镇江**市区发生的自来水异味事件，并引发瓶装水的抢购现象。镇江市政府 2 月 7 日发通告确认水源被苯酚污染，且一艘曾停靠镇江的韩国籍船舶有重大嫌疑，当地仍正在调查取证中。

新闻：http://fmn.cc/w7m8hM

中国长江电力公司统计显示，2011 年**长江**上游流域降水总量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少，降雨时空分布极度不均，是历史上罕见的来水特枯年份。



新闻：http://fmn.cc/w6erLK

微博实名制

中国对于**微博**的管理将加强，工信部官员 2 月 7 日表示这是“新时期国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迫切要求”。同时北京市网管办透露 3 月 16 日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而只能进行浏览。

新闻：http://fmn.cc/x3AO0E

http://fmn.cc/yVGdCT

近日有消息指 3 月 16 日之后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门户网站微博若未**实名认证**用户将不能发言，且有消息人士指四大微博都上线了实名验证系统，并和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对接，保证信息正确性。

新闻：http://fmn.cc/A96zbG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浙江**温州市泮河村**所有耕地、水田和自留地均被村委会私卖，自去年 6 月份起村民多次抗争、上访无效，2 月初数千村民两度发起游行抗议土地被卖。

新闻：http://fmn.cc/zpWk4e



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中国**领导人温家宝和胡锦涛磋商时呼吁中国对伊朗施加压力，要伊朗放弃核项目，但是中国对禁运持反对立场，坚持不应该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闻：http://fmn.cc/yyBOEb

浙江**吴英**因被控非法集资而被判处死刑引发舆论热议，多数人认为判刑过重，新华社也发文称吴英案的法律裁定和社会舆论背离引关注。而民间金融发达却也爆发了借贷危机的温州市委书记则认为，温州民间金融不应被妖魔化。

新闻：http://fmn.cc/zg0hfN

http://fmn.cc/xw7gXx

北京时间 2 月 7 日晚间传来消息，被**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 11 天的 29 名中方人员于 2 月 7 日获救，并安全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新闻：http://fmn.cc/zmzLjo

近日，**香港**政府展开大规模针对性巡查和执法行动，全面打击“双非”孕妇(即夫妻双方非香港居民而来港生产的孕妇)赴港产子。民政署在 2 日的行动中，查处 43 处专门接待内地孕妇的“月子公寓”黑点。

新闻：http://fmn.cc/yBUhod

广东佛山的独立参选人李碧云被诉破坏选举一案 2 月 8 日在顺德区法院开庭，李碧云当庭提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因同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法院方面做有罪推定，应当回避。法庭因此宣布休庭。



新闻：http://cn.fmnnow.com/?p=1934

因“11.15 **上海**胶州路火灾”被免职的原静安区区长张仁良日前出任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同被免职的原静安区副区长徐孙庆日前出任上海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新闻：http://fmn.cc/yPbB6F

2 月 7 日，**安徽望江县**政府发文要求叫停江西彭泽核电厂项目，称彭泽核电项目在上报的评估材料造假，在地震标准、选址、环境影响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和隐患。对此，彭泽县核电办人士予以否认，称这些说法没有依据。目前，安徽省发改委拟将望江县意见递交国家能源局。

新闻：http://fmn.cc/yKSd3N

国内规模最大熊胆产品企业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 月 6 日拟在创业板谋求上市，此举遭到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和网友的强烈抵制。反对人士认为，归真堂“活熊取胆”是对黑熊的无情残害。

新闻：http://fmn.cc/yoM8xQ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



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编辑：曾维琪 黄海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